

2002

1

总第 118 期

炎黄春秋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难历程

在北京饭店一隅感受历史脉搏

李锐：倔强老人孙大光

我因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而遗憾终生

江青复仇和扬帆蒙冤



炎黄春秋

开 篇

- 2 新年絮语本刊编辑部

春 秋 笔

- 3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难历程.....余广人 冀一兵
10 一个知识分子的两个 21 年张 彦
15 我因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而遗憾终生

——悼念贺惠君同志.....马识途

亲 历 记

- 18 在北京饭店一隅感受历史脉搏.....宋新民
22 廖盖隆“文革”中拒绝“批邓”.....曾宪新
24 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袁成隆

时 代 风

- 28 倔强老人孙大光.....李 锐
30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奚 青
35 克隆植物基因之父辛世文.....聂 冷

时 政 篇

- 38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致李岷阳同志书吴 江

求 实 篇

- 40 江青复仇和扬帆蒙冤.....尹 骐

陨 星 篇

- 48 从激进军人到东北主帅——《世纪老人张学良的多彩人生》(连载二).....徐庆全 赵 杰

一 家 言

- 56 何处觅清高.....刘志琴
57 从有人骂鲁迅想到鲁迅的绝笔.....康 群

九 州 景

- 58 青州思古.....梁 衡
60 青海的撒拉族之乡.....杨兆麟
62 历尽沧桑的雷峰塔.....方 柯

文 荟 园

- 64 辛巳年的启示——纪念徐霞客逝世 360 周年.....艾 若
67 喻宜萱与《康定情歌》.....方辉盛 文有仁

人 物 志

- 70 陈立夫晚年呼唤两岸统一.....远 梦

友 谊 桥

- 73 比尔·盖茨之母的中国情缘陈 立

古 镜 台

- 78 略谈汉武帝的文治.....杨生民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范敬宜 凌 云 曾彦修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

新年絮语

● 本刊编辑部

春秋轮回,岁月嬗变,2002年悄然而至,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尊崇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所谓“察往轨,知来迹”,便是人们对于这一传统的自觉。刚刚度过了她十岁生日的《炎黄春秋》,回首既往,步履匆匆,风雨兼程,深感自慰的,就是在这—认识上的提高,以及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展望未来,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的更多的机敏和睿智,更多的务实和创造,拂去浮躁,力避平庸,谋求事业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历史的意义是借鉴。历史让我们认识人类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历史让我们了解事物的缘由,变化的轨迹;历史还以其特有的传承作用,靠岁月的积淀,铸造民族精神,涵养民族品格。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反对随意地剪裁历史,更反对把历史学作为一时政治需求的侍婢。我们倡导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把诸多的历史经验和智慧,视为超越时空的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我们以文明进步为标准,记述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讴歌气壮山河的改革大潮,同时绝不放弃以应有的笔墨,评价在中华民族史上某一阶段、某一方面作出过贡献的志士仁人。

真实是历史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上,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中国的史学家也有“以史求实、以实求理”之说。有了丰富确凿的史料,才能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概括,从而总结规律,发现真理,给人以新知,推动社会前进。然而,探求历史的真实是很不容易的。不消说历代皆有伪造历史的图谋不轨者,即使是正常人,往往由于受个人利益、集团利益、阶级利益的影响,也难免视

野局限、立场偏颇,以致或扬或隐,将事物的本面弄得大失其真。《炎黄春秋》以“去伪存真”为办刊原则,坚守不舍,目的就是弘扬秉笔直书、探求真理的美德,为拂去历史的尘埃,揭示历史的真面,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历史研究除了真伪之辨外,还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这绝非坏事,意见相左,互相驳难,只要不失探求真理之心,便可收互相借鉴、相得益彰之效。这正是我们期待的百家争鸣、学术繁荣之盛况。一向主张“兼容并蓄”的蔡元培,早年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人不能容忍异端,长此以往,很容易养成一种正统的暴力,即对异端采取一种非常残酷的态度。”这乍听来颇具耸人听闻意味的话,不幸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得到应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疯狂扼杀文化、残酷铲除“异端”的所作所为,就是历史的例证。否极泰来,我们终于有了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双百”方针的重申,有了“科教兴国”口号的提出,有了“把我国建设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我们深信,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民主法制的健全,社会稳定的进一步加强,历史科学的研究必将迎来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更为活跃的局面。“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理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旦出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更有希望了。

学者说,“史实有终而意义无尽”,“秦王朝只存在了十四年,研究秦王朝的历史二千年不衰”。这便是史学的价值,这便是历史的魅力。两千多年过去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业不朽,焚书坑儒的骂名难消,那“其兴也溘焉、其亡也忽焉”的盛衰史,更不知引发过多少后人的掩卷沉思。历史是永不间断的时间长流,只要人类延续,历史就永无尽止。愿历史学与日俱进,历久而长青。《炎黄春秋》将一如既往,联系更多的学者、作者,利用新发掘的史料和研究最新成果,为广大读者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食粮。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读者的关爱。多一个订户,就多了一份支持,这支持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炎黄春秋》有今天的影响,便是千万读者共同支持的结果。在新年来临之际,让我们再次说一声:“谢谢!”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难历程

● 余广人 冀一兵

1995年,季羨林先生在谈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时说:“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满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中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眼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俱焚。”(季羨林:《朗润琐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页)

当代中国相当一部分老知识分子的心态,折射出他们在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坎坷遭遇,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变化的深刻影响。

追溯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难历程,记取经验教训,对于实现科教兴国,乃至民族复兴,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正误交织: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双重认定

这里所说的建国初期,是指中共党史上通常所说的前七年,即1949至1956年。在这一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一个十分突出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的两重性,即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问题出发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某一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

力量。”(《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1437页)在这之后不久,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也说:“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9页)他还把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看作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在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作了这样的判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凡受雇于上述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根据这些规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一认定,并没有得到一贯的重视。在随后而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大约从1949年10月就开始了。在这一运动中,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从巩固新政权和加快对新制度的政治认同方面看,这种政策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一点必须给予肯定。但是,另一方面,从整个运动来看,这一政策比较明显地偏重于“教育”和“改造”,而突出地强调“教育”和“改造”政策的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党内许多人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一判断出发,实际上又将知识分子归入了资产阶级的队伍中。

从这一判断出发,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



周恩来广交知识分子朋友,1962年在招待科技工作者的酒会上和钱三强(中)、周培源碰杯

采取了自我批判、群众批判、“洗澡”、“过关”搞运动的方式,使知识分子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违心之论成为知识分子检讨过关中的普遍现象。这场运动不但严重地损害了知识分子的公众形象,也伤害了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感情。这场运动结束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正确的认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则没有人提了,而只剩下了错误的认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了。

初试不利:知识分子会议上的努力受挫

1955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即将全面铺开,人们愈来愈感到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匮乏,感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早在年初就有过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设想的周恩来,11月22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商讨,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

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省市负责人等共1279人参加了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作用,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已经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谈到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错误倾向时,尽管周恩来批评了宗派主义和麻痹迁就两种倾向,但他明确地说“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这种倾向“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166页)周恩来的这些讲话,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对于知识分子的属性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2月14日正式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又降调到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8月30日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已入党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时说:“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对于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成员的知识分子尚且作如此低调的估计,就

难怪八大恢复使用原先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提法了。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报告》所提出的仅仅是“运用”他们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他们来“建设社会主义”了。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地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选》第七卷第273页)

同年4月30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又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的世界观只有一个,另外分不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大约10%,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约为80%,属于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世界观还未彻底转变的人。

步入误区:知识分子被视为与无产阶级较量的“异己”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认定,是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相联系的。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见报,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至于这样的右派有多少,文章说:“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425、426页)6月初,一场反击右派进攻的大战,既在党内又在党外展开。被错划的50多万右派分子,无疑

多属于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尽管对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其性质是铁定了的“敌我矛盾”。

从此,以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有了先例,使阶级和阶级斗争失去了科学概念和客观标准,从而在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又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命题。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说:“单有1956年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明证,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程和经验》第355页)

这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谁呢?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一段话可视为答案。社论说:“原来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早已名誉扫地,更加没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了,在这种情况下,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资本的社会力量,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党派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只隔一日开始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认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毛泽东同年3月成都会议提出、4月汉口会议加以论述的观点,宣布我国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思想文化界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错误的过火的学术思想批判,拔所谓资产阶级的“白旗”,……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受到伤害。相伴而来的是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观念的广泛传播:“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分子

是最无知识的”；到了1958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盛行，甚至有了诸如“不要怕教授”、“不要迷信科学，对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的说法，“大跃进”中那些违反科学违反自然规律的荒唐事的出现，就不是令人奇怪的了。

脱帽加冕：为知识分子再次正名的广州会议

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和挫折之后，党不得不对过去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调整虽然主要是在国民经济方面，但其中也涉及到对知识分子的政策。1961年开始先后制定并颁发了《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等。中央在颁发这些条例的批语中指出：“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周恩来选集》下卷注释第285条）

为了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周恩来利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机会再次呼吁。1961年6月19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除了重申他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结论外，还对当时对待知识分子的简单粗暴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筐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一来就是‘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周恩来在批评科技文化界的不民主作风时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做起。”（《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3—3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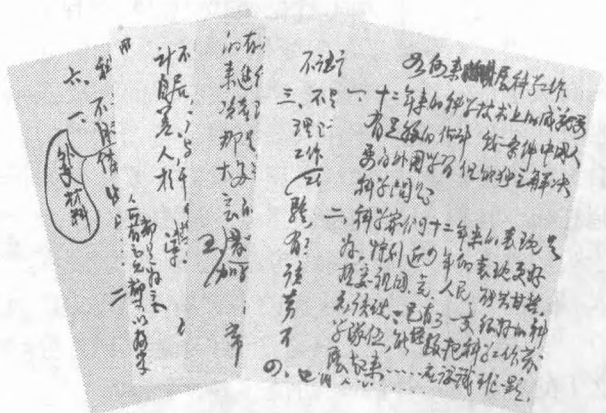
继周恩来之后，9月10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薄一波也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阶级

地位问题。他在对提交给中央讨论审议的《工业七十条（草案）》所作的说明中指出：“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旧人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96页）

9月28日，在广东省委召开的一次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身为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在会上动情地说：“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疾风知劲草’，‘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的信任不够。……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等价交换’。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同时，他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帽子。”

十多天后，陶铸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更明确地说：“我们不能老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

1962年初，主持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目的是想制定



1962年，陈毅出席广州会议明确提出“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并诚恳地说：“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图为陈毅的讲话提纲手稿

一个全国性的科学发展规划。会议期间,知识分子情绪低落、顾虑重重的现象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把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心急如焚,为了党的科学事业,他决定前往广州向到会的知识分子发表讲话。

周总理3月2日的这次广州讲话,显然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他着重从理论上阐明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道理:“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4页)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既然知识分子一般都依附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建国后知识分子依附的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并为其服务,那么他们当然应属于无产阶级了。

周恩来在谈到党的领导时又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周恩来针对党内少数干部在知识分子面前盛气凌人、常常以领导者自居、以改造者自居的官僚主义风气批评说:“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5—368页)

继周恩来3月2日讲话后,陈毅又于5、6两日发表了著名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他情真意切地说:“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

陈毅的讲话受到与会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讲话过程中大家鼓掌达60多次。

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等几位中央领导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的共识,很快形成了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所认可的共同意见,这就是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向全国二届三次人代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人民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错上加错: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再次倒退

周总理和陈毅在广州以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但在党内遭到了抵制、反对和责难。柯庆施就下令上海市不准传达陈毅的广州讲话。周恩来当面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表个态,毛泽东却没有说话。因为他是不赞成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1962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8月13日毛泽东又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9月11日,他又当面批评陈毅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第1006—1007页)

10月至11月举行的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又对“脱帽加冕”问题进行了争论。反对一方的观点,以10月22日陆定一的讲话最

具代表性。讲话认为：“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1957年，1958年，1959年的下半年和1960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龚育之：《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载《百年潮》1999年第1期）

11月26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会议上的不同观点。周总理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的报告，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会上，总书记邓小平明确支持了周恩来的意见。他当即对陆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上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他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07页）

话虽这样说了，问题并没有解决。1963年9月，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正式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从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在党的领导层，主张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意见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又有着“宁‘左’毋右”思想的影响，广州会议的“脱帽加冕”一说，使知识分子空欢喜一场。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知识界首当其冲。知识分子被诬为“臭老九”，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阀”，惨遭迫害。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了错误的“两个估计”，说建国后的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我国大多数知识

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像两块巨石压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许多知识分子被迫荒废了专业，中断了工作，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专家、学者被迫害致死。名曰“文化大革命”，实为对文教科技的大摧残，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

人间正道：知识分子回归应有的历史地位

从十年动乱结束后的1977年开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严肃地检讨和审查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恢复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1977年5月24日，还没有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二人谈话时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他明确指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这无疑是对多年来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甚至把知识分子错误地划入剥削阶级范围的否定，也是对“两个估计”的彻底否定。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庄严宣布：“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86页）

同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解放后党培养教育出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即使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业务实践，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和锻炼，在世界观的改造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在现有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文件还指出：“二十多年来，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情地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就是在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迫害，工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仍然坚守岗位，表现

出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不愧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党的依靠力量。”(《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第53页)

同时,党中央果断地废止了过时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确立了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

上关心照顾”的正确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政策。

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作了这样的历史性总结:“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第351页)。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把握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趋势,在恢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法的同时,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为我国制定“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依据,也为知识分子在我国今后发展中所居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政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江泽民强调:“今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更是不可能的”。(见《人民日报》1990年5月4日)“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见《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在党



1978年3月邓小平接见数学家陈景润

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

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江泽民接着又讲到:“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这就不仅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而且展示了当今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不容取代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得到信任,劳动得到尊重,从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扮演了改革开放的支持者、推动者、实践者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受惠者。人们高兴地看到,过去那种体脑劳动报酬“倒挂”的现象在变化;社会上有识之士发出了“‘按知识分配’应当逐步成为‘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的呼吁;我国政府首脑也基于对现代管理和现代科技工作创造价值问题的深刻认识,在关于“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工资报酬,以充分体现他们的劳动价值。

回顾建国以来,党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曲折道路,总结建国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经验教训,我们庆幸,中国共产党终于以其特有的政治智慧,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的结合中,成功地解决了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必将以全新的面貌投身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现在,真正到了知识分子的春天!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一个知识分子的两个21年

● 张彦

世纪之交回眸,让我吃惊地发现,1979年竟是我一生的分水岭,前后有黑白分明的两个21年。从1957年底到1979年初的前21年,我像做噩梦一般,不知怎的突然从“人”变成了“鬼”;从1979年到2000年的后21年,在我又从“鬼”变回“人”之后,我成了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受尊重的人,一个能为人民竭尽所能做些贡献的人,一个能给家庭带来快乐和幸福的人。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无论走过的路是荆棘当道还是鲜花相迎,对于我都已成过去,但想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休戚相关,才决计写下这篇并非仅仅记述个人际遇的文字。

被夺去的21年

1957年,无论对于我们的祖国,还是对于我个人,都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那时,新中国虽然诞生才七八年,但是社会已经面目一新,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纯洁真诚的人与人的关系。物质生活苦是苦点,但心情比较舒畅。记得自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做了那个震撼世界的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后,世界形势朝着更为复杂的情况发展,我国的思想界也前所未有的地活跃起来。中央提出发展文艺与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几乎把所有知识分子的劲头都鼓起来了。特别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几次讲话,对教条主义的深恶痛绝,对独立思考的热情鼓励,更是让人听得如醉如痴,争相传诵。我当时作为一个杂志的负责人,有幸在干部会上听到他老人家讲话的录音。至今,我还能记起他当时讲话的口吻、音调、语气,是那样的自然、平易、亲切、富于幽默感。他能把一个高深的理论问题,讲得生动活泼,使人茅塞顿开。我急

速地记录着他的每一句话,事后整整齐齐地加以誊清,视为至宝。

那时我35岁,参加革命已经12个年头。新中国建国时,我有幸作为香港《中国文摘》杂志的记者,在第一次政协大会上,亲耳听到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洪亮声音;在天安门城楼上报道了划时代的“开国大典”。建国以后,我参加了创建新中国的第一本对外宣传的外文刊物《人民中国》。紧接着,我以记者身份随着以宋庆龄为首的名流荟萃的中国代表团前往维也纳,参加了对“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报道。1955年,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我随团前往参加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报道。1957年初春,我意外地被宋庆龄点名调往她所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以加强那里的领导力量。正是这时候,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像春雨滋润了我的心田,给我以获得“高人”释疑解惑的感觉,兴奋不已。对中国的未来我充满信心。

时局骤变。刚刚作出“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形势估计,转眼又判断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局面,立即发动了全国的如火如荼的反右派斗争。大概是我调来不久的原故,在《中国建设》杂志社,我始终没有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而是在“随波逐流”的状态中,渡过了运动的每一个阶段。

年终岁尾,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进入尾声,我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的“顺利过关”高兴,党支部书记忽然通知我,要我回原来所在的外文出版社去作“检查”。这等于给了我闷头一棍,因为我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此时的外文出版社本已“战果累累”,但由于“深揭”“深挖”,又要

追回我这条逃走了的“蛇”。我自知这是飞来的横祸,但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负责干部,只能服从组织。

第一次回原单位作检查,我作了认真的准备。想到了过往大家批评过我的,诸如“不问政治,业务挂帅”、“骄傲自大,本位主义”等错误缺点。但一登上讲台,我便感觉到气氛的不对头,几百双异样的眼睛盯着我。在我战战兢兢作完检查后,迎来的却是怒气冲冲的批判。第二次大会,就更不客气了。我意想不到的“揭发”一个接着一个,批判的是我的“反党言论”、“资产阶级干部路线”、“修正主义路线”。其“根据”就是我调离时几个老同事的聚会被定为“北海黑会”,是我们“进行反党活动”;说我提倡对外宣传要“用事实说话,要有人情味”,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认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强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目的是“破坏反右斗争”;认为我说“党支部组织生活民主不够,让人不敢自由发表意见”,是“反党言论”等等。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不准我有任何辩白。几次大批判会开下来,使我威信扫地。平时和我有说有笑的同事,都变成了“陌生人”;就是点头打招呼的,表情也怪不自然。一下子,好像我染上了什么“瘟疫”,谁都躲得我远远的,只有偶然在僻静处,才会遇见个别同志的热情问候。

拖到1959年元旦一过,我的事才算有了个我没有想到的“结局”:给我定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我的“处分”是: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降级。在无可更改的“决定”面前,我强压住内心的不平,婉转地签注了我的“保留意见”。这次,虽然没有给我戴上“右派”帽子,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但也背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沉重的“包袱”,被法定地“打入另册”。这个“包袱”对我影响之大之深之远,是随着星移斗转才有了真切体会的。在那漫漫的长夜中,绝不敢说出的“株连九族”四个字,时时萦绕脑际,面对因为我使家人和孩子们遭受的歧视、鄙夷、不公,我感到深深的内疚,成为我永也挥之不去的痛楚。

人总是要面对现实的。从此我好像变

了一个人,谨小慎微,不敢随便发表意见,生怕再犯“错误”。明知自己被开除了党籍,暗里仍在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交给我的任务努力完成,涉及个人利益的事决不争先,遇上什么不如意的事总是先检查自己的思想。什么面子问题,个人得失问题,统统视之为干扰,浮上来,压下去,平静自己的心态,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习与工作上。

从1957年到1966年的几年间,中国大地上从来就没有平静过。反右派之后,又是“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自1959年初受到处分后,作为一个被改造的对象,反倒有较多的机会参加劳动、接触农村,因而能亲眼看见所谓“三面红旗”给农民带来的是什么,渐渐与农民的感情越来越相通,这也许是我“夹着尾巴做人”时代意想不到的积极成果吧!

接着,就是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对于这一突发的大风暴,我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开始,我也曾感到兴奋,觉得这是个新生事物。“革命岂能后人?”,我竟也自不量力地参加了机关里的一个“战斗队”,写起批判“封资修”的大字报来,误以为“民主”正在中国大地上勃然兴起。如今回想起来,实际上,我当时是潜意识里怀着一种久被压抑的情绪而盲目投入“文化大革命”的。

自然好景不长。我有那么多“辫子”攥在人家手里,1968年“清队”开始,新账老账一起算,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本文作者在天安门城楼采访

满楼道的大字报给我定的“罪名”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漏网右派”。抄家,批斗,挨打,关牛棚,打扫厕所等等,给“专政对象”的所有“待遇”,我一样也不少。我的工资也被剥夺了,每月只能领20元的“生活费”。这一切,我虽能硬着头皮忍受,却不知如何面对最接受我牵连的爱人、孩子和年老的母亲?这是我最痛苦的。周围事态的演变以至全国各地的折腾,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脑子里出现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1969年11月,根据中央的“第一号令”,机关大疏散,我和所有被关“牛棚”的难友被送往河南农村。名义上讲,我们算是和“革命群众”一起“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实际上,把我们中的大部分集中在汲县上乐村,派一个红卫兵头头监督着。可以肯定,未来之前,我们这些人的身份、罪状早已“传达”到家喻户晓了。令人奇怪的是,当地农民并没有对我们另眼相看。农民是非常朴实的,他们对人的好坏的看法也以眼见为实。在这里我一呆三年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

政治风暴起伏无常。阴谋政变未遂的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快了夺权步伐;重病在身的周总理仍在竭尽所能力挽狂澜;邓小平传奇性的几起几落,国内形势扑朔迷离,国际形势却悄悄发生着大变化。1972年春节的尼克松访华,引起了关心国际形势的人们的特别注意。即使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也发动起各自的敏感神经,从公社高音喇叭每天传出的“新闻联播”里,从外文局运动发展的细微变化中,去捕捉大至国家、小至工作单位脉搏跳动的变化。

1976年,对于中国人而言,真是太不寻常了。它是令人极其悲伤的一年,唐山的特大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相继去世。然而,它又是令人极其感奋的一年,作恶多端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使人民不堪其苦的“十年浩劫”宣告结束了,中国的前景终于露出了曙光。

历史大转折的时刻,人们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上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言。关心我的朋友细声细语给我透露:1957年的问题有希望“平反”了,有的说得还有鼻子有眼。但是,只听到传言未见

到事实。后来才知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党内就开始了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还是坚持凡毛主席说过的都不能动的政治思想斗争。主张实事求是突出的胡耀邦同志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我于1978年9月中旬,鼓起勇气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详细的申诉信,要求重新审查我的问题。出乎我的意料,仅一个星期,中组部干审局便回信给我说,我的申诉已经转有关部门负责处理。事后我才知道,为了加速解放干部,当时的中组部调集了大批人员,正夜以继日地在处理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外文局的落实政策办公室紧跟着也积极地行动起来,负责我这一案件的任宪法等同志不辞辛劳做了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在最后提出的《改正意见》中,不仅逐条否定了当年强加于我的“罪状”,认为“均属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而且,肯定了我“自1946年入党以来,表现是好的,努力工作,特别在负责《人民中国》编辑部的工作中,能够走群众路线,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他们共同搞好对外宣传工作是有成绩的”。外文局领导小组就《改正意见》认真讨论后,正式作出《改正决定》,认为1958年关于我的“反党问题”,“实属错定,应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安排适当领导职务”。我是1979年1月15日在《改正意见》上签字的,恰恰是我被错误地开除出党的20周年。我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我们常说的“相信群众相信党”那句话,真的在我身上印验了。我想到我的爱人、孩子、母亲、兄弟姊妹以及一切受我牵连的亲友,他们的爱是我这些年来力量的源泉;我想到曾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依然那样关心我、爱护我、鼓舞我的老战友们,是他们给了我勇气和信心。

“我解放了!”不胫而走。小儿子大龙,在外地寄来的贺函最后,竟加了这样一句:“小命得救了!”情同手足的李晓从沈阳来信说:“20年的忧患加给你的负担多么沉重啊!作为几十年的知友,爱莫能助,内心也是十分痛苦的。现在,这一切总算过去了,真是连幻梦也没有敢想到会有今天。”我的革命引路人之一的马识途来信开门见山,第一句就是:“二十年冤案得以平反,真是太令人高兴了!这才像个社会主义!才算有点民主!”他究竟是饱经沧桑的老革命,接着马上提

醒我：“要记住，民主不能靠恩赐，前面还有斗争！”后来，这位文学家的老大哥还特别为此赋诗一首：

冰消雪解喜春晴 乐在京华逢故人 创业维艰惊白发 征途多故说风尘

未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且喜河山依旧壮 风流无限在峥嵘

再现青春的21年

俗话说：“时来运转”，有时候还真不无道理。1979年我“重获解放”，敌对了30年的中美两国“重新建交”。

中美建交，紧接着交换大使的便是交换记者。我有幸被《人民日报》借去担任它的首任驻美记者。七月，我和报社当时的国际部主任王飞（首席记者）以及司机贾梦醒一行三人，绕道亚欧两洲（当时还没有直航），飞了二三十个小时，才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我们突然从一个封闭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来到一个与我们敌对了几十年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客观环境，我将怎样去认识它？又怎样去为国人报道它、介绍它？成了我和我的同事，日夜思考的大问题。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改革开放来势迅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所向披靡，冲破一切阻碍它的旧思想旧观念。老百姓的生活变了，国家的面貌变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变了。这些变化，驱使我在观察外部世界的同时，加深着对自己祖国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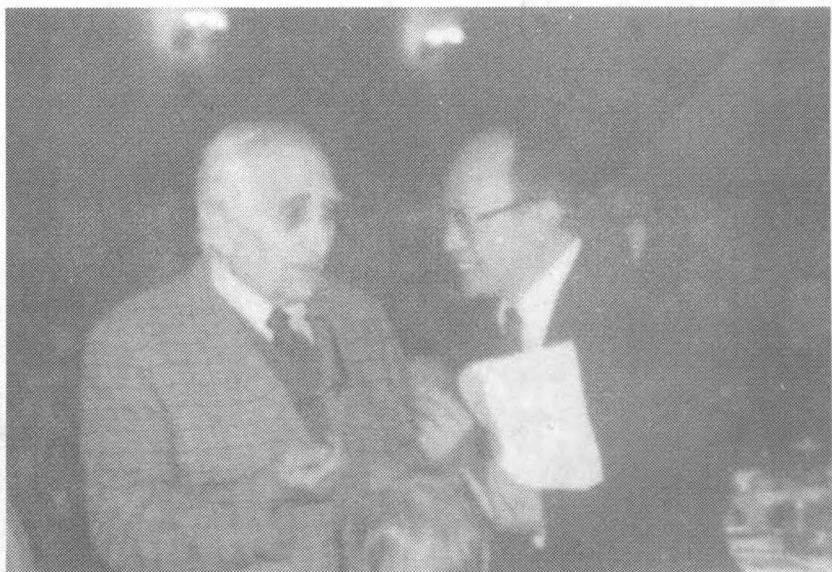
在两年驻美记者生涯中，我作过相当广泛的旅行，接触过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有了一个初步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物质条件上，当时的中国与当时的美国之间的差距之大，如果说至少差半个世纪决不为过。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到了我们过去说的“腐朽”、“垂死”的程度，美

国人的平均收入在世界范围名列前茅。虽然贫富悬殊，但大多数人都已进入中产阶级。

当然这个社会也并非太平天下，问题很多，有的还相当严重。种族歧视虽然因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而有所改进，但依然是美国的不治之症，而且随着黑人人口的急剧增长必将发展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最令人厌恶的是美国政府的霸气，惟我独尊，双重标准，以“世界宪兵”自居，到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干涉人家内政。

我遵循宋庆龄所倡导的“真实报道”传统，实事求是地报道我的所见所闻。两年期间，我在《人民日报》上除了新闻报道外，发表过“美国通讯”近60篇，从美国外交人员在伊朗被扣人质的政治危机，到在密西西比河畔倾听黑人述说衷肠，涉及的方面相当广泛，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后由新闻出版社以《一个驻美记者的见闻》的书名结集出版。

1981年下半年我任满回国。在中断了23年之后，我又重新主持《中国建设》杂志的工作，此时，杂志创始人宋庆龄已经离开了人世。她所留下的这份杂志正从被“文革”糟蹋成的“红色海洋”状况中复苏。我感到特别庆幸的是，又可以和杂志另一位创始人爱泼斯坦同志配合起来，共同为恢复杂志原有的传统而展开工作了。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中国建设》逐渐恢复其优良传统，并大步向外发展。1983年创办《北美版》，北京编好后通过卫星传到旧金山，在当地印刷发



1986年，本文作者（右）与马海德大夫在宴会上

行,同样,《阿拉伯文版》也改为在开罗印刷发行,大大提高了在海外的宣传时效。《中文版》越来越活跃。她的“寻亲访友”专栏,为海峡两岸人民的团聚做了不少好事。

1982年我曾赴西藏跟踪报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视察工作,在缺氧的高原上逗留一两个月之久。从拉萨、日喀则直到南部与不丹国为邻的边疆,我饱览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奇妙景色,听到了藏族翻身农奴催人泪下的故事,也目睹了改革为这个地区所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1988至1989年间,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应美国新闻署之邀,作为“福布赖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约翰城分校讲学。这是我一段特殊的经历,因为我平生只做过学生,没有做过教师,何况是用英语给美国大学生讲课。约翰城(JOHNSTOWN)是一个只有十几万人的小城市,名不见经传。我和妻子裴毓荪在学校附近住,与普通美国人家为邻。我讲当代中国历史,她教中文。我们很快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也和这里的众多的老师和学生交上了朋友。这所州立大学谁都可以报名来上,以学分计算你何时毕业、何时拿到学位。所以,一个班上多大年龄的学生都有,往往年长的很用功,有些年轻人则把学习不当回事。这里不乏愿意为他人服务的“志愿者”,就像我们国家提倡的

“学雷锋”一样,只不过指导他们的是基督教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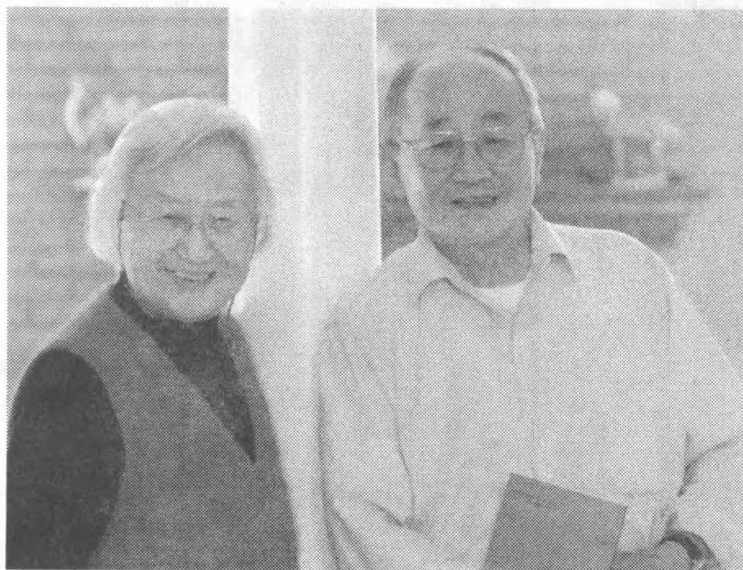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经有机会出访过南亚四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和中国具有许多相似点:原来都曾不同程度受过殖民主义的统治,也差不多同时获得民族独立,建设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差异就十分明显了。虽然都还存在贫富悬殊的现象,其尖锐程度却很不一样了。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脱贫工作抓得甚紧,逐年见其成效,而在那些国家则不然。比如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和大都会孟买,紧挨着五星级豪华饭店,就是惨不忍睹的贫民窟,马路边睡的是无家可归者,一遇红灯乞丐就围上了停下来的汽车。中国由于坚决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率已明显下降,而这些国家却毫无控制直线上升,印度显然将超过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贫穷问题就更难解决了。访问四国归来,我更加认识到,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也为此庆幸。

1989年,我已年过六十七岁,终于被批准离职休养了。这对我是个极大的解放,从此我可以不再为分房评职称之类的事务伤脑筋,可以专心致志地写我的文章了。我只写我想写的东西,有地方发表固然很好,不然留作自我欣赏,或者送给朋友看看。没有想到,90年代居然成为我的写作高潮期。

回顾我这后21年,我感到的是幸运和幸福。目睹我们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国家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不引以自豪。我们小家庭变化之巨大,更是我亲感身受的。与我共同度过苦难的妻子小裴,对这来之不易的晚年的幸福是最珍惜的。我们的四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且已经有了六个可爱的孙儿孙女,被我们视为宝贝。屈指算来,我虽已成八十老翁了,却还没有一点“垂暮”之感,我只感到,还有很多的书要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原文较长,本刊有所删节)

(责任编辑 洛松)



张彦与夫人裴毓荪近影

我因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而遗憾终生

——悼念贺惠君同志

● 马识途

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儿家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同志的电话,说贺惠君同志去世了,我除了委托他替我送花圈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为这个噩耗惊呆了。我放下电话,不禁长叹一声:“晚了。”女儿听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诉她。我回到我的小房里,不住地说:“晚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是的,晚了。40年来,我一直想对她说的一句话,终于没有对她说出来。没有想到,她竟先我而去,我永远没有机会对她说出来了,这将成为我的一个永远的遗憾,我将一生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负罪之情,折磨我一生,无法自赎。

我知道贺惠君是在1947年。我调到中共川康特委,领导成都市的工作,王宇光和贾唯英向我介绍成都市的学生工作时,说到了有个在成都中学生中很活跃的“贺小妹”,年龄不大,却比较成熟,许多要求进步的学生,都愿意跟着她走,叫她为“贺大姐”。所以后来中共成都市委下面的中学区委,就由她负责了。1947年秋我曾到成都她的四道街家里去找过她。那么年轻,却说得有条有理,中学生中的进步青年尊她为大姐,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还是叫她为贺小妹,并且一直叫到解放后的许多年。

解放以前,从那次见面后我没有再见到她,但是她出色地领导成都的中学青年工作的情况,我却是常常从成都市委的工作汇报中听到过。解放以后,我在中共成都市委分管青年工作,她正在以彭塞同志为首的团市委工作,她的许多青年伙伴,也在团市委工作,我和他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多了。我的印象是,他们做的青年工作十分活跃,而且是一个很友爱团结的战斗集体。每次我到他们那里去,一进门就听到欢声笑语,十分欢快。我那时刚跨过青年的门槛,在高级党政机关为一种不苟言笑的严肃气氛所包围,突然精神解放似的,我真感到是进了“青年乐园”了。他们不习惯叫我的官名,还是像解放前一样叫我“老马”,我也还是老彭老陈地喊他们,我还是叫贺惠君

为贺小妹。生活是美好的,心情是愉快的,工作也是主动和积极的。大家说,这才叫解放呢。贺惠君工作表现很好,后来被选为中国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

但是这种精神解放的日子并不长,在1955年突然出现的所谓“胡风反革命事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莫名其妙地卷了进去,涉嫌为胡风分子,成为审查对象。我所以感到“突然”,是因为解放以前在大后方,我们党的上级机关南方局,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胡风是反革命嫌疑分子,只告诉我们胡风一群人是进步人士,所以和我们有联合进行斗争的统战关系。我们组织的一些青年组织和进步活动,有他们的一些人参加;他们的某些文学活动,我们的某些青年也参加进去。至于现在省、市团委的一些年轻党员,都是在我们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现在突然要把他们中的一些青年同志,当胡风嫌疑分子进行审查,他们感到不可理解,我也感到莫名其妙。其中就有贺惠君。因此我和原地下党的一些负责同志作过研究,向省委写了一份说明情况的报告,使许多同志幸免于难。但是还是有一批同志被七斗八斗,说成是胡风嫌疑分子,或叫受胡风思想影响的分子。有的被开除党籍,逼得疯了。贺惠君大概是属于受胡风思想影响的人,算过了关。

在肃反运动中,贺惠君对于机关肃反中的大胆怀疑这种过火做法,表示异议,对于她大概又受到清查而表示不满。于是在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贺惠君又对肃反中的事提出不同看法,并且对省委领导同志对地下党的不公正对待,表示异议。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反对资产阶级的“阳谋”,接着整风还没有开始,便转入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了。这一下不得了,贺惠君当然成为斗争对象,被押上批判台,被大批特批起来。

一次示范性的省级批斗大会在成都红照壁大礼堂举行。各机关的领导都被通知参加,各单位反右派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有一部分代表到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贺惠君遗照

情到了礼堂，这不仅因为贺惠君是我所熟知的地下党的同志，还因为我那时也正陷于一种狼狈的境地。我们省建设厅也曾经号召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因为是工程建设单位，知识分子成堆，提的意见不少，且很有水平。我在号召时也说过一些颇有质量、很容易被人说成是“煽风点火”的话，因为我也知识分子呀。最糟糕的是我们把大家说的话都奉命原样地记录下来，打印成册，送到四川省委工业部去了，我说过些什么，当然也原样地记在上面。如果有人要把我说的这些话加以编织，汇报到领导面前，而省委领导意欲理抹我时，那就不堪设想了。还有一件事更一直叫我忐忑不安。我们建筑设计院里有一个总工程师，是很有本事的建筑师，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只是平常爱说怪话，这次也鸣放得可以。但是我以为他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在审查上报请批右派名单时，我没有同意专职政治工作的副厅长的意见，把他从名单上拉下来了。但是在我出差在外时，副厅长还是把他以专案报到了省委工业部，定为极右派，而且得到省委刘部长的批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建设厅那位副厅长说了我什么，我回来后，刘部长马上叫我去。一见面就很严厉地批评我：“你怎么把一个极右派打丢了？”我作了解释，以为这个人我很了解，算不上是右派。刘部长森严厉色地说：“包庇极右派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右派。”我听了大吃一惊，还能说什么？只得赶快同意划那个总工程师为极右派。从此以后，我就惴惴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揪出来。我那天就是怀着这种不

安心情，参加红照壁批判大会的。

我进了礼堂坐在前面几排里。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有意而然，我们四川省委多年的第一把手李政委看到了我，特意招呼我，叫我坐到他的身边去。真是想躲也躲不脱。我心里惶恐，却装得乐于从命的样子，坐到他的旁边。除了一般寒暄，他没有说什么，我更不敢说什么，只是心情更紧张。

批判大会开始了。我记不得是不是第一个就批斗贺惠君，反正她是这次批判大会的主要对象。她被弄上去站在台上，但她并没有低头，还是那么冷然的样子望着台下。我不敢抬头看她，生怕她看到了我。我心里正琢磨着，为什么李政委要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去？莫非是我有什么问题，会到了时候，被他点名站到台上去？刘部长是不是把我打丢一个极右派的事向他汇报了？我的心里乱七八糟，胡思乱想，竟然不知道贺惠君按规矩先自我交待些什么，也没听清楚已经有多少批判勇士上台去批判贺惠君了，我只听清楚了有一个批判者正声色俱厉批判贺惠君的话，说她诬蔑李政委对待四川地下党不公平，在政治上不信任地下党，无端怀疑有的地下党员为反革命，是无耻谰言，是对李政委和省委的恶毒攻击，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如此等等。忽然李政委对我说：“你是地下党的领导，你应该上台去批判她，看我对你们地下党到底怎么样，你不是被提拔为省建设厅长了吗？她不是被推举当了团中央委员了吗？”

我终于明白，李政委前几十分钟那么热情地招呼我坐到他的身边去，是早有预谋的，是要我充当他的打手，上台去批判贺惠君，这对于贺惠君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了。李政委点名要我上台去批判自己的老部下，我该怎么办呢？说实在的，说贺惠君攻击李政委对待地下党不够公平，是反映了许多地下党员的心声，我不仅听得很多，我自己就有同感。李政委对于地下党一直有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看法。这种看法在解放初安排工作时已经有些歧视，在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更有明显的表现。但是现在却要我上台去，在大庭广众面前，特别是在许多原地下党员同志面前，睁起眼睛说假话，昧着良心去批判自己很熟悉的老部下，情何以堪？当时我的心里真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很显然，如果我拒绝了李政委的指示，后果不堪设想。省委工业部长就坐在我旁边，他的话言犹在耳：“包庇右派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右派。”如果我不上台去批判贺惠君，加上说我放走了一个极右派，很有可能要把我打成右派。真是生死祸福就在一念间。李政委那看着我的眼睛，在我看来，不仅严厉，甚至

凶残,如剑锋一样对着我。我该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横下一条心,走上台去要求发言。我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反正是照李政委的指示,说李政委如何重视如何提拔地下党员,我被提拔当了建设厅长,贺惠君被提拔在省团委负责,且被推荐为团中央委员一类的话,批判贺惠君是胡说八道,有意攻击李政委,是反党的行为,如此等等。讲了几分钟就下台来了。我一直不敢看贺惠君,下台的时候从她身后走过,连她的背我也不敢看一眼,简直是落荒而逃。但是李政委却感到很满意,以微笑迎接我入座。

散会了,我几乎难以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想,贺惠君的心里一定流着血,或者她正在心里痛恨我,不讲良心,这么卑鄙。然而我的心里也流着血。这算什么呢?我上台去说的那些混话,就像刀子一样,把一个一直尊敬我对我的同志伤害了。他们一定会把我的批判作为主要的根据,把贺惠君定为右派。贺惠君这个右派是我冤枉她把她打成的。我为了害怕自己被打成右派,便冤枉了好人,我还算个什么玩意儿呢?我还有脸再见地下党的同志吗?

果然,不久就听说贺惠君被打成右派了。从此以后,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在我心上挂了起来,不得解脱。

从此我再也不敢看到贺惠君,连她周围和她要好的地下党的同志也尽量避开见面,避不开的也尽量少说话,深怕他们会戳到我的痛处。然而我的心里还悬着贺惠君,打听她的下落。后来得知她在《四川青年》杂志社工作,我才稍微安心。然而我还是怕见她。

不想见到她,她却偏偏来看我。她到我的机关门口传达室,说是为她们杂志社一件事要采访我。我当时心里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但她既然来了,而且是为了公事,我是不能不见她的,只好请她到我的办公室。她一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努力掩饰我不安的神色,她却是像过去一样,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好像已经把过去那件不愉快的事抛诸脑后了。我真想向她表示我的歉意,但是我的面子作怪,话到口边又收回去了,心里自我宽解,也许她早已忘掉我那次对她的不光彩的表演了。但是她告辞走后,我却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我在那样的大庭广众之中,对她进行无端的揭发,使她定性为右

派,一定起了关键的作用,她怎么会轻易忘记我呢?她不过是给我面子罢了。我心上的疙瘩还是没有解开。

一直到“文革”之后,对右派开始平反了,我正巴不得她会很快平反时,便听到她已经平反的消息,不久听说她已经恢复工作,到省旅游局担任副局长了。我很高兴,似乎我心头的包袱也因此而减轻一些;然而我那羞愧的烙印,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无法平复。一想起来,便觉不安;总要当面向她道歉;甚至在地下党和“民协”的纪念会上见面,是有机会向她表示道歉的;可是在那稠人广众之中,我却始终放不下自己的面子,公开向她道歉;甚至我在讲话时说到这样的意思,也不敢提她的名。我心里想,时间还长呢,机会有的是,再找一个合适的场合吧,就这么拖延下来了。

有一回,地下党的少数同志和熟朋友在人民公园聚会,有王宇光、彭塞等老朋友参加,也有贺惠君和她老伴詹大风参加。我们谈起地下党的一些往事,甚至也谈到省委个别领导对地下党的不公平。这本来是我向贺惠君表示道歉的好机会,但是大家把过错都放到李政委头上,我也顺着这么说。而自己那次不光彩的表演,却总也说不出口,就这么含糊其辞地混过去了。

然而我心上包袱并没有解下,愧疚之情总是时时啃蚀着我,叫我难安。我们的年纪都越来越大了,虽然她的岁数比我小得多,应比我晚“走”,在我的有生之年,总还有机会吧,但是总得抓紧才好;这与其说是我向她道歉,叫她尽释前嫌,还不如说是我必须向她道歉,才能解除我心头上的惭愧和不安。我得赶快,这样一直拖到去年夏

天,我在北京接到李致同志的电话,说贺惠君突然走了。

于是我失去了自我赎罪的机会,而且永远地失去了。我将带着这种失悔走过我的一生,忍受羞愧的啃蚀。即使我从北京回来,在医院里见到她的爱人詹大风同志,向他吐露了我的羞愧之情,追悔莫及之情,也无济于事了。那又有什么用呢?就是我现在来写这篇悼念贺惠君的文章,又能减轻我的罪责多少呢?

这是我一生永远的遗憾。

(定稿于1999年5月)

(作者为四川省作协主席、名作家)

(责任编辑 杜晋)



本文作者

在北京饭店一隅感受历史脉搏

● 宋新民



1966年8月25日深夜,北京军区政治部吴岱主任叫我马上到他家里去。军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阎广发也来了。吴主任说,杨勇司令员来电话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军区马上派一名党委书记、一名经理到北京饭店工作。吴指定我去当党委书记(当时我是军区师以上干部政治理论集训班主任),指定阎广发担任经理。

第二天到了北京饭店才弄清了事情的经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饭店一散会,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从各个单位一撤,北京市就乱了。北京饭店也开始乱。大家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怎样搞,到北京大学参观学习的结果,是到处糊大字报,揪斗“黑帮”。北京饭店的店、科领导大都变成了“黑帮”,工作处于无政府状态。总理责成北京新市委解决北京饭店问题,新市委提出请解放军派人来管饭店工作。总理采纳了这个建议,这才有了我们调来饭店工作的事。

北京饭店真是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我每天都感受着历史脉搏的跳动。

在无奈中实行军管

为了保证外事接待任务正常运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也不得不分心关注北京饭店的工作。

就在我们进店和职工见面的时候,他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廖承志来参加会议。廖以丰富的涉外知识,风趣地介绍了外国人一些礼节上、生活上的习惯,解答了在运动中产生的在外事服务上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

然而,那时北京饭店已经深受社会影响,出现了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一派叫“八一八”红卫兵,一派叫“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我们进店的第二天夜里,两派的部分群众,就在六、七号餐厅之间发生了冲突,既动口又动了手。我闻声赶去劝阻,在混乱中也挨了皮带抽。我无奈地说,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是刚上任就挨了三皮鞭。为尽量减少来自社会的影响,周总理要求我们采取措施,切断饭店职工与社会上造反组织的联系。规定本店职工不得参加社会的造反组织活动,在店内自己搞运动,店外造反组织也不准进入饭店。

临近国庆节,响当当的造反派“北航红旗”来了几个人,要在中七楼挂下一条大标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这样的标语挂在外宾出出进进的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向他们解释又解释不通。只好好言把他们稳住,打电话向总理办公室请示。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总理办公室回电话说,总理认为在外事场合挂这样的标语不合适,并由善做群众工作的阎广发同志出面,找几个服务员帮他们把竖标语改为横标语,挂在饭店车场外的松树围子外面,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发走了。

1967年1月,上海刮起的所谓“一月风暴”迅速吹遍全国,“夺走资派的权”成为最时髦的口号。1月18日深夜,6楼客房组长把我叫醒,他说,本店“八一八”红卫兵有人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首都各界造反派联合召开的夺权大会,会上决定全市的夺权行动天亮即开始,他要我这个党委书记有所准备。果然不久“八一八”红卫兵便

找到他们的“总部”去,告诉我这件事,并说这是大势所趋。我问他们要夺谁的权,回答是夺各科室的权,不夺新的党委的权。我问夺权的事同别的革命组织研究过没有,回答是还没有。我告诉他们,要不要夺权,怎么夺权,要找各派组织共同研究;要坚守工作岗位,北京饭店不能乱。

但是,“八一八”红卫兵已经开始行动:每个科室都派了他们组织的人。这便给其他造反组织一个很好的攻击口实,说夺权是反动行为,饭店的权现在不是掌握在“走资派”手里,而是掌握在由解放军干部参加的新党委手里。和“八一八”对着干的“东方红”,希望新党委会就此全面否定“八一八”。“八一八”红卫兵慌了,集合在一起要我表两个态:一,夺权是革命行动;二,“八一八”是革命的组织。我说,夺权的行动是错误的,组织是革命的群众组织。

不料这样的表态双方都不满意。尤其是“东方红”认为我袒护了“八一八”。他们决定要开大会辩论,由各造反派自行主持辩论究竟应该由谁来夺权。

大辩论从20日进行到22日下午,有一些外单位的人也进入了北京饭店,情况变得很紧张。到了晚6点多钟,宴会厅已经坐满了人,歌声、语录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就在这时,为应付全国混乱局势而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进了西楼的前厅。有几个走过这里的青年服务员被总理叫住问话。后来聚到十几个人,总理索性坐在宴会厅前的台阶上,听他们陈述观点。总理看到贴在柱子上的标语不满意地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你们这样闹的吗?”说后起身走进宴会大厅,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总理向大家招招手,并未讲话,而是把各派的头头召集到贵宾休息室,用一个多小时耐心听取各派的发言。最后明确指示:北京饭店不能夺权,立即停止夺权的辩论;北京饭店的运动自己搞,外单位的人立即退出饭店;大家的不同看法,在深入进行大批判中解决;北京饭店因有外事接待任务,也是个要害部门,不能乱。

总理指示传达后,紧张局面暂时缓和下来,但吹进饭店的夺权风早把人心搅乱了,各种纠纷不断发生,班组长说话都不灵了,饭店的正常秩序已经得不到保障。油印的小报上开始攻击北京

饭店的新党委。面对这种局势,回想四个月前进店时领导的期望,我感到很内疚。我便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对北京饭店实行军事管制的建议。信送出去不到十天,总理见到了我说:“你的信看到了,我不会让他们闹下去的。”

2月20日晚上7点,我被叫去参加研究北京饭店军管问题的会。总理的秘书把通告的内容读了一遍,大家一致拥护。在谈及由谁来主持军管时,时任中央警卫团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杨德中同志说,还是你们几个调到饭店的同志把军装再穿起来,执行军管任务。我认为这样不行,坚持另派几个同志来。最后确定新的党委几个人不动,由北京卫戍区再派人来组织军管会,对饭店实行双重领导。

外事无小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饭店的青年职工经不起外界的影响,思想也迷糊起来,唱出了不为资产阶级老爷太太服务的高调。连今后还给不给外宾擦皮鞋也成为议论的话题。总理知道后很重视,这年9月6日他来饭店时说:“皮鞋要擦,你们不擦我来擦!新中国嘛,不擦影响不好。”他还对老职工说:“年轻的不懂,大哥大姐要解释嘛。”

国庆节后不久,中五楼发生了一服务员打黑人小孩的事。事情并不复杂,当时住在中五楼的坦桑尼亚客人,有个三四岁顽皮的小男孩,爱闹爱活动。一次到处乱窜,被服务员抓住,在屁股上轻轻打了一巴掌。小孩不干了,哭着去告诉他妈妈。女客人很不高兴地把事情反映到外交部接待组,我们知道后也批评了这个服务员。过了两三天,廖承志来了,说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很重视,认为是不尊重黑人国家客人的表现。孩子顽皮只能告诉大人,自己动手打在中国都不行,何况对外国人?一定要严肃处理。当时我们处理这件事有顾虑,因为两派打架的事刚刚处理了,怕再一次引起纠纷,便把它局限在客房科内部对该服务员进行批评,并由科里带他向客人道歉。事后总理知道了很不满意,批评我说:“你们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这么做的吗?应该把打小孩的事件告诉大家,发动全店职工来讨论,让大家都受到

教育,接受教训。”

1969年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两国关系非常紧张。1970年2月,前来参加中苏边境问题谈判的苏联代表团飞抵北京,住进北京饭店。大家对这次接待工作很重视,安排很周到。他们每天在中楼7号餐厅进餐,对招待的菜、饭很满意。一天午餐,苏联代表团一个成员在盘子里发现了一颗小钉子,他把它挑出来,引起了同桌的哈哈大笑。从苏方代表的态度看,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可是外交部的接待组却沉不住气了,把它写进了当年第10期的《情况反映》上。2月18日周总理看到这份《情况反映》,在上面批示:“保卫祖国荣誉”。“请注意内中一条,北京饭店菜里发现钉子一条情况,并请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公安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派人检查北京八大饭店、招待所的招待工作和各大商场、菜场的政治工作。”总理把这件事提高到“保卫祖国荣誉”的高度,不是就事论事来处理,而是用它来推动北京涉外服务工作,推动各方面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令我十分感动。我们也接受了上次处理打外宾小孩一事的教训,把这件事在全店大会上公布。不仅在餐厅科,而且在各科室、各班组进行深入地讨论,找问题,订措施,提高工作质量。通过这件事,大大地整顿了饭店的服务秩序。联合调查组将检查饭店的情况报告了总理,3月10日,总理在报告上又批示道:“对这些地方要抓紧、抓紧、再抓紧,要不断检查,总结经验,有所前进,丝毫松懈不得。”

8个月后,又发生了一档子事。1970年11月28日,毛里塔尼亚大使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国庆招待会。不料下午突然大风降温,风从宴会厅前下面吹进大厅,有关人员忙了一个下午,宴会厅主席台区的温度怎么也调不上来。只好希望宴会开始后,风能小一些。那天到会的贵客除我们的总理外,还有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莫尼克公主。莫尼克就坐在总理身旁,恰好那天又穿了裙子。风从后面吹来,时而抖动她的裙子。我们一个个心里很不安,又不好说什么,一直捱到宴会结束。我看事情过去了,由于很长时间没回家,便回了住处。谁知刚进家门,饭店的车子就追来了,司机说市委黄作珍秘书长找我。赶回饭店,黄对我说,今天宴会主席台有风,

总理很不高兴地找他去批评了一顿。黄嘱我主动向总理作检讨。第三天总理来到饭店,我向总理作检讨,总理说:“宴会厅风大,说了三次,你们查都不查,看都不看。”又说:“你们不是平等待人,你们的指导思想不对头,你们就是不抓思想。人家是小国,你们就那么歧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不能因为人家是小国,是黑人就看不起人家。”最后才缓和起来说:“领导干部不能当老好人,不能看到了缺点错误的东西也不批评。”隔了几天总理在另一个国家的招待会上,又与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相遇,周总理向莫尼克诚恳地道了歉。

因画事引起的话题与风波

北京饭店不仅是当时的著名饭店,并且是国家的重要活动场所。房间厅堂布置讲究,挂有许多名人书画,徐悲鸿的、齐白石的、陈半丁的、潘天寿的、于非闇的、李可染的、……

这些画虽很名贵,但多是花鸟鱼虫,高山流水,描绘自然界的東西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气氛当然不合。形势总是逼着人跟随潮流走,于是想求变,请人在显著的地方画了几张以现代题材为内容的人物画。

周总理是喜欢看美术作品的,一天,他在西楼前厅看见东西服务台墙上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身着各族服装的中国人手拿毛主席语录在欢呼;一幅画的是不同肤色的外国人拿着小红书在摇动。总理停在那里,习惯地抱着双臂反复观望。我还以为总理嫌放置得哪里不合适了,正揣摩,总理忽然发话了:“画中国人民热爱毛主席是可以的,至于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这话应该让人家说,不该由我们说。你们画成画挂在这里,外国人看了会产生强加于人的感觉,不大合适。”我听了思想上豁然开朗。可是取下一幅,两边便不对称了,又没有合适的画替补,干脆全都取下来了。

还有一幅画,是我认为的成功之作,主动引导总理看的。这幅画挂在饭店中楼东南角一间餐厅里,题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画面上出现了林彪、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五个人。没想到总理一见大为恼火,严肃地说:“哪里来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怎么能和林副主席画在一起?快取下

来！”

这幅画当时便按周总理指示取下来,但我们并不理解,心里总以为是总理过于谦逊了。时间不过一年,政治风云突变,先是庐山会议揪出了陈伯达,后是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时,我真从心底钦佩总理这位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我知道,他不可能预卜那些人的各自具体归宿,但他那时便不愿与那些人为伍,是肯定无疑的。

我这个人迟钝得很,并没有从这几次组画中提高政治敏感性,终于在三年后又惹出了麻烦。那是在东大楼快要盖好的时候,为了把新大楼厅堂、房间布置得高雅些,需要数量很大的高质量绘画。那时画家比较好请,有的是被大批判“批”回了家,有的是“困”在学习班里无事可干。著名画家李苦禅、黄永玉、黄胄、阿老等都先后被邀来北京饭店。技法精湛,风格各异的绘画,从他们手下不断地创作出来。

当时社会上刮起了反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回潮风,这批在北京饭店作画的著名画家,引起“反回潮”者的注意。他们首先对1972年由古元、陶一清、黄润华为北京饭店创作的《红日照延安》大画发难,使我们想到新画的这批画的审查问题,有些美术家也不放心,便出主意找国务院文化组的美术组的人来看。美术组很快派了一个人来,把画成的画翻了一遍。

不久,美术组来借饭店的新画,说要在美术馆搞展览。我当时一点警觉性也没有,爽快地答应下来,没有想到他们耍鬼把戏。他们把画拿去后,色彩鲜艳的花鸟画不用,人物画不用,专挑一些墨色浓重的山水画,说是诬蔑社会主义的中国,都是穷山恶水,暗淡无光;还把黄胄题为《任重道远》的沙漠骆驼画,说成是影射现在的中国人民仍然苦难深重;把宗其香画的三只老虎,说成是三虎为彪,是歌颂已经摔死的林彪的;把黄永玉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说成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他们把这些画挂在美术馆西厅,加上很长的前言,发动和组织人们去观看和批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这样做,不只是针对画家的,还是针对支持北京饭店工作的周总理的。这股风刮了一阵子便悄无声息了。据说毛主席说了话。毛主席说中国的泼墨山水就是这么

画的嘛。

东大楼为何少盖了两层

北京饭店自建国以来一直是国事、外事的重要活动场所。饭店所有的建筑都是1954年以前的,在规模上还不如京西宾馆,我觉得实在有改造的必要。1972年5月份,周总理到饭店来理发,我抓住机会,向他提出了拆掉北京饭店的老楼和它东边北洋时代的铁道部旧楼,建造一座新大楼的建议。我汇报说:“饭店利用铁道部楼房改为对外餐厅一事北京市委定不下来。万里同志说与其花一百多万改造旧的,不如多花点钱盖个新的。建造北京饭店西楼才花了三百多万元。”我接着试探着说:“万里同志说的也有道理,现在外国人越来越多了,不如把这幢楼和北京饭店老楼拆了盖幢新楼。”总理沉思了一下说:“你找些内行人研究研究,我支持一下就是了。”

我喜出望外,立刻把总理同我的谈话,以简报形式向市委作了反映。市领导作为一件大事马上行动起来。分管城建工作的万里同志找我了解了一下情况,迅即召集规划局、建筑设计院研究,组织了包括张博、戴念慈在内的一批著名设计专家进行设计工作。万里同志在建国初期担任过建设部部长,1958年指挥了工程浩大的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天安门广场的建设工程。他在建筑界有很高威望,有丰富的组织建设经验,由他挂帅领导这一工程的实施,是再好不过了。

大楼开始的设计是按照北京市过去的整体规划进行的,即天安门以东的建筑不能太高,高的建筑应放在东单路口以东。因此,最初的设计先定为9层,后改为13层。建筑家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案,效果图画了二十几个。后来李先念副总理觉得设计矮了。他说:“三环路以内的空地不多了,北京市今后房屋的建设,要向空中发展。”根据他这个指示精神,又重新进行设计。新的设计是地下3层,地上19层。并按百分之一的比例做了一个大楼的模型,放在饭店里,供中央领导同志观看、提意见。记得邓小平同志从江西回到北京不久,也在饭店看了这个模型。

设计定型后,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出面向中央写出建造北京饭店新大楼的报告。对这个报

告,周总理看的很仔细。他用的是点阅法,每个标点他都重新点一下,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不时拉出箭头,一一做出明确指示,最后写上拟同意,并点名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其他中央领导也都一一画了圈。

11月,批复件回到了北京市。新大楼的工程,也就随之展开了。

接受施工任务的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实行立体交叉作业,采用昼夜三班倒的施工方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大楼盖起来。到1973年11月,已盖出地面16层,来年春季完工已成定局。

正是这个时候,一个事前没有想到的问题发生了。说北京饭店盖得太高了,看到中南海游泳池了,毛主席住地不安全了。在那年头,事事都往路线上拉,这涉及伟大领袖的事,非同小可啊!

周总理是个一切从大局着想的人,为了不使楼层高低问题生出事情来,抱病亲自来工地视察。在一个寒风嗖嗖的上午,他登上施工的最高层,拿着望远镜向中南海方向眺望。北京饭店距中南海有两公里多路,那天雾气又大,什么也看不清楚。他又带着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顶上向西华门楼台上察看。然后他果断下了决心,立即找张博等设计人员去人民大会堂,研究降低高度的问题。研究决定减去两层并改变顶层的设计。大楼顶层原设计是中型宴会厅和大接待厅。高敞明亮,外形壮观,装修华丽,把它改成内部用房,比原来矮多了。设计人员提出构件都已经造出,不用可惜了。总理说:“造成的浪费由我负责”。与此同时,在故宫西华门北侧,盖了一排长楼,挡住从大楼投向游泳池的视线。不知内情的人看来,在那个位置上出现这排长楼,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

大楼于1974年夏季盖好了。在开业前的一个月,这座楼里热闹非凡。一拨一拨的参观者从这里进进出出,国家领导人董必武、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都先后来到这里。

只是为它操心费力的周总理却没有能来,因为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加重了。直到1975年5月他才有机会出现在饭店的东大楼。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在17楼阳台上眺望北京市容良久。

(责任编辑 吴 思)

廖盖隆“文革”



廖 盖 隆

对我来说,廖盖隆是一位为人耿直,为学勤勉的师长。

无论在思想理论界和政界,廖盖隆都是一位名人,但我从未看到他有什么名人的架子。与他一起从延安过来的同辈亲切地叫他老盖;而我们这些后生者则尊敬地称他为盖公、盖老。

我认识盖公是1975年下半年。那年我从河南罗山干校回京,被派到厂桥中办招待所,参加毛选第五卷的注释工作。编辑毛选五卷的班子当时是保密的,对外称中办材料组。共分三摊,一摊整理正文,住在中南海里;一摊搞注释,还有一摊

中拒绝“批邓”

● 曾宪新

搞外文翻译，这两摊都住在厂桥中办招待所——现金台饭店的前身。注释组的组长是刘大年，副组长是王子野和盖公。

我到那里时，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已开展一段时间了。盖公对这个运动很反感，用他当时所能用的办法进行了抵制。“批邓”就要开会，开会时盖公也到会，但每次都带两三大参考，在会上边听别人发言，边读他的参考，而且还圈圈点点，几次会下来，没听到他发过一次言。好在主持会的党组织领导是个好人，从未为难过盖公。盖公为人随和没有架子，可是有一次却摆起了架子。那时组里一位热心批邓的人，要搞什么批邓语录，他去动员盖公参加，盖公对他说：“你们下边人搞的活动我不一定都参加，组里还有不少事要办呢！”居高临下地把那人挡了回去。中办政治部通知大家去北京大学看批邓大字报，通知到盖公时，他说：“我最近身体有点不得劲，请个假行吗？”党组织领导又没难为他，只是说我该通知的都通知了，谁有事或者身体不适的，自己安排。就是这样，一次次“批邓”的差事都让盖公给磨掉了。毛选五卷出版时，还在“继续批邓”，外语大学的一位熟人邀我去他们那儿给部分教职工讲讲五卷的内容。如何讲呢？我有点犯难，去向盖公请教，他说：“书里（指五卷）多处提到小平同志，且是肯定和赞扬的语气，可以讲讲这些么！”我明白这是鼓励我“顶风”。我照他说的讲了，效果不错，得到喝彩。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满是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诗词，人民多年积蕴的愤懑一下子怒喷出来。盖公

这时虽然还背着被审查的枷锁，但他情绪十分高涨，毫无顾忌地向我们几个知心者“传播”他记下的或背诵下来的诗词。他对“扬眉剑出鞘”句子特欣赏，为我们边背诵边比划，样子非常生动。事后盖公夫人蓬茵大姐说到那段时间的盖公时，戏称他回到了童年，像小孩子过年那样的高兴。盖隆同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和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完全融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色。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欢欣雀跃，盖公和我们一起参加了材料组组织的游行。带队的给每人发了一个小纸旗，旗上写着各种欢庆的口号。我们拿着小旗谁也没注意旗上写的是什麼，盖公却注意了，他拿的小旗上写着“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很严肃地把小旗还给带队的，说：“我不能举这个旗！”这句话真切地点破了盖公在整个批邓过程中的政治态度，真切地表明了盖公这位正直的共产党人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潮流的可贵的政治品格。

盖公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路线，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十分拥护。他时时都在关注着这条正确路线的贯彻落实，对于与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相违背的言行，他不仅识别快，而且能勇敢地与之斗争。这期间盖公有一个大的动作，他对两位权威人士的许多言论、主张持不同看法，认为他们是在推行一些“左”的主张，于是他向党中央写信反映自己意见，批评这两位权威人士的错误。盖公是守纪律的，他从没有对我谈过他的信的内容，我是从别处听说这件事的。我向他问及此事时，他表示是那么回事。他告我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找他谈过话，习表示要向中央反映他的意见。他说，这就行了，要改变一个人的看法，不是件容易事儿，不过不能放弃斗争。据我所知，盖公与这两位权威人士过去在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上都不错，可是在事关方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盖公却能义无反顾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批评错误的东西。他这种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我很受感动。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

● 袁成隆

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现在跻身于世界核大国之列,已经历了四十六个春秋。我是1956年二机部(即核工业部)成立不久,调任二机部副部长的,有幸先后在宋任穷、刘杰两位部长的领导下,参与了我国核工业初期起步的艰难历程,负责核工业生产最基础的核燃料矿产的勘探、开采、加工、转化的全过程,为把第一颗原子弹升上天奠定了基础。

探采铀矿 土法上马

1955年,抗美援朝刚结束,尽管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十分薄弱,但毛主席、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仍以伟大气魄决定研制中国的原子弹。1960年,苏联突然撕毁合同,停止一切援助,我国又逢三年自然灾害,当时搞原子弹的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所有这些都没能阻挡我们朝既定目标前进。

我任职的二机部建部初期,最大的问题是我国有没有铀矿资源。铀是制造原子弹的主要原料,因此找铀是头等大事。当时,部里所属的地质队在各地寻找矿源,其中有一支地质队在华中地区的深山老林里,从山顶到山脚三条数百米长的深沟中探测到铀矿。对这一发现,部里十分重视,苏联专家也很高兴。经过对可供开采的储量计算,结论证明我国不仅有铀矿,而且有品质优良的较大型铀矿。于是,1958年4月在这里动工兴建我国第一座大型铀矿厂,并开采出第一批矿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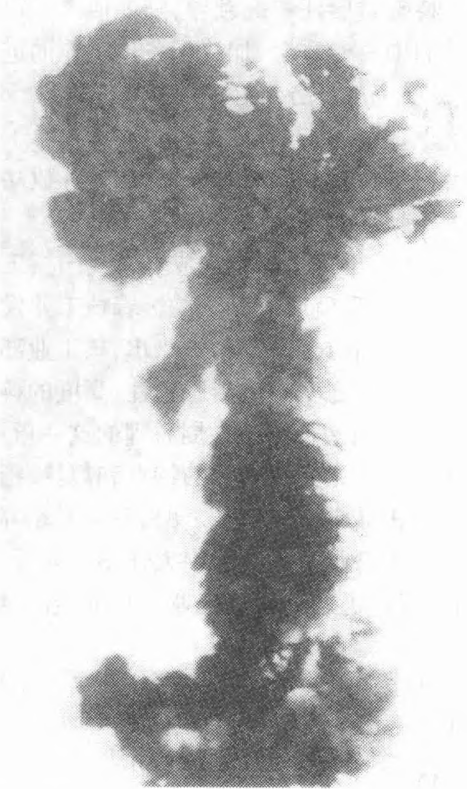
当时我们同苏联专家发生了一次争论。某些苏联专家坚持认为在花岗岩地区不可能开采出有价值的铀矿,铀矿只能到砂岩中去找,而我国地质队首次发现的铀矿区恰恰就属花岗岩地区。

因此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意见,坚持开采下去,并通过深部挖掘,结果证明在花岗岩地区不仅有铀矿,而且还是具有工业价值的大型铀矿。这一发现对我国地质资源的勘探开发,对国际上关于铀矿形成理论的发展,都具有新的突破性的意义。随后几十年中,二机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质队探明的铀矿资源,其中百分之四十以上都属于花岗岩地区。

仅是发现铀矿矿源,挖掘出矿石还不行,必须要从矿石中提炼出重铀酸铵(粗铀),再从粗铀中提炼出制造原子弹最终使用的核燃料。因此,能否搞到粗铀,就成为核燃料工业能否全线尽早起步的首要任务之一。

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一面筹建大厂,一面布置若干点进行土法炼铀。1958年秋,部里派我到西南地区考察农民在地质队的指导下,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办铀矿的情况。所见情况实在动人:四五十个男女青年农民,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用镢头、铁铲开山取矿,然后在临时搭起的竹棚里用十分简陋的工具,不分昼夜,用碾米的石磨将矿石粉碎,用竹筛子筛净,用土缸酸浸,再用豆腐包细布一遍遍过滤,经烘干,最后才得到了所需的面粉状粗铀,经检验完全合格。

农民用土法办矿炼铀,搞原子能,这在世界上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和愚公移山的英雄气概。我当即把这一激动人心的喜讯用电传向部里作了汇报,表示有信心用这个办法搞到更多的粗铀。通过20多个省、区的土法炼铀,我们共获得粗铀约160余吨,解决了大型矿山、冶炼厂未建成前,首先取得部分粗铀的问题。不要小看这土法上马搞出的粗铀,它可是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争取了时间,立下了大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核燃料从最初的粗铀到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要经过多次冶炼转换才能产出可供组装核武器用的浓缩铀—235。为了早日取得合格的浓缩铀,当时我们没有等大厂建成,就在研究所里,用自制的土设备,因陋就简地先干了起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先是一个研究所就拿出了合格的二氧化铀 21 吨,四氟化铀 31 吨。研究所还先后建起了“615”乙、丙两套简法装置,生产出六氟化铀 18.5 吨。这些用简法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为下一步建大厂掌握了宝贵的数据资料,锻炼了队伍,提前拿到一定数量的产品,为整个进程大大争取了时间,而且还实际地体现了自力更生的精神。

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当年,在我国决心发展核工业生产,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时,苏联对我们是支持的,先后派来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以宋任穷、刘杰为首的部党组对苏联专家工作十分重视,多次强调虚心向这些专家学习的重要性,关

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强调要善于独立思考,树立“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对此,各单位都是认真贯彻的。当时部里尚无政治部,但很重视政治思想工作,要我兼抓政治工作。为此我们专办了一张《跃进报》。宋部长曾让我专门向苏联专家组组长介绍二机部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专家学习,努力掌握技术的情况。我们还吸收苏联专家参加二机部机关召开的“边干边学,建成学会”动员大会,表扬了先进,也向苏联专家赠送了锦旗,使他们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专家们表示愿同我们合作,共同建设中国的核工业。

1958年5月,二机部党组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设计院关于把我们发动自己的力量和依靠苏联专家的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我参加了这个报告的起草工作。报告送去后,毛主席看了很快作了重要批示,他批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全体人员对毛主席批示十分重视,并认真贯彻于实际行动之中。对于苏联专家,即使在他们即将撤走的日子,我们区别于苏联政府,仍是以礼相待,许多专家都依依不舍,洒泪告别,表示希望能够再回来,共同完成未竟的事业。

正当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与苏联专家合作建设我国原子能事业的紧要关头,1960年8月风云突变,苏联政府无理撕毁合同,停止援助,撤走专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困难。

这些困难是:援建项目不配套,有的是缺项空白,有的无法开工,有的半路停工。特别是一些关键核心设备未全部到齐,资料、图纸不全,最终连原子弹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都不给我们,供扩散厂生产浓缩铀—235必需的六氟化铀也未按合同交货,人员培训半途中止,许多工艺技术尚未完全掌握。……

怎么办?是干下去,还是就此罢手?人们都在焦急地思索着等待着。在此严峻时刻,毛主席及时发出了“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伟大号召。我当即去兰州扩散厂传达毛主席的号召,并动员群众克服困难,把我国的核工业搞上去,为中国人

争这口气。

当时二机部党组认为,能否克服苏联撕毁合同给我国造成的巨大困难,关键在于能否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因此决定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从事中国原子弹事业第一代人的责任感与荣誉感。为了贯彻部党组这一部署,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建立自己的专家队伍。为此,部里决定把我国为数不多、但却出类拔萃的学有专长的专家调集来,委以重任,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同时调来一批新毕业的尖子大学生和留学生,与老专家一起组成了一支可靠的科技队伍。

与此同时,由于苏联专家突然撤走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需要全面、具体地摸清家底,对项目、设备、材料、技术资料、技术难关,甚至岗位骨干,都需要分门别类,彻底弄清现状和问题,以便心中有数。

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二机部派我到兰州扩散厂蹲点,经过排队摸底调查,及时发现并解决了施工安装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弄清了200多个尚待攻克的技术难关。

部领导通过排队摸底,了解到最关键的问题是技术攻坚,技术过关。于是分别组成了若干三结合攻关小组,有任务,有措施,定人定时,广泛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开展了一场既热火朝天、又脚踏实地的群众攻关活动,这一活动持续贯穿于从核燃料到原子弹技术过关的全过程。为了争赶时间,我们提出了“顺排问题、倒排时间”的做法,即把中央批准的“两年规划”所规定的最后期限适当提前完成,排出的技术关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攻克。这一做法,使艰巨的技术攻关任务,终于顺利地按时完成了。

当时我在兰州扩散厂亲眼看到该厂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的群众攻关活动搞得很好,通过成千上万次试验,取得了47万个数据,攻克了全厂200个技术难关,使各方面工作能按计划顺利开展。

1962年9月,部党组鉴于各项工作已走向正规,就向党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提出1964年下半年,至迟1965年上半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两年规划”。这一报告很快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党中央、国务院为了加强

对这一特殊重要任务的领导,随即成立了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专委会,加快了各项工作的进展速度,为提前完成任务作好一切准备工作。

这里,要特别指出,周总理对我国原子能事业,特别是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作出了伟大贡献。

从1955年二机部正式成立,我国核工业开始上马,周总理就时时刻刻关怀着核工业发展的每一个步伐。在试验初期,他指出,核工业部门的工作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周总理的这一指示,高度概括了原子能尖端事业的特点和规律,指明了这一事业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对当时培养一支过得硬的核工业队伍起了很大作用,直至今日,“两弹”精神仍是我国核工业科技战线的巨大财富。

另外,有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事,虽然不算大,却使我非常感动。

一次,为了一个储量仅300吨的小富铀矿,由于它品位高,埋藏浅,需要尽快开采以应急需,但因缺少人力,无法开工,要请部队调几百名战士给以支援。我去见周总理,请求帮助。总理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要我再写个书面报告,然后批示有关部门给以解决,结果事情很快就办成了,铀矿及时得到开采利用,满足了当时的需要。

另一件事是,“两年规划”制订之后,周总理密切注视着二机部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和问题。一次,他离京外出,特派他的秘书周家鼎隔几天就来部了解一下情况。当时刘杰部长不在家,有几次都是由我向周秘书汇报,由他转告总理的。我如实汇报了情况和问题,请他转告总理:两年规划的实施进展较快,几个未了的关键问题,二机部正在全力解决,按期实现两年规划是有信心的,请总理放心。总理对工作抓得这么细,这么紧,更激励我们争分夺秒地奋进。

二机部为了让总理放心,加快“两年规划”的实施进程,抓紧解决了核燃料生产系统两个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一个是生产浓缩铀—235专用原料六氟化铀的工厂,一个是铀—235金属铀的冶炼和加工工厂,它们都是研制原子弹核装料不可缺少的,能否保证按期建成,是当时二机部领导和上级检查组最担心的问题。这两个厂本来都

应由苏联提供图纸和技术设备，后因他们毁约，我们就自己干。除了原子能研究所勇敢地用土洋结合的简法装置，承担了生产六氟化铀的任务外，兰州铀浓缩厂也利用化工车间的回收装置，生产出六氟化铀，连同原子能研究所生产的六氟化铀，已能满足铀浓缩厂初期生产的需要。以后，在这基础上我们又正式建成了一个六氟化铀厂，解除了六氟化铀厂缺项之忧。

与此同时，铀—235 金属元件冶炼加工厂的建厂任务也很紧迫，因苏联没给图纸，按原计划建大厂已来不及了，我们决定在玉门 801 厂内建一个比较简化的小型厂，以应急需。决定下达后，大家劲头很大，由原子能研究所和设计院共同设计，各有关部门赶到现场，在玉门 801 厂的统一领导下，日夜奋战。二机部特派我到现场帮助，并承诺钢材、水泥、设备等，要什么给什么，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记得我根据现场需要，向二机部发过几次求助财物的电报，都马上得到解决。经过上下通力合作，密切配合，我们只用了不长时间，就于 1963 年底把小厂建成了，解决了影响核工业全线联动的又一个缺项。

以后，当各项工作按计划进展，即将全线进入生产运转时，我在玉门 801 厂又抓了与迎接正式运转和加强生产管理有关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当时全国正在学大庆，我和刘杰部长也去参观了大庆，认为大庆人头顶青天、脚踏黄土的艰苦创业精神和高标准严要求的工作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于是，部党组决定派我到 801 厂搞学大庆的试点。在厂党委的领导下，我们通过学习大庆人的创业精神，宣传二机部企业在戈壁滩艰苦环境中的许多可歌可泣事迹，有声有色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评功摆好活动，发扬了正气，调动了群众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为迎接正式投产运转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件事是，按照“高标准，严要求”，抓好岗位练兵，严格执行纪律，加强管理工作。我们选择了一个分厂搞试点，建立严格的交接班制度和交接班记录，建立考试制度，要求值班人员对每台设备的重点部位做到“应知应会”，同时建立对每个人考核评定业绩的奖惩办法。这些管理工作虽是初步的，但对养成企业员工认真负责、一

丝不苟的严谨科学态度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64 年初，当“两年规划”进行到最后关键时刻，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直到浓缩铀—235 都已过关，能取得合格产品，有关部门对核爆炸的计算等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万事俱备，只等引爆核部件最后保质保时加工生产，拿出合格产品了。这一最后任务是由 801 厂负责，我又代表二机部赶到设在玉门的有关工厂督促完成任务。

浓缩铀—235 金属球是用于原子弹起裂变反应的关键核部件，它的铸造和加工在工艺技术上要求很高。当时工作中遇到两个难题：一是，铀—235 金属球在铸造时表面上总是起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久攻不下，不好解决，消息传来，牵动着上上下下多少人的心弦。二机部冶炼专家张沛霖教授一直在现场进行具体指导，由于我们没有铀冶炼经验，又无现成资料可查，只有自己反复试验，反复研究。一连几十天日夜奋战，从一周一炉改为一天一炉，每次出炉，大家聚在炉前，个个屏住呼吸，焦急地目不转睛地看结果。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总结，一次次再来。科学的态度，顽强的意志，认真的精神，终于使我们在冶炼和浇铸的温度、密度、角度和时间的合理控制上找出了原因，摸到了规律。几炉下来，不再起泡，成功了！几十张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熬红了的眼睛流出了喜泪。

铀—235 金属球虽然铸造成功，但对它的切削加工又是一关。对铀—235 金属球的精度、光洁度要求非常高，只能允许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的几分之一，几次试验都不理想。当时部内尚无这样高水平的车工，后来从武汉请来一位七级车工师傅，与玉门厂的车工共同努力，小心翼翼地一刀一丝，一丝一验，经过几天时间，终于切削成功，一个光亮、合格的核部件做成功了。作为原子弹前序列的核燃料工业各生产系统的各工厂、各科研设计单位，综其大成取得的这一最终成果拿出来了，放心地移交给核武器装配部门。这是一个应该记住的充满无数酸甜苦辣的日子，时间是 1964 年 4 月 30 日夜。同年 10 月 16 日，一声巨响，举世瞩目的我国第一个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

（作者系原二机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方 隼）

倔强老人孙大光

——《孙大光文选》序言

● 李 锐

大光同志与我同庚,都出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夕 1917 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随后入党。这时大光在上海已是团省委巡视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出身贫寒,只读过初中,16 岁从家乡安徽到上海当学徒,17 岁起就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而由上海到广东,由广东到川贵,由川贵转到东北,长期战斗在党的地下工作战线上。长春解放前,他曾任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局长。直到 1948 年,他才回到解放区党的干部队伍。

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都在工交部门做负责工作,但没有来往。1964 年,大光任交通部部长,当年大概是最年轻的部长,这说明他很有才干。“文革”时期,我们都身陷囹圄。大光于 1975 年复出,转向资源勘探最重要的岗位,任地质部部长。我于 1979 年平反复职,仍在电力部,1982 年转到中央组织部,主管“第三梯队”工作(选择年轻的省、部级后备干部)后,才同大光在工作上有些接触。当年以“四化”标准选接班人,即年轻化、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大光在这方面倾注了极大精力,显示出他的眼光、见解和走在时代的前面。1984 年 6 月 26 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他的一篇总结性文章:《建设第三梯队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开篇的几句话我最有同感:“我来地矿部工作已经九年多,深感地质工作必须由内行来领导,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来就像是隔靴搔痒。如果一大批领导骨干不懂或不很懂专业技术知识,就会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过去,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吃过没有知识的亏。”在地质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中,他已经进行了四年调整:“省局级班子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67%,专业技术干部的比例达到 70%。部党组成员六人,除

我以外都有大学或研究生学历,懂得业务的管理。部机关司局级干部中,有大专学历和专业技术干部达到 70%。”他还谈到:“对选第一、二把手,除政治上要坚强和有组织能力等条件外,特别应注意两个‘深’字,一是对战略问题的深谋远虑,二是在处理具体工作时的深思熟虑,特别注意他们是否善于团结一班人,是否能知人善任,是否有改革精神,勇于并善于开创新局面。”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回想当年建设第三梯队时的种种阻力,“有文凭没有水平”等等,他确是有胆有识的排头兵。有人曾写文章,说应给大光颁发一项“伯乐奖”。

我同大光更多交往,是在两人年近古稀,退为中顾委委员之后,每逢开会,见面就多了。大光少年时即酷爱文学,且喜运笔。在地下工作时期,读过《史记》和《中国通史》等方面史书。后来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仍挤时间读书,熟读《资本论》和马恩列斯著作,不仅文史哲,尤其经济方面有广博学识,这在我们党高级干部中是少见的。大光思维敏捷,思路开放,言语直率,胸怀刚正;经历了几十年风雨坎坷,始终保持着一个真正革命家的脚踏实地又大胆无畏的风骨,以及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感。记得在中顾委工作期间,我们几个老同志目极时艰,忧虑国是,想给中央写封建议信,我在电话里同大光讲了信的内容,他完全赞成,便让我代他签上名字。由于这封未能发出的信,还由于其他情况,我们几个人在一次会上受了批评。当孙大光被点名针对我发言时,他不随风,不趋势,站起身拒绝说:“我没有话要讲。”

我是喜欢“舞文弄墨”的。过去我并不知道大光善写文章,勤于执笔。这本《文选》共收文章

103篇,跨度67年。他委我先睹,真是一快。大光从16岁起便在上海、广东、重庆等地报刊发表了大量抗日救亡和政论文章,从经济、军事、政治到文化,涉及面很广,读来如见当年华夏大地的烽火硝烟,如闻国人老少之呐喊呼号,其真实、生动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担任全国交通和地质领导岗位期间,“文革”以前的几篇长文,第一篇就谈利用价值法则改进企业管理;其他从微观到宏观谈具体业务,可见工作细致深入。1953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长文《利用价值法则,改进国营交通企业的经营管理》,是批评当年交通部系统的工作缺点的,大光时任计划司司长,部领导曾不同意发表,经过力争,终得部长首肯。格于当年的政治气氛,参观大庆也还是多谈业务和技术管理;全国交通会议谈“五反”运动,今天读来也还有某种现实意义。最具个性的,还是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文章,或调查,或报告,或书信,或论述,或回忆,内容充实,直抒胸臆,读来倍觉亲切。从中可见大光对事业的忠诚,对工作的勤勉,对同志的友爱,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最能表现大光为人的刚毅正直和对历史负责的文章,是《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一篇写给中顾委领导同志的信,时间是1988年7月20日,当时正逢一场经济风波,银行提款,市场抢购。信中谈四个问题,一是物价问题,必须严格控制通货发行,并提高存款利率。二是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在经济理论和有关政策上,目前还相当混乱。过去40年最大失误是违背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的方针政策,经济建设遭到连续的大挫折,必须彻底批判经济战线还存在的极“左”思想,以明确今后路线。三是关于“透明度”,即公开化和民主化的问题。由于这年政协和人大两会民主空气活跃,提出一些尖锐问题,从而谈到党的会议定要大大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党的生活公开化、民主化,首先应开放舆论,依靠新闻媒介的监督,包括对党中央、国务院及其领导人的监督。四是党风和党建问题。这是全文的重点,篇幅最长。从许多重大贪污受贿案看,组织严重不纯,腐败风气严重地侵蚀我党。批评紫阳同志下去视察,谈的只是经济问题,没有抓党风建设,听听下面呼声,认为这是总书记的首要任务。从而具体谈到社会

风气之坏前所未有,讲了四点:①人们谈论“三上三下”:“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批评国务院成批进口豪华轿车,滥建楼堂馆所,南京重修一所高级宾馆,我们的国务委员、书记们住起来心安理得。高级决策机关和关键人物例外,就注定整党要走过场。②关于高干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社会上流言甚多(有真有假)。我在中央会议上反复建议,要把社会上关于高级领导的一些传言查清,公诸于众,以正视听。还主张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一律不要经商,已经担任职务的一律退出。③关于干部的使用,我们也还没有真正做到任人唯贤。④有些领导出行前呼后拥,里外三层,平民百姓怎敢倾诉衷肠?“党中央不能令行禁止,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长此下去,将伊于胡底?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岂是危言耸听?”这封信曾在中顾委大光所在小组宣读,博得全体委员的一致赞成和热烈掌声。

在一心为公方面,大光更是身体力行,堪称楷模。他是知名的书画收藏家,过去一部分工资用到这方面。1987年,他将191件古代书画和其他珍藏捐给安徽省博物馆(在地质博物馆展览时我去看过),所得40多万元奖金悉数献给家乡教育事业。1998年他又把所藏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李可染、吴作人、关山月、傅抱石、石鲁、黄胄、李苦禅、谢稚柳等近代当代大师、名家的作品(大多是画家相赠的)50幅义卖。将所得450万元再次捐助家乡办教育。我在报上见到这个消息,衷心感佩大光的高风亮节。

由于年事都高,身体欠佳,我们之间来往日少,不过我觉得,我们的心是时时刻刻相通的,尤其遇到重大关节事件时,更有此感。读着他的这些文章,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加深了对同年好友的感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光是一位不欲声形的智者,在夕阳晚照中,他一直以一种宁静的心态和目光,关注着党和国家的今天和明天,既抱着美好的期望,尤怀有深深的忧忡。我相信,这部《文选》会给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得到史识,得到激励,还会得到某些安慰和满足。

(责任编辑 方实)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 自己的灵魂”

——解读孙大光

● 奚 青

人的信仰是发自内心的,来不得半点勉强。建国初期的共产党员,也多是吃苦在先、享乐在后、最富革命朝气的一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一个青少年所看到的共产党员大多是贤人和仁人,那么他的灵魂肯定会受到感染、陶冶和净化。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年轻人连枪都没摸过,就打起背包跨过了鸭绿江;许多“温室的花朵”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最艰苦的边疆。傻冒么?愚昧么?不,那是受了共产党人伟大胸怀和表率行为的感召,所做的心甘情愿的选择。

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曾与毛泽东有过一次关于“周期率”的意味深长的谈话。

毛泽东当时很自信,回答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50多年过去了,执政党党风的建设,民主政治的建设,尽管做过不少努力,但距毛泽东所期望和保证的,还有很大距离,跳出那个恼人的“周期率”的问题,还是人们所关注的大问题。对于党风某些方面的滑坡,腐败现象的滋长,国人每每谈及,都不免唏嘘或扼腕长叹。大光亲历革命数十年,自然更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感慨。

有时,大光也向我了解一些社会上的情况,我都如实讲给他。我与50年代初期任地质部机关团委书记、现已离休的一位厅局级干部闲谈,

他说他看不下去党内的种种腐败,并举了一些实例,说明腐败对国家的祸患和对党心民心的瓦解作用。他说,腐败并非共产党的发明;而是古今中外都有的社会顽症、癌症,问题在于共产党是不是下最大决心、用最大力气去整治这种腐败。他对反腐败的不力和现实深感失望。……大光听了沉吟一下,说:“哀,莫大于心死!”

这种“心死”之哀,我曾深切地感受过。那是1990年秋天,我出差四川,发现奢靡之风草偃一时,重又抬头;一股赌博、跳舞的浪潮席卷巴蜀大地。在一个中等城市,有人承租了市政府的礼堂,将其改为舞厅,每天营业到午夜一两点钟,场场都挤得转不开身。

我问那个曾是文学作者的舞厅老板:“效益还可以吧?”

“不错。”他坦言,“每周单给市政府开几场,奉送;省里有人来,再开小专场;我还经常请公安局的人来消遣,所以谁也不敢来这儿捣乱。”

“那,光是卖出去的门票,就相当可观了。”

对方一笑:“说穿了,赚的就是腐败的钱。……”

我暗暗叹口气:当今之中国,有多少人在赚腐败的钱啊!

大光不是那种超然物外、颐养天年的人,他密切关注着国家的走向和改革开放的前景。有时谈起时势,他的眼里往往闪出高尔基那种鹰一般的犀利目光,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既而,他又静默下来,沉入托尔斯泰那种深深的忧郁之中。

经过认真思考,大光于1988年7月给中顾委两位领导同志写过一封长信,着重谈了党风问题:

从许多重大贪污受贿案往往有党员干部参与来看,我们党组织是严重不纯的,腐败风气严重侵蚀着我党。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整顿。我党的执政地位给党的建设提出了特别重大的新课题。战争和革命时期,我们有关党的建设许多理论,特别是少奇同志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确实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现在是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在和平建设的环境里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如何进行,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课题,需要极有分量的著作。

我认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必须深入了解情况,分析形势,拿出理论上的勇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一问题。但自从十三大确定党政分开以来,紫阳同志到各地去视察,谈的仍然是经济问题(当然,经济战略问题仍然是党中央必须抓的)。甚至深圳一个电站的并网发电,也以总书记的名义派一名书记去剪彩;却没有看到他到基层召开一些关于党风的座谈会,摸摸第一手材料,听听下面的呼声。因此,也就没有听到关于党的建设的带有启发性的论述。我认为抓党的建设应该是总书记的首要任务。

他在信中谈了关于党风的四个问题之后说:

今天,已不是一般的号召所能扭转的情势,中央必须下最大决心,采取一些重大措施,处理几件重大案件,包括一些大人物的案件,才能振聋发聩,震慑全国,张扬正气,打击歪风。我坚信我们的党还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坦途的。但这要看我们今后怎么做。我建议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周密准备的基础上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党风问题,并做出相关的决议。

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荃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伪饰,党性犹存,岂

能为个人之苟安计?我并且深信:我的意见在老同志中是有代表性的。不当之处,恳请批评。

最后,我想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的最后一句话:“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束。

读了这些有胆有识、仗义执言的文字,我受到了震撼。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据大光的夫人张刚大姐说,大光同志写完这封信后曾请她过目,并问她:“你怕不怕?”她说:“我不怕,你们中顾委委员不说话,谁说话?”

大光在信中谈到,特别要警惕那些抬轿子的人。这使人联想到南斯拉夫:铁托在位时,全国各地都大兴土木建总统行宫。有好多行宫铁托并不知道,也从没有去过。克罗地亚官员将海滨古城普拉市附近的一个海岛圈闭起来,供铁托每年到这里短期休闲,狩猎。这座“铁托岛”常年有300多名服务人员经管着,忙于培植树木,养花育草,饲养虎、豹、熊、鹿、羊、兔等禽兽。这个海岛,如今已成为旅游点,游人可以参观铁托住过的小楼,在他的会客厅和卧室里驻足。在参观的留言簿上,有人写下这样的话:

占这样美丽的海岛建行宫别墅,让这么多人侍奉,还是人民公仆吗?

一个为人民立下功勋的伟人,脱离了人民,又没有人监督,只能走向反面,变成人民的老爷,这是不是时代的悲剧?

在中国,又何尝没有过这样的事呢?1979年7月邓小平携家人游黄山时,保卫部门同样封了山:将从芜湖、南京、杭州等地来的旅游车全部挡



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期间,孙大光(左)与李锐(中)、钟子云(右)在一起

在山脚,令其调头返回;另将山上的游人提前赶下山。邓小平见山里没人,不禁感慨地问陪同人员:黄山风景这样好,怎么没有人来观赏呢?说明他不知真相。一群在山上的大学生从“清山”中猜出可能有什么大人物来了,硬是不肯下山,守在半路上等候,结果等到邓小平的到来并高兴地同他合影留念。(后登在《人民日报》上)

在1989年第4期《瞭望》周刊,登载了陈四益对孙大光的一篇访问记,文中引述了大光的一席话:

像我这样曾经做过“官”的人,过去或现在比我的“官”做得更大或略小的人,总之,一切代表人民执掌着一定权力的人,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严一点总比松一点好。当然,孩子大了,他们做的什么事都要做父母的负责也不公平,但是我们应该建立和完善一套防止权力滥用的合理机制。应该让孩子们凭本事、凭知识、凭奋斗,去完成他们的事业,而不是凭我们的权力、关系和影响。

清除腐败现象,我想,关键也在于我们是否建设起了比较完善的、防止腐败现象产生的国家生活运行机制,并严格地实行监察和监督。这种运行机制,这种监察和监督,要真正奏效,就一定要有党内民主,要让大家说心里话;一定要实行舆论监督,有透明度,敢于揭露阴暗面;一定要有群众监督制度,使一切丑恶行为成为过街老鼠。……

我们革命一辈子,就是为了把权力从腐败的国民党手里夺过来,为人民办好事。但是权力又是可以腐蚀人的,如果革命者被权力腐蚀了,用权力来谋私,那就有背于当初革命的初衷了。

是的,大光当年投身革命,就是要铲除旧中国统治者的腐败,以及这一腐败所导致的国家的贫穷落后。如今,有那么多已经被铲除了的东西,又重新泛起,他必然深恶痛绝。

在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我去看望大光同志,他正在阅读十五大政治报告的征求意见稿。谈到反腐败问题,他说:“我在上面加了一些字:反腐败必须雷厉风行、雷霆万钧、振聋发聩,才能收到成效。”我说:“能把您的意见加上么?”他说:“反正我该提的都提了。”

实际上,大光不仅是该提的都提了,而且身

体力行,该做到的都做到了:为人要正,他一生皆正;为官要清,他点滴皆清。

20世纪50年代初,大光任东北航务总局局长,在沈阳市内上班,张刚则在市郊北陵的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并和两个孩子住在那里。每到周末,一家人才能团聚。航务总局两个副局长提议并动员张刚调到该局的教育处来,大光坚决不同意,说夫妻不能在一个部门工作。50年代末,大光担任交通部副部长时,部里正好需要一位主管教育的司局长。有人提出把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的张刚调入交通部抓教育,大光同样坚决反对。

大光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更多的是身教。大光始终不许家里人和其他人用他的轿车,他说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不能干私事。大光复出时,彭真、薄一波、王首道等老同志尚未“解放”,大光常去看望他们。后来,这些老同志复职了,有权了,他就不去走动。但一些故去的老战友的夫人他还是去看,每年春节都拜望一下。有次,大光对司机刘群起说:我去看望一些老战友老领导,是因私用车,你记录下来,我付车钱。刘师傅说:你去看望一些领导,不可能不谈工作吧?这倒是公用还是私用,我分不清楚,没法记。大光想想,笑了,说是分不开,那就不记录了,但别人一定不能用这辆车。

据大光的儿子孙东梁讲,他一生只“蹭”过一次父亲的轿车。那是他读初中的时候,午睡睡过了头,醒来怕迟到就不想去学校了。大光问明情况,说学习一定不能耽误,我把你捎到学校去吧。

孙东梁在下放期间结婚,岳父是个普通工人。1977年东梁的岳父来北京看女儿。东梁对刘师傅说:我父亲不在,车也闲着,你能不能去车站接我岳父?刘师傅说没问题,我作主了。可到时又被东梁母亲挡驾了,她说,你姑姑身体不好,来北京也不接。

大光夫人张刚大姐作孩子们的表率,不坐大光的轿车。1984年,她从菜市口到北太平庄的北师大开会。她搭大光上班的车到西四,然后坐22路公交车去了北师大。

大光如此严苛,张刚这般自觉,似乎都有些不尽人情。然而正是这种不尽人情的恪守,使这

位共产党人之品行如清风朗月，于无声中为众人、为后代树立了榜样。

大光于1975年6月出任计委地质局局长，11月从和平里迁往百万庄申区居住。他发现餐厅里已经配了椅子，坚决退给行政部门，自己掏钱买了四把折叠椅。院子里需要绿化，他又是自己出钱，请刘师傅买一些芙蓉树、榆叶梅栽上。

这次乔迁，大光给儿孙东梁留下一个单元小房，另一个单元交还了地质部。五六年后，孙东梁所在的化工部分给他一套房子。他想把原来的小单元留给儿子结婚用，大光坚决不同意，硬让他把房子还给地质部。

可能与少年时代受苦有关，大光一贯讨厌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在部里上班，所有的职工都去食堂吃饭。大光不，他每天都自己带个饭盒，用小酒精炉热一下，吃得非常简单。有次，他和张同钰副部长一道去密云的一〇一队视察，开饭的时候，他带头和队里职工一样买饭吃，吃最普通的馒头和炒菜。还有一次，他和朱训、夏国治副部长从燕郊去廊坊的物探所和勘探所误了午饭时间，所领导让炊事员做饭，大光不让，随便吃了一点剩饭剩菜便办起公来。

多年来，公款吃喝之风一直没有煞住。大光无力遏止，只有严格律己。他经常请画家和文艺界朋友吃饭，百分之百都是自己掏腰包。1981年1月29日，是地矿部老专家、副部长许杰80大寿。大光提议，由他和几位副部长共同作东，在民族文化宫自费为许老举行了寿庆。

大光曾向中央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一律不要经商，更不要担任一些大公司的总经理一类的职务。他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但实际问题来了：孙东梁于1985年赴香港，担任化工部兴化公司副总经理，后为总经理，直到1990年。孙东梁去香港前，大光谆谆嘱咐他：我对你在政治上和业务能力上都是放心的，希望你千万千万不要在经济上有丝毫错误，一分钱的问题都不要出。东梁在香港六年，不是没有发财机会的，但他谨遵父亲的教诲，未肯越“雷池”一步，除了工资，没取任何“外快”。

大光自然也有求人的时候。有次他搜集到12把扇骨，便写信给安徽地矿局副局长王同康，请他代买一些宣纸，捎来北京作扇面用。这种小

小的开销，人们都不大在意，但大光却斤斤计较，在信中写明一定要付钱，否则他不要。

1982年大光到洛阳的两个地质队视察，市里领导知道后到住处看望他，并赠他一套唐三彩。大光自己收藏有许多珍贵文物，对这种仿古制品并不感兴趣，于是婉言谢绝。可对方一定要送，大光推辞不掉，便拿出些钱来，说我还是买吧。这套买下来的唐三彩带回北京后，被遗忘在办公室的角落里，连包都没打开。可不知谁向中央告了一状，说孙大光把洛阳的出土文物拿回来，据为己有。大光知道了很生气，当即叫秘书把唐三彩寄还洛阳。

孙大光艰辛革命数十年，无他嗜好，惟以书画自怡。到了晚年，他与夫人张刚将全部收藏的精品分两批或捐赠给博物馆，或义卖捐助教育事业。

第一次是在1987年6月，孙大光伉俪将191件珍贵历史文物全部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并将所得奖金40多万元转赠给寿县发展教育事业。这191件艺术珍品，有战国时期文物5件，唐、宋、明、清瓷器17件，康熙、乾隆年间墨砚8件，明、清著名书画家作品161件，包括文徵明、陈洪绶、徐渭、郑板桥等人的精品，仅清初大画家石涛的作品就达6件之多。上述藏品，有12件为国家一级文物。内中尤以明画为珍贵，曾被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借展。这191件文物，填补了安徽省博物馆馆藏37项空白，提高了该馆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

第二次捐赠，先在北京长富宫饭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接着在合肥、上海、香港和北京巡展，最后于1998年5月9日由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专场拍卖。拍品中有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李可染、黄宾虹、蒋兆和、潘天寿、吴作人、关山月、傅抱石、陈半丁、朱屺瞻、石鲁、黄胄、黎雄才、李苦禅、董寿平、谢稚柳、何海霞、唐云、程十发等大家的国画，或山水，或花鸟，或人物，皆为上品。这些画，大部分是赠给孙大光的，并有孙大光的上款。如朱屺瞻于103岁画给大光的《水仙图》，刘海粟题以“古松拿攫如苍龙，涛声战落天都峰”的老辣豪迈的《三松图》，谢稚柳、陈佩秋夫妇贺大光70寿辰的《青山松寿图》，王学仲在日本听广播得知大

光任地质部长后,遥制的《劲枝晚香图》,等等。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李可染的《九牛图》,乃大师之绝笔,估价为280—300万元,系近年国画拍品之顶竿纪录。

拍卖开始,在拍卖师的引导、鼓动和撩拨下,不到两个小时,50幅拍品一一槌定,全部售罄。

李可染那幅艺术巅峰之作《九牛图》,以200万元起价,持480号牌者高呼一声:“300万!”,一下子盖了帽。整个拍卖所得,除去发布会、巡展、宣传和场地等种种开销,太平洋公司按协议付予孙大光夫妇450万元。这450万元,他们不留己用,不留遗儿孙,全部捐给了安徽省办教育。

这天,张刚偕子女三代人来到现场,备受人们敬重。孙大光却没有来。我猜他不愿在这种场合露面,也是不忍看着自己搜求并鉴赏多年的旷世珍品,星流雨散而去!

我没有问大光为什么不留分文给子孙,但我想到了林则徐一副对联:

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我想,林则徐这些深涵哲理和卓识的文字,大抵也表达了大光的心境和思虑吧!

大光把全部文物和珍藏捐献给教育事业,决非一时冲动之举,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抉择;在这一抉择中,显然含有对腐败的极端厌恶和自己身体力行反腐败的意味。

谈及社会现象,大光说,历史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奏,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作为个人,我该做的,能做的,都尽量做了;其他的,我们这些人就无能为力了。

是的,这是他的自慰,自慰中也含有某种感伤。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讲,那就是:我已经做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近年,官员中的贪贿之风呈上长之势。中央在反腐败方面加大了力度,严肃处置了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败类,增进了广大民众的信心和寄望。“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大家更多期冀的,还是体制层面上多有改进,即解决从上到下的有效监督问题,这是长治久安之根本。《人民日报》就枪毙成克杰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严惩腐败 警

钟长鸣》,其中谈到:“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是我们党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必须标本兼治,常抓不懈。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发展的势头;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和管理制度上消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这与大光的主张是一致的。

进入耄耋之年,大光面对的一个重大人生课题就是生和死。古代有句话,叫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光追求的并非安乐,而是不计功名利禄的平淡,平淡而来,亦准备平淡而去。1989年1月21日,大光执笔写了一份《关于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给中共中央:

移风易俗,丧事简办,是我党一贯倡导的方针。组织遗体告别仪式,对死者无补,对生者无益。对于死者,他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而在他们去世之后,却要耗费国家和人民并不富裕的财力,这有悖于他们生前的追求和理想。对于生者,为了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部门领导、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中断工作前往;每次参加人数动辄数百人、上千人,要浪费许多工作日和宝贵精力。而且助长了互相攀比之风,实在是劳民伤财。马克思、恩格斯逝世时,参加葬礼的都不过十数人,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纪念逝者,发一纸讣告,在报刊上介绍生平,或发表文章回顾其功绩,已经达到了纪念的目的。对于一个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一辈子的人,去世后不给生者增负担,他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会更完美。

这封信,得到萧克、陈锡联、王林、王磊、王幼平、文敏生、刘震、池必卿、李力安、旷伏兆、罗青长、赵武成、赵健民、钟子云、郑维山、贺晋年、顾卓新、曹瑛、梁必业、韩天石、焦若愚、曾志、谭友林、谭善和、赵毅敏等25位老革命家的响应和签名,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这是真正的超凡脱俗,这是完全无我的境界,这是世界观的坦诚展现。能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司马迁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都应朝此方向努力和效法才是。

(本文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倔强人生》一书的部分章节)

(责任编辑 洛松)

克隆植物基因之父辛世文

● 聂 冷

现今,世人开始认识到,生物基因克隆和转移技术的发明,已使生物世界面临着一场空前重大的革命。

但是,人们也许还不知道,曾经有一名炎黄子孙在这场重大的生物革命中作出过关键性的贡献,并至今还在继续为推动这场革命的进展而努力奋斗。这名杰出的炎黄子孙,就是现正担任着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主任的美籍华人辛世文。

辛世文 1942 年出生于广东湛江,1954 年随父母到香港,入协同中学就读,继而考入香港中文大学的亚新学院学生物。1966 年毕业后教了一年中学,再进香港大学,1970 年获硕士学位,随即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1974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嗣后,他先后受聘担任威斯康辛大学助理研究教授和美国 ARCO 植物细胞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首席研究员和分子生物研究室主任。这期间,他曾深入巴西热带雨林,通过艰苦的采集,获得了富含甲硫氨酸的典型植物标本——巴西豆。回到美国的研究室里,他夜以继日地设计实验,深入研究,终于在 1980 年提取、并克隆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植物基因,同时第一个发现植物基因亦含插入顺序而被国际同行誉为克隆植物基因之父;不久,他又将克隆出来的巴西豆高甲硫氨酸基因成功地转移到其它植物,从而在全球首次证实转基因可增加植物甲硫氨酸含量及营养。

辛世文的科学发现无疑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他用实验表明了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图任意设计“制造”植物的童话已不再是天方夜谭,一个由人类充当“造物主”的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便有人戏称他干的是“近似上帝的工作”。但他本人却否定说:“我们做科学家的,只是分析基因,设计基因,改变基因,但不能创造基因。创造基因的,才是上帝。”

应用基因转移技术于农作物生产,人们将从自然基因库中提取某些抗旱、抗虫、耐瘠基因注入选定的优质作物,使这些作物不需使用除草剂、杀虫剂,甚至不必施肥和浇太多的水就能获得高产。人们还可以将牛的基因转移到大豆,将蝎子的基因转移到粟米,将人的基因转移到鱼类……总之,可以不受物种限制,随心所欲地组合出符合人类需要的各种新作物。在发达国家的



辛世文(中)与袁隆平院士(左)在试验田观察水稻颖花

生物实验室里,这些玩艺儿早在5年前就已经被生物学家玩成了正果;其中有相当一批如转基因大豆等等,已经走上了人们的餐桌。

辛世文提取的第一个植物基因,两年前已被美国先锋种子公司以800万美元的高价买去,辛先生虽然仅象征性地分得一美元利润,但他获得了ARCO植物细胞研究所的优异研究奖。

1987年,辛先生因眼睛对美国大陆的豚草花粉过敏,发生红肿、疼痛等症状;同时,他对在ARCO植物细胞研究所从事完全以赢利为目的的应用研究也兴趣不高,而选择到美国受花粉影响最小的夏威夷大学担任教授,并继续进行转基因研究,不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

辛世文加入美国国籍后,仍不忘祖国的养育之恩,对于祖国的科学事业一往情深。早在1980年,他就开始应邀担任了中国国家蔬菜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顾问和客座教授,后来更成为该中心的蔬菜种质课题副主任,为中国培训科技人员并开展合作研究。1990年之后,他又先后应聘担任了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客座教授,以及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植物细胞工程实验室科技顾问,并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上海植物生理所等众多单位开展着双边或多边的分子生物工程技术合作研究。1995年,他干脆远别妻儿,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专职讲座教授,并于1996年正式就任生物系主任。

辛世文是生物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研究领域的世界级杰出科学家,他的加入,给中国生物学界带来了生气,增加了一支重要的科研生力军。1992年,他代表夏威夷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和中国北京蔬菜中心合作的高赖氨酸蛋白改进谷物营养课题研究获得成功,致使三个单位共同获得一项美国专利。1993年,他发现云南中药马槟榔很甜,但又不含糖分,因而设想提取这种不含糖的甜素基因,并将其克隆转移到诸如西瓜等甜果中,以替换这些甜果中的糖分,使糖尿病人也能食用。于是,他再次与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北京蔬菜中心合作开展马槟榔甜蛋白基因分析及克隆研究,其成果又一次获得美国专利。1996年,他荣获国务院外专局给为中国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的“友谊奖”及奖章。1998年,他与北京大学陈章良教授协调,合作建立了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植物基因工程联合实验室,开展联合研究,交流互动,共同开发生物技术产品,共同培养研究生等等,以促进中国的植物基因工程研究及其在农业、医学 and 环境保护中的应用。稍后,他又与袁隆平院士、陈章良和常镇汝教授联合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香港科学资助基金(简称中港基金),开展了水稻和大豆功能基因组研究。1999年,他再次与袁隆平院士携手合作,用分子遗传技术开展杂交水稻品质改良和用分子标志技术改进水稻形态、增进抗病能力的研究。1999年9月,由他挂帅申请的“植物与真菌生物技术”研究项目,经国际专家评审团评审通过,获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3880万港元的卓越学科拨款资助。2000年,他又参与创办了



辛世文先生(左)与本文作者在实验田头合影

由中科院、香港中文大学及安信公司共同集资1亿元成立的“上海——香港——安信研究基金会”，并担任理事。最近，他还与上海植物生理所合作开展了水稻抗逆分子机制及应用研究。短短数年间，他已在中国现代分子生物工程技术研究领域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科研旋风，必将对我国生物科研水平的提高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产生重大影响。香港中文大学也因为他和杨振宁等一批杰出科学家的加入而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为了回报祖国和母校，辛先生现在一家分居三地。他的夫人梁淑庄仍在夏威夷大学研究生物神经，儿子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医学博士；一家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而且，他那双对花粉过敏的眼睛，在夏威夷本已康复，而现在在香港又开始有点过敏的症状了。对此，辛先生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承认，“这的确是很大的牺牲，不过，我们都很珍惜现在拥有的研究机会。我大约再过10年左右就要退休了，希望能够对中国将来的粮食供应有点影响。”

当然，中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港中大）各方面对辛先生的高度重视和求才若渴的礼贤态度，以及为之提供的广阔科研天地和美好的发展前景，无疑对辛先生也是具有吸引力的。

三

转基因食物问题，现在已经闹得满世界纷纷扬扬，莫衷一是。绿色和平组织等一批国际反对者认为它将是世界的祸害，并迫使部分国家的市场和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抵制态度。一些神学界人士甚至认为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都是对上帝的亵渎；只有上帝才有“造物”的权力，人类擅自越权，必将遭受惩罚。

对此，辛世文教授毫不含糊地站在转基因食物的护法者的立场之上，为转基因食物进行着坚定不移的辩护。他说：“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应该预测到人类今天会做基因工程，也只有他允许，我们才做得到。”他认为“人类不会自取灭亡，科学家有良知，懂得自我约束，到最后，一种转基因食物能否入口，都是由人类决定的。”而且，转基因技术最终将使作物不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这将更有利于地球环境保护和人类食物

安全。

辛世文教授还认为，21世纪的人类吃饭问题必将有赖于转基因技术来加以解决。现在世界人口每年增长2%，而粮食产量只增长1.1%，如不发展转基因食物，若干年后，粮食问题将使人类焦头烂额。有人跟他争辩说：“现在世界粮食不是不够，而是分配不均而已。”对此，辛先生有点光火说：“你不要给我侃政治，侃政治你要跟别个去侃。我是科学家，只是看整体粮食够不够。我只知道25年后，就算美国免费送粮食给非洲国家，粮食仍是不够。不够，就要发展生物科技。”

对于有人主张要等若干年后，人们能对转基因食物对地球和人类所造成的影响明确作出无害的定论时，才能允许转基因食物上市，辛教授反驳说：“我们要相信，科学家能够将转基因食物做到最好、最安全，就应该接受。每种转基因食物在上市之前都做过严密测试，保证对人体无害。难道什么研究都要等50年吗？一个人命有多长呢？来得及吗？有人说打手提电话会破坏人脑，难道我们全部停止不用吗？”

人们也许注意到，著名美国农业科学家、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博洛格博士最近曾激愤地为捍卫转基因食物的声誉而慷慨陈词，仗义执言。他指出，转基因食物绝对是人类的福音而不是祸害。只有那些最无知的人才会反对科学的进步和科学家为改善环境、改善人类生存状态所作出的努力。事实上，现在反对转基因食物的人，都是一些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科学的馈赠而对地球上数以千万计的穷人的饥饿和疾患麻木不仁，对世界所面临的粮食问题，以及对基因和转基因食物本身一无所知的人。真正懂得基因，了解转基因食物的人则无不在这场造福人类的生物革命的到来而感到欢欣鼓舞。

博洛格博士的观点，无疑是对世界前沿生物学家辛世文等的重大支持。辛教授对此深表赞赏。为了实现发展的宏愿，他每天从早晨8点一直干到深夜，买了一辆轿车还从未开出过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门。最后，为了现身说法，他保证自己绝对敢吃转基因食物。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致李岷阳同志书

● 吴 江

李岷阳同志：

你向我提出的是一个大题目，我只能以一己之见答复你，供参考。

一个政党的性质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成员的成分，主要取决于它的信念和纲领以及它为之奋斗的社会目标。同时，即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在各国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运动中，其具体内容和发展道路也会各不相同。

按照我们的习惯说法，共产党（还有劳动党等其他称呼）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可能适合于19世纪乃至20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一类国家的共产党的状况。中国则有所不同。中国原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非资本主义国家，前资本主义成分较多，受压迫的群众极其广泛，斗争的目标和所从事的运动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复杂得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按照那种下定义的方法，应当说，而且只能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农民先进知识分子结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拥有广大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世界上最应当受尊重的是历史事实，而不是任何教义。

（一）中国共产党是由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受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创建的。当时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以后激荡起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中，但是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只有个别的工人反帝罢工）。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将组织工人运动提上日程，并派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组织工会并领导工人斗争，主要在铁路、煤矿、纺织、海关等行业中，并大抵只限于上海、武汉、广州、天津等几个大城市。中国产业工人数量虽少，但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因此受几重残酷的压迫（特别是“洋人”的压迫），斗争性强，所以很有几次闻名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大斗争，特别是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但是，毕竟中国新旧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在城市

中的统治力量强大,微弱的工人力量难以与之抗衡。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入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而革命势力回旋余地较大的农村,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也正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农民成分居多,领导人中间真正的工人成分也极少,以致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连同苏联当时相当一部分人以及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不把中国共产党看成“工人阶级政党”,至少是抱怀疑态度。确实,按照书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农民只是一个没落中的边缘阶级,“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出不了工人阶级政党”。幸而这种论调后来很少听到了。因为人们终于认识到,正是这样一个党,依靠自己的信念,依靠这个国家里最广大的受压迫群众,实现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的独立统一——这正是中国全体人民群众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之所在、所系。因此,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全体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其中当然包括工人阶级利益。因为事实看得很清楚,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不实现民族解放和争得国家的独立统一,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人阶级利益和工人阶级的解放。

(三)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以后,为了摆脱国家的贫穷积弱状态,使国家达到富强地步,以便真正保障国家的独立统一,并为创造完全的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唯一的道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进行相应的文化建设,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切实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舍此没有别的路。一百多年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终于使我们认识到: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在社会划分为阶级之后同时又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终于取得国家政权之后的党,必须把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自己工作的首要地位,特别在当代世界各国的生产力在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推动下突飞猛进的时候更应如此,我们必须把这个任务看得十分紧迫。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提出我们党应当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疑是十分适时的、必要的。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四)依我看来,上述重要提示,也是为促进党自身的改革提供了一把钥匙。将一个领导革命斗争并在长期战争环境中深深打上军事化烙印的党,改造成为一个领导国家建设现代化的民主化政党,这一本来早应提出并完成的党的改革任务,实际上经过半个世纪之后仍未真正完成(证据之一是在过去半个世纪内党在国家建设所采取的措施方面的失误往往和军事化思想有关),这不能不实际影响党对国家的领导能力和对群众的影响力。现在,为了适应上述“三个代表”的要求,义不容辞应当重新把这一改革任务提上日程。其次,按照上述要求扩大党的基础。现在所谓“依靠工人阶级”不应再成为一句例行的“套话”。党领导国家后,特别当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工人阶级”概念无论在内涵上或外延上都大大扩展了,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着重提出工人阶级知识化的任务、现在如果离开知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发展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就谈不上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还有,最近不少人议论关于允许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这对共产党来说自然也是一个新问题。我认为,允许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私营企业主入党,无疑在目前中国条件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它并无损于党的性质,相反,有利于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扩大党在现代化企业中的影响,特别当中国经济“入世”后。与此同时,也应当重视工会,真正发挥工会在保障职工权益和监督企业管理方面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在中国曾出现过三种私人资本或私营企业:一种是旧社会的,一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再一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这三种私人资本或私营企业自应在理论上和实际社会功能上作出区别。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不少文章在进行讨论,故这里从略。你有何意见请指教。

此致

敬礼!

吴 江

2001年12月10日

江青复仇和扬帆蒙冤

尹 骐

十多年前,我对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冤案形成的原因,“完全是康生伙同江青一手制造的”的说法持不同见解,认为把一起重大的政治冤案归结为个别坏人的蓄意捣鬼和泄私报复,多少是把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然而现在我陆续见到一些新的历史资料,在具体的历史事实面前,我不得不修正我的观点。因为历史事实恰恰证明,就扬帆冤案的历史成因来说,个别坏人的蓄意捣鬼和泄私报复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把一桩原本并不复杂的工作事件引向了骇人听闻的爆炸性的严重后果。这个“坏人”不是别人,正是江青。

江青的“坏”并不单指她在政治上喜欢大搞极左的一套,更重要的是她这个人的思想品质很坏,极端自私,心胸狭隘,对人残酷无情,处事阴险狡诈,报复心特强。在她一生所干的数不清的坏事中,泄私报复扬帆,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剖析这一典型案例,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真相和总结历史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前因:1939年在延安播下的仇恨种子

1939年5月,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与威望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加强。这时毛泽东的个人感情生活,也正处于新婚不久大抵可以说是和谐美好的阶段。经过党内上层的一番争议,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于上一年的11月和江青正式结婚。江青也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中共党内的“第一夫人”。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延安接连收到了来自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两份机要绝密电报,内容都是反映江青在去延安之前在上海的某些不甚光彩的情况,并对于毛江婚姻提出异议。前一封电报发给了党中央,后一封电报则是以东南局书记项英的个人名义直接发给毛泽东主席。电报末尾,项英直言不讳:“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这两份电报,所反映的有关江青的情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项英本人此前一直在苏区和游击区工作,对上海以及江青在上海的情况并不清楚,单凭国民党的报刊传闻岂能轻信。但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的政委,出于政治责任感,对于上述传闻岂能等闲视之?于是有一天,在他见到原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现已来到新四军军部工作的扬帆时,便问他过去在上海是否知道电影演员叫蓝苹的情况。扬帆原在上海就是专门做文化工作的,他和蓝苹的前夫唐纳(马

季良)还一起共过事,有过密切交往,对蓝苹的情况当然就比较了解。于是项英就郑重其事地约扬帆谈话,向他了解情况。项英说:最近我看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报纸,上面刊登有蓝苹在延安的一些活动情况,还传出要和毛泽东同志结婚的消息,不知道是国民党造谣还是真有其事,希望你谈谈对蓝苹的看法。扬帆当然并不知道项英谈话的具体目的,但作为一名党员,对于党的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是没有理由也是不应该拒绝的。不如实向党反映情况,就是对党不忠的表现,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党性原则。于是扬帆就把他所知道的有关蓝苹(他还不知道蓝苹此时已改名江青)在上海的一些情况如实地向项英作了汇报:他大致谈了蓝苹在影剧界的一些闹矛盾、争角色的情况,又介绍了蓝苹与唐纳的婚恋以及后来的离异并闹得满城风雨的情况。关于蓝苹一度被捕不久又被放出,其间是否有自首叛变的传闻,扬帆只是实事求是地谈了“听说”,并未做任何肯定判断。谈话结束后,项英让扬帆将所谈情况写一个书面材料,并注明材料“是由曾在上海地下党做影剧界工作的殷扬所提供的”。(殷扬是扬帆当时用的名字)

在和项英谈话之后,扬帆以为自己不过是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写成材料和注明材料提供人的名字也都是对党负责的表现。此后就再也没有向别人提起过这件事或是向别人打听过什么。上面两份发往延安的电报,经由机要秘书叶子龙直呈毛泽东主席,但随后就被江青本人获悉。她将此电报的内容(包括提供材料人的名字)牢牢地铭记在心中。

巧合:扬帆的一项工作“失误”给江青提供了“复仇”可乘之机

光阴似箭,转眼间就跨过了14个年头。1953年的年初,扬帆已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高级干部,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部长,上海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他因患脑肿瘤要手术治疗,国内尚无这类手术,组织上便决定让他到苏联去治疗。他在莫斯科一家医院进行了成功的治疗后,被送到苏联政府所属的一家高级疗养院疗养。在这里,扬帆和同院疗养的蔡畅相遇,倍感亲切。有一

天,蔡畅忽然对扬帆说,江青也正在这里疗养,她准备去看望一下江青。她问扬帆是否认识江青?扬帆回答说:十几年前在上海时曾见过面,但并不很熟。蔡畅说,那就我们一起去。扬帆却有些犹豫:他知道江青这个人有些怪,如今又处在“主席夫人”的特殊地位。他想,当年还曾经给延安写过反映她历史情况的材料,也不知道她本人是否知道这件事。真不想去见她。蔡畅由于不了解扬帆犹豫的原因,便热情相邀:“在这里中国同志很少,既然你也认识,就一起去吧。”扬帆碍于情面只好跟着蔡畅一起去了。刚一见面,江青并没有认出扬帆来,蔡畅便向江青介绍说,这是你在上海时就见过的扬帆同志。江青就说是有些面熟的。扬帆立即补充说:我在上海时名字叫殷扬,扬帆是我到新四军工作时改的名字。不料扬帆无意之间的这一“补充”,却触动了江青的那根一直就很脆弱的神经:想起了当年的殷扬(即现在的扬帆)曾经向延安告过她的“黑状”一事。于是她马上撇开有关治病疗养一类的寒暄,立即就问起扬帆这些年来的工作经历。扬帆自然如实相告。江青一听说扬帆现在就在上海公安局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的扬帆

她的那根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又被再次触动：1934年她在上海曾经被捕过，这段秘史她一直就没有如实向党交代清楚。当年在延安虽曾受到许多同志的质疑，只是由于有她的小同乡，当时正掌握着中央“审干”大权的康生的竭力庇护才得以蒙混过关。现在上海已经解放，包括她当年被捕情况在内的大批敌伪档案资料无疑已经被上海公安机关所接收和掌管。一旦这些档案被泄露，其后果不堪设想。偏偏就是这个扬帆不仅当年就对她在上海的历史情况说三道四，现在又掌管着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大权，这实在是太危险了。不过这时江青毕竟已经跻身政界上层多年，已深知韬光养晦之计，特别是在蔡畅面前，更不敢张扬露馅。她只是不冷不热明知故问地对扬帆说了一句：“你是搞戏剧的文化人，怎么搞起保卫工作来了？”然后就把扬帆冷在一边，只同蔡畅大谈其养病治病的孤独与寂寞。

同江青见面之后不久，即在1953年的5月，扬帆结束了在苏联的疗养返回上海。江青也在稍后回到了北京。

历史需要作一点倒叙。扬帆在去苏联治病之前，即在1949年5月到1951年2月这段时间里，他在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期间，他所主管的肃反工作曾经出现过某些失误。这就是按照党的一贯方针和既定政策，根据隐蔽战线对敌斗争的需要，利用一批已经起义或自首投诚以及在被捕后有立功赎罪表现的原敌特人员，作为我公安机关的“特情”协助我进行肃反工作。实践证明，实行这“以特制特”的方针政策是完全必要并且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上海市公安局在执行上述方针政策过程中主流也完全是好的，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领导、华东局领导、上海市委领导都曾经给予过充分的肯定。就是在利用“特情”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也是局部的和个别环节上的疏漏，例如在某些工作安排上忽视了内外有别的界限，对个别人员的安排不当以及处置过宽等等，因而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其中有些则是由于外界不了解隐蔽战线的特殊斗争规律而引起的误解），但所有上述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早在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到上海视察工作时就已经被发现并及时做了纠正，明确定性为“工作性质的错误”。他向中央报告时，称

赞上海公安局纠正工作失误时的“态度好”，因为扬帆作为主管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于上述工作的失误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做了多次的检讨和说明。同年7月，中央公安部又曾派一位副部长再次到上海检查工作，了解情况。同年9月，中央公安部在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公安工作会议上对全国镇反工作进行检查总结时，也并没有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特别提出来，做进一步的追究。扬帆依然在上海市公安局长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做着领导工作。不过在此期间，上面虽然没有追究什么，下面，即在华东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内部发生了一些异常的变数。在一次会议上，一部分人借罗部长批评和纠正上海肃反工作某些失误的“东风”，着着实实地把扬帆这位在华东和上海市公安系统都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狠批猛揭了一番：这些批评和揭发，在有意无意之间就把罗瑞卿部长曾经明确指出的“上海的问题是工作性质的错误”的结论突破了；一般的工作性质的错误被提升为政治性、路线性、组织纪律性的错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批评揭发以及把错误性质升格，终究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其中有些人是受“左”的风气影响，宁“左”勿右；另外一种人则是由于受“压抑”而出怨气或妒贤忌能。而扬帆也确曾有某种“恃才傲物”的毛病。有此二端，其人际关系包括在党内争权夺利的矛盾斗争中的处境便是可想而知的。上级领导机关因此便不得不作出某些组织调整，1951年12月，便宣布免去扬帆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同时将原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许建国调到上海接替扬帆的工作。扬帆则被宣布调任华东公安部副部长。从加强上海公安工作领导的角度看，许是老红军又是直辖市副市长级的干部，其资历与威望都高于扬帆，扬帆对此也能够充分理解。基于工作需要，许建国并未让扬帆去华东公安部履行新职而是将他留下来帮助工作，不久又在征得他的同意后让他担任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协助许的工作，因为许还兼有其他职务。尽管如此降职使用，扬帆仍然按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切服从组织安排，认认真真工作。直到1952年的年底，他的疾病发作，经中央批准送他到苏联去治病为止。批准扬帆这个资历和地位都并不很高的干部去苏

联治病,临去之前,公安部长罗瑞卿又通过苏联专家给苏联有关部门打招呼要求给予关照,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还亲自为扬帆送行。这一切都说明,党对扬帆仍然是关怀备至,爱护有加,丝毫看不出有将他推向敌人一边的任何迹象。

火上浇油:扬帆被打成为“反革命”

风波的再起和问题性质的转化是在1953年的夏天,即在扬帆和江青先后从苏联回到国内不久,忽然出现了新的征兆和新的精神。这新征兆直接来自北京,来自高层,新精神是来自比公安部更高一层的指令。据上海市公安局当时一位负责人后来回忆:1953年夏天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到南京视察工作时,对他说,上海是帝国主义的老巢,扬帆包庇了很多坏人,那里的对敌斗争形势很复杂。说“扬帆包庇了很多坏人”这是罗瑞卿的一个新提法。从“工作性质失误”到“包庇很多坏人”意味着前者只是工作不力所造成,而后者则是包含了主观政治动机有问题了,这表示问题性质已经转化。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进一步证明,罗瑞卿的提法变化决非是他个人的措词有误,而是他已经是在“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指挥上海市公安局”开始对扬帆进行斗争了。正是根据中央高层的指示精神,公安部才又派出两位大员到上海去进一步收集材料。其工作方法也已不同于两年前的面对面公开谈话、开会讨论等等,而采取的是背靠背秘密调查,实际上也就是对付敌人的办法了。扬帆本人的处境也因此而每况愈下,先是被撤销了党组副书记职务和党组成员的资格,后来又撤去行政副局长的职务,完全成了一个靠边站的被审查者。

江青回到北京之后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扬帆在上海工作中的失误为何态度会忽然发生变化,这其中具体过程与某些细节至今也还没有人能够确切提供。主要当事人都早已过世了,也许难以彻底弄清楚。扬帆在上海的工作失误,公安部两年前便有报告上报中央,毛泽东应该是早就知道的。事隔两年,毛对扬帆这位名气与影响都不很重要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失误问题为什么会突然特别予以关注呢?是不是如叶子龙所说的那样,江在毛的面前“嘀咕”了扬帆而起了

特殊的作用,外人难以知晓。江青在苏联巧遇扬帆即殷扬这个14年前就已结怨的“仇人”,回国以后自然也会特别关注,并很快就知道了扬帆在上海的工作失误。以她的一贯性格,在毛的面前“嘀咕”扬帆一下也完全可能。如果这个推断还缺少必要佐证不能完全肯定的话,那么,接下来在杭州发生的一件事就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问题了。

事情也实在凑巧,正当公安部遵照上面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审查扬帆在上海工作失误问题时,1954年3月毛主席和江青都在杭州逗留期间,有人从上海寄了一封匿名信,通过杭州交际处直接转交给江青本人。信的主要内容是: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经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你应向中央组织部交代……。江青看了这封信后十分恼怒,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对她的恶意诬蔑,并且大吵大闹,哭哭啼啼。罗瑞卿当时也在杭州,江青便闹着要罗瑞卿立即追查清楚。毛泽东在江青历史问题上既是受蒙蔽,态度又是颇为矛盾的。一方面,据叶子龙回忆:有一天他“听到江青在和毛泽东嘀咕,是江青在诉苦,隐隐约约能听出江青抱怨有人在整她,希望毛泽东替她说几句话。毛泽东不答应,说:‘历史就是历史’,又说:‘既然你在上海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后来嘀咕变成了争吵,江青嚷道:‘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被朱德被击毙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又听到说:‘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我听到毛泽东声音很大地说:‘你这个人真混……’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是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是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引自《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从这段回忆文字看,毛泽东对江青在自己历史问题上的纠缠是很不满意的。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并不认为自己在江青的历史问题上受了什么蒙蔽。延安审干时康生已经亲自审查过并提供过书面证明。(见师哲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康生》)因此,当他看了这封匿名信后,也很生气,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江青的“嘀咕”和“吵闹”这时便起了作用,于是,立即把罗瑞卿找来下令



1992年扬帆与张爱萍(右)在上海

查办。罗瑞卿哪敢怠慢,立即将华东公安部负责人梁国斌等召到杭州一起分析案情,认为信从上海发出,用的是“华东文委”信笺,此人既能知道毛主席和江青的行踪,又对江青的历史有所了解,肯定是内部人,也决不是一般的干部。作案人可能就在上海。江青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她主动提供了一份上海有可能作案的嫌疑人名单,其中首先列出的就有扬帆、赵丹、郑君里等。于是上海方面立即作为一件绝密要案组织专人侦破,排查对象,搜集笔迹等等。其实江青所列的嫌疑人中,她最担心和害怕的是扬帆。因为赵丹、郑君里等文化人大都对她的绯闻丑事有所了解,而对被捕与自首情况则未必深知。只有扬帆当时既是地下党专做文化界工作的,解放后又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最有可能从敌伪档案中发现她的劣迹。因此,她就将这封匿名信和1939年向延安反映她的历史问题的电报联系起来,指出在性质上都是对她的攻击诬蔑和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还特别说明现在的扬帆就是当年的殷扬。她的阴恶用心已是昭然若揭;用“攻击江青、矛头指向毛主席”这样的罪名是可以致扬帆于死地的。

不幸历史正是朝着江青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的。匿名信一案把上海查了个天翻地覆(“文革”初期根据江青授意从上海押解到北京的档案材料显示,当时查对了约800名干部的笔迹,重点侦查的对象就有华东文联秘书长赖少其的

妻子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妻子等),一时也没有结果。后来终于破案,匿名信和扬帆并无关系,而是中央一位资深领导人的妻子写的,此人已经自杀。但是,匿名信事件中虽然没有抓到扬帆的把柄,没有能给他安上“攻击江青、矛头指向毛主席”的罪名,而在所谓“包庇很多坏人”的问题上根据北京高层的指示精神,很快就对扬帆进行“深批猛揭”而且穷追不舍。于是从1953年下半年起就积极搜集材料,到1954年7月,在锦江饭店召开的一次只有公安系

统少数领导干部参加的揭发批判会上,有一位领导干部就“义正辞严”地发言说:扬帆在进入上海后迟迟不办理反动党团特的登记工作,放纵这些人逍遥法外,又包庇和重用一些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扬帆这样做,如果不是国民党的代理人是不能解释的。这一发言既是一个讯号,又为继续揭批扬帆定下了新的基调。接着在9月间召开的公安系统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以及各公安分局的批判会上,扬帆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的提法便被正式使用。如此这般,扬帆这位在30年代就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抗战前夕加入共产党,长期在新四军和华东局担任保卫工作领导职务,曾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艰苦卓绝斗争的共产党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推到了敌人的一边,革命者一下子就变成了反革命。数月后,即在1954年年底,扬帆就被正式拘捕并押送到北京受审。

在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就和扬帆谈话,宣布“这次是由中央决定,交给公安部具体负责,对你进行政治审查”的。耐人寻味的是,徐子荣并不提扬帆的所谓“包庇重用反革命特务”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虽然已被人上纲上线,但事情本身并未发现任何新的材料,徐部长对此心知肚明),而是首先提出了扬帆的历史问题,特别要他将1939年向延安反映江青情况的问题交待清楚。当扬帆向徐具体说明

当年奉项英之命提供情况的经过后,徐郑重向扬帆交代:这些情况不能再扩散。以后如无公安部领导人的直接命令,你不要再写也不能再写这些材料。稍后,罗瑞卿又直接向扬帆追问过这件事,同样交待他不要扩散。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扬帆的“工作失误”问题是他当年反映江青历史问题挂上钩之后才被“火上浇油”,逐步演变,最终被打成“反革命”的。

到了60年代初,随着江青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以及她的野心日渐膨胀,她的活动就直接走到了前台。据《徐子荣传》透露,江青在60年代初就开始插手公安工作,几次向主持公安部日常工作并主管扬帆等大案的徐子荣施加压力,要徐对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中的所谓“叛徒、特务”进行追查。其实际目的也仍然是她对自己当年的那一段丑史放心不下,想要借公安部之手把追查30年代的所谓“叛徒特务”的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搞“贼喊捉贼”的把戏。但徐子荣并未完全听从江青的指挥。“文革”开始后不久,江青便迫不及待地用中央文革名义下令将已经先后判决结案数年的扬帆、饶漱石、潘汉年再抓起来进行审理,理由竟是公安部罗瑞卿、徐子荣等“包庇了扬帆等人”。紧接着,即1967年4月12日已经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的江青从军队抽调4名干部组成专案组,并向他们发指令说:“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派你们去上海收集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江青把一封由她和陈伯达共同签名的信件交给这4名干部,叫他们去上海找张春桥的秘书协助办理。他们从上海警备区军火仓库中找到了市公安局存在那里的有关档案,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管档案的人提出,另有一箱“通天”的保密档案要求他们带回北京去保管。他们向北京请示,江青指示说:“管他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一个字也不能丢。”这些所谓“通天”的材料弄到北京后,江青指示专案组两位组长先翻阅并写出报告,强调“别人不得插手,不许扩散”。但江青看了专案组的报告后却十分恼怒。原来这一箱“通天”的材料中,正保存着1954年写给江青的那封揭发她的丑史的匿名信,以及公安部为此立案在上海进行秘密侦查

所收集的全部有关材料,包括当年江青和唐纳结婚离婚的报刊图片资料等等。江青立即要求将这些材料全部销毁。无奈林彪虽然同意销毁,毛泽东却说“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江青为此而大发脾气。后来竟栽赃陷害,说杨成武要利用这些材料整她,硬是在谢富治等的监督下将这些材料全部烧毁。不久,江青又指令专案组直接提审扬帆,追查他1939年向延安发电报的事件。由此可见,江青对她的历史问题以及扬帆掌握她历史情况始终放心不下,心怀鬼胎。其中最令她担心的还不是她的那些风流丑史,而是她的被捕和自首出狱情况。她在“文革”前夕就曾向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询问她1935年左右在上海被巡捕房扣留的情况是否还存有指纹档案,并要公安局警卫处长直接到档案处去查是否有她当年被捕的材料。“文革”期间,江青又指令“饶(漱石)潘(汉年)扬(帆)”专案组去查找当年她被捕时曾经直接审讯过她的特务分子的下落,并终于查出该特务分子已于1954年被处决。这一人证的消失,才使江青多少松了一口气。

上挂下连:扬帆一案酿成的惨重后果

扬帆冤案的形成当然也不能说就是由于江青一人从中捣鬼所致,还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首先是那个特定历史年代形成的大环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你死我活,“左”风越刮越猛,再加上某些心术不正之徒落井下石,又有很多天真幼稚的人跟着摇旗呐喊,这就成了扬帆以及类似扬帆冤案出现的客观历史条件。

早在扬帆被押送北京受审之前,即在1954年的夏秋之交,中央公安部就已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专案班子。正如徐子荣所说,“这是由中央决定,交给公安部具体负责”的一项专案。案子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就是上海解放初期肃反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但在这时已被定性为所谓“扬帆包庇重用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重大政治案件。

此案一经定性,上下左右受其株连受害者就难以精确统计,其中被逮捕关押审查的就有700多人,还有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在牵涉到的人中,“上挂”的两人尤为引人注目。这就是间接和直

接领导过扬帆工作的饶漱石和潘汉年。饶漱石在扬帆主管肃反工作“失误”时是华东局书记，是当地最高负责人。他虽不直接领导扬帆工作，但扬帆利用“特情”帮助肃反工作以及任命一个重要“特情”人员担任咨询机构的负责人都是向华东局作了报告并由饶漱石批准的。这原也不是什么大错，因为扬帆同样上报了中央社会部也是得到社会部领导认可的。可偏偏饶漱石这时和高岗搞了个“高饶反党联盟”。扬帆既被定性为“包庇重用特务反革命分子”，饶漱石的反党罪行中也就多了一条和扬帆同样的罪行。而且“批准”也可以按某种阶级斗争逻辑，认定是“同谋”或“勾结”。从这一角度说，饶漱石被扬帆牵连加重了罪行。但扬帆同时又受到了饶漱石的牵连，竟被打成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成员。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亲自点名说扬帆和饶漱石之间是“没有明文协定”的反党联盟关系。实际上扬帆和饶漱石之间从来就只有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其私人关系并不很好。1944年饶漱石还曾经利用“审干”运动狠狠整过扬帆一回，如今却因为一项工作失误，两人被捆绑在一起互相株连了。潘汉年原是扬帆的顶头上司，在扬帆主管

上海肃反工作期间，潘汉年是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他们不论是私人关系还是工作关系都是比较融洽的。扬帆在利用“特情”工作方面的一些做法潘汉年也是支持和同意的。扬帆出事后，起初潘汉年也并未受到牵连。但当潘汉年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主动向党中央交代并检讨他在敌占区工作时曾经被挟持会见汪精卫又没有及时向党汇报的错误后，引起了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并立即下令逮捕审查。于是，他在扬帆“包庇重用叛徒特务反革命”的问题上，就由间接责任变成了直接责任。又因为那些曾被扬帆利用的“特情”人员中有些是潘汉年过去在情报工作中曾经运用过的情报关系，因而潘汉年就被怀疑是“内奸”。然后又按“内奸”这一思路七查八查，直到把这位曾经在情报战线上出生入死建立过无数特殊功勋的大革命时代就入党的老战士打成“内奸”、“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潘汉年问题的出现当然还另有其复杂的原因，但扬帆在肃反工作中的失误，即所谓“包庇叛徒特务反革命”的问题，却是认定他有“内奸”行为的重要罪证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就因为扬帆在解放初期一项工作的某些失误，经过后来的不断追究，拔高，上纲上线，直到定性为“包庇重用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政治事件，最终形成了一个大冤案，并且把三个本不相干和仅仅是工作关系的人捆绑在一起，在内部被定名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专案。在对外公布时，却又用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或简称“潘扬案件”）进行宣传造势，从而成为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件大案要案。

扬帆一案对下面的株连及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扬帆被送往北京关押审查后，上海公安系统立即开展了一场“批判扬帆罪行、肃清扬帆影响”的运动。原由扬帆主管的



恶贯满盈的江青，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

公安局有关业务部门的干部人人都要检查交待问题,几乎无一人幸免。相当一批业务骨干由于直接参与了扬帆主持的工作而被逮捕审查并最后被判有罪而长期坐牢,其中有些人因经受不了折磨而死于非命,更多的干部则被留在原单位进行审查。这些被审查的干部中即使后来被证明和扬帆并无“犯罪”事实牵连,但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只要是对被审查一事稍有疑义,就会又被打成“为扬帆翻案”的“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等等。至于上述所有受株连人员的家属亲友因此而遭遇的不公正对待那就不言而喻了。

扬帆本人为他的一项工作失误所付出的沉

重代价是:1955年初被正式逮捕入狱。1965年8月被判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5年8月被送往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安置劳动,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第三年即1979年才被允许回上海治病(此时他已患严重的精神分裂症)。1983年8月,随着潘汉年冤案的彻底平反才给他做出公正的平反结论。算起来,他蒙冤受屈长达28年之久,其中在监狱和农场劳动改造就有25年。1999年2月,他病逝于上海。

(原文较长,本刊有删节)

(责任编辑 程 度)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红墙回忆录	纪 学	48.00	5.00
叶剑英在关键时刻	范 硕	23.00	3.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			
分析与反思(上下册)	张 化 苏采青	59.80	5.00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纪希晨	49.00	4.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张湛彬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昨夜西风凋碧树	· 徐光耀	15.00	3.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下册)	曾繁正	39.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灵芝军 马立诚	23.80	3.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 江	20.00	4.00
斯大林秘闻——			
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	爱德华·拉津斯基	39.00	4.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16.00	3.00
包拯身前身后事	张国华	26.00	4.00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徐晓 丁东 徐友渔	26.00	4.00
野百合丛书(共六册)(邮购全套六册邮资费减半)			
之一 王实味——野百合花	黄昌勇	14.60	3.00
之二 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	晓风 梅志	18.80	3.00
之三 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	叶永烈	15.00	3.00
之四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	罗银胜	16.60	3.00
之五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谢 泳	14.80	3.00
之六 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	谢泳	16.60	3.00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是《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的作者推出的又一部力作。书中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写起,叙述了2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变革中思想界的“交锋”。那些人们所熟知的“华国峰与两个凡是”、“胡耀邦与文章救国”、“邓小平力挽狂澜搞改革”、“包产到户与人民公社的终结”、“失去邓小平后的中国”、“邓小平理论的确立”,以及姓资姓社的争论内幕,在书中尽现。人们能从书中体验到20多年来的变革,甚至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是中共建党后70年内是非曲折的大写真。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发生过不少悲剧,教训太深刻了,其主要表现就是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使许多忠诚的战士在貌似革命的口号下做了无谓的牺牲。甚至使党内多次面临分裂的危险。如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下的“肃反”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可以使我们警钟长鸣,不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史无前例的年代》作者是人民日报的老记者,“文革”中目击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采访了包括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华国锋在内的许多当事人,并参加了窝里斗“两案”的采访。他撰写的这个纪实作品,从1965年起围绕历史事件依次展开,记录了大量真实情节,是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 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

邮 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从激进军人到东北主帅

——《世纪老人张学良的多彩人生》(连载之二)

● 徐庆全 赵 杰

1901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苦难的年头。

这一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北京签订了。这个条约规定,中国人对外国赔款的额度是4亿5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是针对当时中国有4亿5千万人口而来的。这意味着,侵华的西方列强已不满足于将他们的“威严”施加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身上了,同时还要让中国普通百姓领受他们的“威严”。

这一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郭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乡间路上的张学良,也为此背上了一两银子的赔款额。

当然,自打车上出生、并在脑瓜子后面留下个坑、浑然不懂事的张学良还无法感受到这种“威严”,而他的父亲——此时正作草莽英雄的张作霖,则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国家所遭受的苦难。

与这种苦难相通连,27年后,张学良的生日,竟然成为父亲的祭日。

在张作霖于1916年任奉天督军之前,一直是作为草寇而流落江湖,浪迹于山林草泽间的。在张学良这15年的成长历程中,他跟随父母在兵荒马乱中四处颠沛流离,朝夕不安的生活自然会让他体会到这个世界的苦难,饱经忧患的烙印自然会深深地刻在潜意识里。

1916年,张作霖成为奉天督军,此后,又在日本的支持下,成了“满洲王”。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横行霸道,欺压人民。日本人的暴行,在幼年的张学良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等到年龄稍长,明白“国家大义”之后,他自云“一向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

作为一名军阀,张作霖是靠马上打地盘的。虽然是草莽英雄,但是张作霖也明白“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天下”的古训。这“下马治天下”,靠的是文化。而这是张

作霖最耿耿于怀的事情。贫寒的家庭出身,使张家与世门望族无缘,而多年的戎马生涯,使即使想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不可能。为此,这种愿望自然就寄托在了下一代。所以,他平日家教甚严,尤其对于他寄予厚望的张学良,更是悉心栽培,期有所成。

张学良早年没有进过学校,在他七、八岁时,张作霖担任了五营统领,稍稍结束了动荡不安的生活,张作霖便在驻地新民县家中设馆,请早年作过他的老师的杨庆辅为张学良的启蒙老师。1915年,张作霖在驻地奉天(今沈阳)找到了辽阳名儒白永贞,让他系统地教授张学良四书五经。1916年,张作霖又给张学良聘请了英文教师徐启东。儒学名师的教导,使张学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在囚禁中他遍览古籍,研读明史,有时还写点古典诗词抒怀言情,这与他早年的旧文学功底有很大关系。而英文教员的教导,则成为他接触欧美文化的开端,而他真正掌握英文,则在基督教会。

奉天府是东三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有外国领事馆和基督教会。当时,张学良曾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中有专设的英文夜校,所有课程全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后来,赴美国留学归来的阎宝航,作了青年会的总干事,他每天教张两小时英语,旁及国际情况,西方的风俗习惯使张对于教会有所理解,终于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晚年的张学良信奉基督也与年轻时的这段经历很有关系。但是,他那时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并不是为了信教,而是为了学习西方,学习外语和一些新的科学知识。及至随后子继父业,成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时,在他身边工作的顾问、秘书,亦仍有不少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都使他受益匪浅。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

接受西方教育的结果,使张学良了解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相比之下,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则让他十分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割宰,无复望矣”。

但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一次演讲,改变了他这一悲观的念头。

那时,青年会常邀请各地名流来此讲演,一次,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应邀前来。他在演讲中阐发国难当头振兴中华的思想,号召每一个中国人要奋起,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拯救国家。他认为: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因而提出了“中国不亡有我”的口号。

张伯苓的演讲,使在场的人很受鼓舞,也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说:“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余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1919年,张学良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1920年毕业,即成为父亲的上校卫队旅长。不久,又升为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军衔,与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混成旅一起,统称为“三八”旅,是奉军中的佼佼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由于战功卓著,晋升为中将,成为独当一面的第三军团军团长。

从一名激进的社会青年到一名军人,张学良在完成角色转换的同时,也具备了致力于国家统一富强的军人品格,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御侮自强的精神。

1921年,张学良应邀赴日本观秋操。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不但傲慢无理,而且具有挑衅的意味。他们故意让张学良参观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国夺去的所谓“战利品”。张学良义正词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甲午之战时之中国了。在参观日军操练后,他明确地对日本人说:“你们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

日本军容盛大,确实给了张学良很大的刺激,激发了他加强训练新式军队的思想。从日本回国后,在他主持下,郭松龄开始了对三、八旅的整训工作。在郭松龄的诸项整训措施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保境安民为官兵职责”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为了配合这项措施的实行,将《中国近代外祸史》列为官兵的必修课。

经过整训,三、八旅的战斗明显加强,在随后爆发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很快显示出优势。

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在1922年,是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争夺地盘的战争。战争初期,奉军凭着兵多将广和锐不可挡的士气,曾连连得手,打了一些胜仗。可是后来直军忽然反攻过来,并且攻势甚猛,奉军措手不及,有的地方还被抄了后路。在这关键时刻,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新军,连打了几次顽强的狙击战,才使军队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此之前,张作霖无论对郭松龄还是对张学良,都是抱着一种老人对孩子的心态,对他们在三、八旅中实行的所谓整训措施,并不在意。经过这次战争,张作霖不得不承认,三、八旅不但军纪严明,而且很能打仗。同时,他也认识到,军队组织不健全,缺乏懂军事的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是无法实现问鼎中原的目标的。于是,他接受了张学良等的建议,决心整军经武,扩军备战。

这以后,张学良在杨宇霆、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和一些老臣宿将的帮助下,用两年时间,对奉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顿。原东三省巡阅使署撤销了,改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下设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当时,陆军整理处总监是孙烈臣,副监是张作相、姜登选,张学良为参谋长,实际工作由张学良负责。

那时,积极参与整军经武领导工作的,除张学良、郭松龄、肖其煊等人外,还有一批从保定军校转过来的优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

秀毕业生。他们中不少人为振兴东北军作出贡献,并成为军队的骨干,原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就是“在这里任职时比较认真负责,博得好评,由此逐步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最后成为张学良手下的重要干部之一”。总之,在这个时期,为使奉军改变面貌,张学良是出了大力的,他虽然只是参谋长,但许多重振奉张军威的决策是他提出的,他实际是居于统帅领导地位。

经过几年认真的整顿和编练,奉军中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派军官陆续担任要职,对士兵的训练也加强了,并建立了一支拥有飞机 300 架、军舰 20 余艘的相当强大的空、海军劲旅,这都是当时国内各地军阀所无法相比的。

两年的整军,使张作霖的军队非同往昔,在随之而来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大胜。但张学良对内战则实在是厌烦了,对战争中“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的行为,时常“忏悔”。1924 年 1 月,张学良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表示:“决不愿为军阀”。为军阀,必然要参与对地盘和势力的争夺,不为军阀,自然是希望结束这种荼毒生灵的军阀战争。

1925 年 5 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使张学良深为痛惜,当即以自己工薪 2000 元相捐助,抚恤沪上此次死伤的学生,在致全国学生会电文中说:“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并亲率奉军教导队 5000 人奔赴上海,保护居民,维持秩序,慰问伤员。他郑重表示:“至带兵一层,因在津闻悉沪案发生后,外人尚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护华人生命财产。”他让学生代表到军中演讲,激发部队的爱国思想。

1927 年 1 月,英国在湖北制造了汉、浔惨案,震惊了全国。第二天,张学良即对一英国要人表达了对此事的看法:“中国南北之事,不过因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发生影响。”“此次英人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属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同年 5 月,他在写给在日本留学的胞弟张学铭的信中,更是袒露心迹说:“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造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还说:“一念同是同种,互相惨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后来,他曾沉痛地自省:“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

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因为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张学良希望父亲与自己想法一致。为此,他常为此向父亲涕泣陈词,力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是,草莽英雄张作霖大帅骨子里是军阀,征战就是军阀的一切,张学良的意见,难以使他回心转意,时不时还用烟袋锅子来回敬儿子。为此,张学良不得不使一些小的手段,来达到停止内战的目的。

1927 年,张学良率军南下时,即命令刘鸣九以他的名义,给蒋介石发出两三封电报,希望罢战言和,共商国是。但是,张学良的电报被张宗昌截获,便向张作霖告状,说:“我们在前边打仗,你儿子却给蒋介石打电报言和。”张学良得知后,并不害怕。他对刘鸣九说:“张长腿把咱们告了,你准备拿上电报稿和我上北京打官司去。”与蒋介石这次言和不成,但张学良还寄希望于下一次。

1928 年 1 月,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张学良在河南前线给结拜兄弟周大文和胡若愚发电,要他们到大帅府去酝酿停战空气。从前线返回北京大帅府后,张学良更是苦苦哀求父亲,停止内战,返回东北。在一次会上,父子两人曾有这样一番对话:

张学良在苦谏父亲不成的情况下问父亲:“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

张作霖说:“是啊!”

张学良又问:“冯玉祥呢?”

张作霖说:“也是啊!”

张学良又问:“阎锡山和李宗仁呢?”

张作霖有点不耐烦地说:“当然都是,这还用问。”

张学良这才亮出了底牌:“既然都是中国人,哪一个都可以来北京,哪一个管中国不可以?如果我们把东三省丢给了小日本,那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张作霖这才明白了儿子的用意,立即说道:“好!究竟是讲武堂出来的,有战略眼光。”

这一次,张学良才算说服了父亲。5 月 9 日,张作霖发出息兵的“佳电”,决议退回关外。张学良又以个人名义发出电报,提出“南北一家”的口号。

奉军退出京、津,北洋政府从此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的政治主张第一次得以实现。

1928 年的皇姑屯事件,张大帅一命呜呼。历史把张学良推上了前台,他始终按照息内争御外侮的政治主张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动。为此,张学良也走上了一条

迂回曲折的不寻常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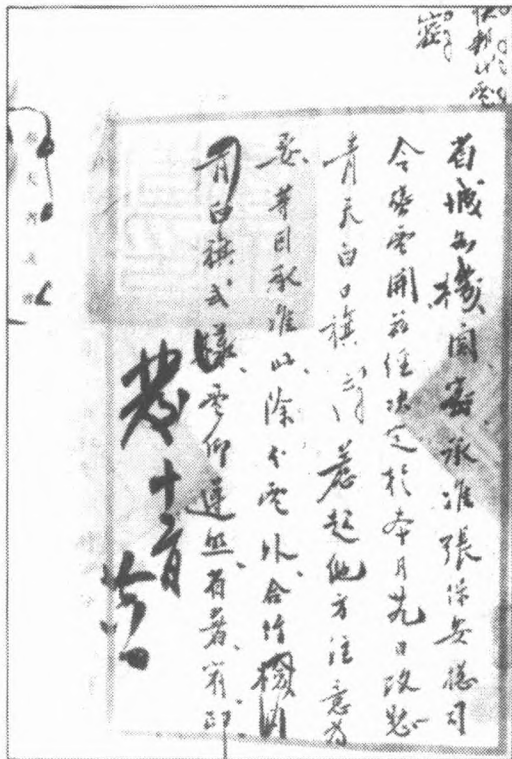
“皇姑屯事件”发生在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霖乘坐的火车,随着一声巨响,火光冲天,瘫痪在铁路上。在车里的张大帅被炸成重伤,抬回大帅府时,即使再高明的大夫也已经无力回天了。而此时张学良还在北京。

在人们的印象中,张大帅能在东北称王,是与日本人支持分不开的,张大帅也颇有知恩图报的思想,对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活动时常给予一些默许。张大帅为了获得日本人的支持而与日本签订了一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与日本有这样的关系,何以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历史学家作了很多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条是国际方面的。当时美、英和日本都在为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势力范围而寻找代言人,美、英支持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北进,自然就遏制了日本想将东北和华北连成一体野心,而日本支持的张大帅的部队主动撤离华北,则自然使日本调兵遣将用武力阻止国民军的阴谋破产。因此,日本人除了在外交上给张大帅和南京政府发出一个口气严厉的《觉书》外,军事上也无可奈何。这一腔怨恨,当然要撒在张大帅身上。

另一方面,就是张大帅与日本人的关系。在日本人看来,张大帅并不是个言听计从的傀儡,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问题上,张大帅有妥协的一面,但更有捍卫的一面。比如说,在平叛郭松龄时张大帅答应日本人的一些条款,他本人就不想兑现;再比如说,他在北京收到日本带有威胁性质的《觉书》,就气愤地说:“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们已经得到了那么多的好处,还不满足,还在到处伸手,连中国打回仗,他们都要干涉,也管得太宽了,这两年我张某虽然运气不好,可我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他们休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老张也不是那么好惹的!”张学良对其父的做法是坚决支持的。这样,5月25日。张大帅发表《北京政府正式宣言》复照日本政府,指出: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则予以谴责,提出“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当然,他们对日本也还留有余地,如在照会中也表示,他们将考虑日方要求,准备撤回东北。

日本人虽然也主张张大帅返回东北,但是决不是让张作霖继续统治东北。所以,6月3日张大帅乘坐的火车出发时,日本人就在皇姑屯埋上了炸药。

爆炸的当天,张学良就得知了消息,但对于其父的生死情况,还不知晓。但是,无论如何,他必须尽快离开



奉天省政府命令各机关,于1928年12月29日悬挂青天白日旗

北京,返回东北。在他准备秘密撤离军队时,奉天省长刘尚清派来的秘密送信人也到了北京。父亲死亡的噩耗,自然令他悲痛欲绝,但是,他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他明白,日本人炸死大帅,是希望东北群龙无首,奉军自己先乱起来,日本人就趁机占领奉天,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日本人自然要斩草除根,加害于他了。

令张学良感到欣慰的是,以刘尚清为首的东北的头领们,采取了秘不发丧的处理办法,尽最大努力制造了张大帅还安活人间的假象,并骗过了日本人,避免了东北的内乱。同时,也给他返回东北提供了时间。

形势非常严峻。张学良为避免重蹈其父的覆辙,在撤离北京时,剃光了长发,身穿士兵服装,化装成了一个伙夫,由卫队营长崔成义率领几名得力卫士护送,混杂在经滦州东撤的士兵当中,躲过了日本人的层层追查,安然返回奉天。

这一年,张学良27岁。以这样的岁数来应付事关东北局势乃至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如果没有过人的聪明才智和近乎于令人窒息的沉着冷静,是难以不露破绽的,而一旦露出破绽,则后果不堪设想。

令人欣慰的是,多年来的军伍生涯,使张学良具备了处惊不变的能力。

大帅阴魂已归天,但对外依然是“活”着的。在没有处理完令他棘手的事情之前,张学良当然还要让他“活”着。

拿着子虚乌有的张大帅的手令,张学良首先抚慰三军,对三军将士都给以充分的信任,稳定了军心。接着,将佳电内容付诸实施,息争议和,将关内所有军队全部撤回了东北。这两个举措,使东北政局稳定下来。

稳定了局势,张大帅可以死去了。6月21日,张学良从容不迫地发表了大元帅的死讯,说他因伤重抢救无效,已于今天子刻逝世。

那时,皇姑屯事件还依然被迷雾笼罩着,是不是日本人所为,并不像现在这样清晰。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从良知所作出的判断。所以,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人们自然把谴责的目标对准了日本人,上海一家报纸以醒目大字对此作了报道,并力透纸背地指出:“皇姑屯一弹,身虽惨死,心迹则大白于天下。”事实证明,良知并没有错,日本人的这一暴行最终还是大白于天下。

为大帅举行了公祭后,东三省的政权也顺利交接了。6月24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张作相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司令,张学良、万福麟分任奉、黑两省司令,但是张作相坚决予以推辞。他认为他的这个侄子,有足够的雄才大略来担当这一职务。因此,7月2日,三省议会联合大会召开,公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得到父辈的支持,从

此叱咤在东北的政治舞台上。

佩上了总司令的绶带,张学良丝毫不敢懈怠,因为眼前面临的局势依然不容乐观。

虽然东北的权力交接很顺利,并暂时遏制了日本人侵吞东北的嚣张气焰,但是,日本人亡我之心不死,第一步逼迫张学良实现其父生前对他所作的各项许诺,第二步则计划把张学良变成一个傀儡,以实现其霸占东北的野心。对此,张学良自然洞察得很清楚。如何与日本人周旋,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摆放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

还有一个棘手问题需要张学良来处理,那就是面对着各自拥兵自重的蒋、阎、冯、桂等军阀,如何表明态度的问题。当时,虽然蒋介石势力很大,但是国民党内也并不统一,阎、桂、冯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在这种局面下,东北何去何从,就成为各个军阀所注视的焦点。自然,为了增强自身的势力,他们都想把张学良拉到自己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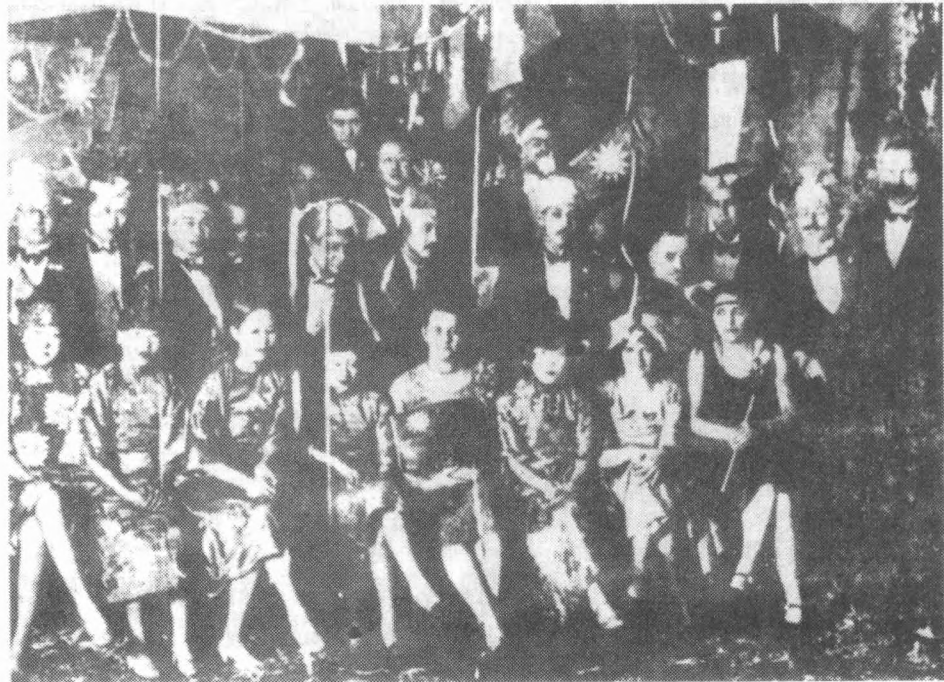
张大帅生前曾与张学良有这样一番对话:

张大帅:“你将来要做李世民。”

张学良反驳说:“时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渊,我也做不了李世民。”

李世民,是大唐的国君。张学良不作李世民,自然是不想称君作王。联系到他劝张大帅发出息争的佳电时所说的那番话,张学良的思想轨迹一直是,息内争,御外侮,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如果说以前他的这一思想

还要受大帅节制的话,现在,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司令,他现在完全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来考虑东北的政局,安排东北的归属。所以,在他就任总司令所发表的对内对外政策中,明确宣布:对内停止内战,“若非他方危害,危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争。”不参与内争,而是要把精力放在建设地方上,“厉行兵农政策,开源节流,剔除苛捐杂税,以利民生。”对外,则“将以最诚恳的态度与友国相周旋,求达共存共荣的目的”。这个“友国”,自然是指虎视眈眈



1929年新年,张学良在北陵别墅举行盛大的新年舞会,庆祝东北易帜

东北的日本了。

这个政策是通电全国的。张学良的对内不言战,民生政策,不仅是对东北,他也希望全国都这样做;对外的与日本相周旋政策,事实上是要把国家放在首位,他进而表示“决不能因为一党一派之利害危及国家”。

因为他不想作李世民,因为只想有利于国家,所以,他坦言:对于中国的统一很关注,谁有能力,谁来领导,“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言外之意自然是,各路军阀们,放下自己的地盘之争的狭隘利益,服从国家统一的大局吧。

以当时的局面而言,在诸路军阀中,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正如日中天。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国共合作,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功地领导了第一次北伐战争,并取得了人民支持。“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虽然背离了革命的初衷,但是,在张学良看来,蒋介石仍依然是有势力统一中国的人。这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他误把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北伐的功绩,全记在了蒋介石的身上,认为蒋介石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二是张学良早年对美、英的富强就很向往,现在蒋介石已然得到了美、英的支持,且其反苏、反共的倾向与他的思想又是一致的。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叙述的,他在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作战时,即曾派人或打电报给蒋介石,谋求和平统一。

当然,最关键的问题是,张学良对捍卫国家主权的问题毫不含糊。他不愿意当日本的傀儡,况且,皇姑屯事件的杀父之仇,使他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恨。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日本人磨刀霍霍必欲得东北的局势面前,以自己东北一隅的力量,难以遏制日本人的野心。而“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于是,他把统一的目光转向了蒋介石。

归附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选定目标容易,但要身体力行并不易。从张学良决定“易帜”,到在12月29日“易帜”最终得以实行,其间经历了7个月的时间。这样漫长的时间,所经历的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写成一本书的篇幅都够了。在这里,我们只能告诉读者一个大致的历史脉络。即使这个大致的脉络,想来人们也能体会到,如果张学良没有当机立断的机智和勇敢以及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信念,这一维护国家统一的举措很可能夭折。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一切军事行动,首先表达了和平统一的诚意。这

一举措,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回应。3日,蒋介石采取与日本东方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向张学良表达了和平解决东三省的意见。8日,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为代表,奔赴北平,与蒋介石协商“易帜”的有关条件。邢、王二人所转达的东北方面的条件是:1、东北政治委员会由张学良任主任;2、国民革命军不入东北;3、南京不干涉东北军政;4、南京不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5、热河划归东北。

10日,邢、王二人抵达北平。当天,便拜会了蒋、冯、阎、李等人,礼节性地进行了交谈,11日,才单独与蒋介石进行了商谈。针对东北方面的条件,蒋介石也提出了相应的条件:1、奉军出关;2、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3、服从三民主义;4、东北政治分会主任由国民政府委派;5、东三省归第六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委派。

或许蒋介石恐怕东北方面对这些条件有异议,在谈话中一再指出:东北只要“易帜”和服从三民主义,其他的都可以商量。

事实上,张学良的想法与蒋介石想法是一致的。所以,当邢、王二人向他汇报后,他不但没有异议,而且立即复电表示同意,并表示:“愿对国府服从到底”。为了加快“易帜”的步伐,他甚至提出,“易帜”的时间就定在7月24日,并决定,由热河的汤玉麟先于19日“易帜”,以试探日本人对此的反应。

7月19日,热河的汤玉麟按计划,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挂遍了全省。日本人立即出来干涉了。

对于日本人的反应,张学良当然有所预料。早在张学良谋划“易帜”的6月25日起,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即警告张学良,不要与南京方面接近。随后,总领事又转达了日本田中的信函,明确提出,反对东北“易帜”,并要求张学良履行所谓的“日张密约”,张学良对此漠然视之。

19日,热河“易帜”后,日本总领事再次见张学良,并递上了书面照会,警告张学良不得“易帜”。张学良以冷冷的态度回答说:“易帜”之事,是东三省当局和三省参议会联合会的主张,我不能拒绝。如果我拒绝,那只能辞去东三省司令的职务。会见不欢而散。

张学良虽然用东三省参议会联合会的名义顶回了日方的警告,但他知道,在是否“易帜”这个问题上,内部意见也并不一致。奉军内部的老派人物如张作相等,主张“易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境安民,与日本搞好关系;而新派人物杨宇霆等则主张尽快“易帜”,联合南京抵制日本。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张学良并没有立即作出决断。因此，在7月22日召开的会议上，作出了易帜缓办的决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张学良有什么退却的意思，他在等待时机。因此，会后他电告蒋介石，尽管缓办，但是，东北军拥护统一的初衷并不改变。

蒋介石当然理解张学良的处境，并在北平积极配合，为张早日“易帜”进行活动。一方面，他就日阻挠张学良“易帜”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并表示，如果东北“易帜”不成，将会率兵进攻东北。另一方面，他又电告张学良，同意张暂缓“易帜”的决定：目前“东北以保持现状为务，对日本之警告，只可暂时忍耐。”

但是，无论如何，“易帜”之事不易拖延，蒋、张二人均同此意。所以，7月25日，蒋介石又派方本仁同邢士廉赴东北，继续就“易帜”有关的问题进行协商。这次协商，又商定在8月10日“易帜”。

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在继续给张学良施加压力。8月4日，日方派曾任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以吊唁张作霖的名义，会见张学良，目的还是阻挠“易帜”。

会见开始，林权助在假惺惺地说了一番吊唁大帅的话后，即把主题转到了“易帜”上。他首先转达了日本政府对此事的意见：如果东北不与南京接近，日本将全力援助，维持东三省治安并开发东三省，土地交通日华协办，日有商租权，即允许日人在东三省杂居，废止日货在东三省一切关税。

说完，林权助又向张学良递上了田中首相的信，并讨好地说：如果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之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林权助根本不明白，张学良的“易帜”，决不是为东北考虑，而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所以，他见张学良对其利诱的政策并无反应，便威胁说：东北的事态不论怎样演变，日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如果张学良“易帜”，日本绝不会坐视不管。

在此后直至13日，林权助又多次约张学良谈，要张中止与南京的妥协，暂时观望。否则，林权助威胁说：“田中已具决心，将以强国意志自由行动”。张学良在几次谈话中，虚与委蛇，并不为所动。

8月9日上午10时，张学良携秘书王家桢前往日本总领事署，对林权助作礼节性的回访。这次回访，张学良本意是想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但事与愿违，却与林权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礼节性的寒暄过后，林权助便直言不讳地对张学良宣称：“日本政府此刻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东三省若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此刻劝贵总司令，暂时观望形势较为妥当。不幸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的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保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倘有不逞分子，尽可以武力弹压之可也。日本愿出全力以相助焉。”

张学良对这种明确不误的武力威胁语言，作了委婉的答复。他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本国为本位。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以余个人之力，固无为之何。余因顾邦交，以个人资格，对日本政府警告加以考虑。倘若以国际关系言之，余想日本政府亦决不甘冒干涉内政之不韪，并且日本政府以种种恐惧反对实现之事实，余颇不可解。”

林权助闻言，当即直截了当地说：“……简而言之，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

陪同在座的佐藤这时插话说：“田中首相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决心了。贵总司令若背乎首相心理，就将发生重大事情。”

张学良不肯当场表示懦弱，随之而答：“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心理而有所作为也。”

这场争论，自然是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争论到最后，日本的现任总领事林久治郎竟然指着张学良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

张学良见此，也勃然大怒。因为林权助是田中派来吊唁大帅的专使，所以，张学良不理林久治郎，转而质问林权助说：“这是什么意思？”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或许林权助也觉得林久治郎的话有些过分，便缓言平息了争吵。

当天，张学良向蒋介石发出一电，叙述了这次会谈的情况，并审时度势，同蒋协商对付日本的办法：“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动武，不但东三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三省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

显然，前一条则有战争的危险，而后一条虽可避免战争，但张学良决不愿意卖国。因此，他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是第三条“圆滑”：“暂时，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

所谓“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是张学良希望借助英、美，在“易帜”的问题上支持国民政府，抑制日本的势力。7月31日，他致电蒋介石说，在“易帜”这个问题上，若“英、美对我方有表示，则日方态度亦因而变更，彼既不能以暴力相威胁，而我自有应付之余地”。8月，张学良得知伍朝枢和孙科出访美国的消息后，25日致电蒋介石，让他告知伍、孙，在美国借机宣传东北易帜问题的真相，以争取美方的支持。

同时，张学良为了这“圆滑”的政策，不得不决定，“易帜”再缓。

不到而立之年的张学良，在如此复杂的形势面前，殚精竭虑，指挥若定，可谓帅才，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在回电中写下“卓见极佩”的评语。

关注国际动向，借助国际外力自然必不可少，而解决东三省目前的情况迫在眉睫。

日本在奉天城四周驻扎的军队有17000人，这个力量不可小觑。而且，多次不欢而散的会谈后，日方也在虚张声势。8月13日，日方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此举不言自明，当然是向张学良施加压力。

张学良自然心领神会，因而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0月10日，即“双十节”，张学良在奉天城内，举行了更加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向日本示威。

11月12日，张学良对与国家的利益有关的事毫不含糊。因日本在东北修铁路而引起人民的抗议时，他对东北大学的学生说：“余决非卖国之人，有损主权之事，决不退让。”

东北的民心也是与张学良的行动相一致的。11月，吉林省城吉林、长春、哈尔滨及吉长路局，先后举行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示威群众打出了“实行统一”的旗帜。吉林省教职员甚至制做了一千多面新国旗，准备在各商店的门口悬挂，以示东北归属中央。张学良虽然让吉林当局暂缓实行，但是民心所向，无疑给了他以极大的支持，同时也对日本施加了压力。

在此期间，张学良与蒋介石关于“易帜”的商谈一直没有中断。虽然“易帜”尚未进行，但蒋介石已把张学良纳入到国民政府当然的领导人之列。10月8日，国民党173次常委会召开，蒋介石被选为主席。在被选为政府委员的16人当中，张学良名列其中。但因“易帜”尚未举行，张学良是否应名列其中，曾引起一些人的异议。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专门对此作了解释：“如果要使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

国少些借口，要使东三省当局无观望的心思，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

蒋介石是用心良苦，而张学良当然并不会认为是否当国府委员而改变“易帜”的计划。此举无非说明，蒋介石也罢，张学良也罢，“易帜”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10月18日，蒋介石对张学良驻南京的代表胡若愚明确表示：“奉方外交由中央应付，不使汉卿为难。”以此解除张学良对日本人的顾虑。

这时候，国际间局势的变化，也使易帜减轻了许多阻力。美、英出于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抓住日本5月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的问题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日本国内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到1928年底，日本田中内阁已经内外交困，不得不放松对东北“易帜”的阻挠。田中无可奈何地对前去祝贺裕仁天皇即位大典的莫德惠表示：东北易帜，“此为国内政问题”，实际上是默许东北易帜。

时机成熟了。酝酿半年之久的易帜典礼终于可以举行了。

12月29日上午7时，奉天礼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了往日的五色旗，易帜的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各国使节除日本外，都应邀参加。国民政府以方本仁为代表，并在张学良宣誓就职时担任监督人。

宣誓完毕后，张学良即席发表演讲。谈到这次“易帜”的动机，他说，这是仿效先进国家（指日本）军阀奉还大权于中央，立表富强的做法。他强调：“我们今天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正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的统一。”

同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通电全国：“仰承先大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此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飘扬在东北四省的上空。

张学良的东北易帜的举动，结束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北洋军阀混战的局面，无疑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举动。同时，这也是张学良执政东北后，把“息争御侮”思想变为现实的初步尝试。

当时颇有影响的《大公报》评论说，“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湮没者在”，并大加赞赏说，“其富于国家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致中）

何处觅清高

● 刘志琴

“清高”，原绝非是个坏词。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兴起，它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频率颇高了一阵子。时过境迁，半个世纪过去，看时下行文，不论长篇短论，也不论褒意贬意，又有谁再言清高？无可奈何花落去，“清高”已经随着岁月流失了。

要说“清”字，中国人对此情有独钟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人的词汇中，许多美好的称誉，往往是清字当头：卓越的才能是清才，志行高洁的称清士，儒雅的文章称清文，廉洁奉公的官员称清官，纯洁的友情为清交，还有清秀、清名、清醇等等，凡属令人敬重的人品、举止、物性、事理，几乎都要冠上一个“清”字。“清”字再加上“高”字当属顶量级的称誉吧。然而，它曾是压在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重负。

远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知识界就已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初批判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肇始，就把知识分子那种温情脉脉，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加以鞭笞。接

踵而来的批判胡风、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十年浩劫，矛头不仅指向时政言论，就连温良恭俭让的性情，温文儒雅的风貌也在扫荡之列，致使那些素来洁身自好的，不争名于市的，不轻言附众的，不太随和的，不屑奉承的等等具有个性的知识分子，纷纷以清高为“的”进行自我批判。然而贬是贬，却又是臭豆腐一块，虽臭亦香，因为这清高与政治立场错误相比，是轻量级的，不会伤筋动骨，检讨检讨容易过关，因此不论是真清高，假清高，一旦要做思想检查莫不以“清高”自谦自责，运动过后倘若以清高作结论，已属不幸中的大幸，又不免在自怨自艾中沾沾自喜。这“清高”在知识分子情感中纠集的喜怒哀乐，真是一言难尽。

虽说这“清高”已经异化，但毕竟是淡泊明志的操守，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敬重，即使在极左思潮的暴风骤雨中，那些耿直放达之士也多以清高自重，在心灵深处葆有这一方净土。

可悲的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清高”似已

难有容身之地，且不说那粗制滥造，泡沫泛起的学风，败坏学术研究的声誉，就是那学术腐败的丑闻也是不绝于耳。为了争名争利争评奖争职称，不惜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拉关系，送红包，甚至雇人代笔，假文凭，假学历屡见不鲜。这种“学术惶祸”，打而不绝，浊浪滔滔，何处言清高？

在这一团乌烟瘴气日益弥漫之际，一位老学者的清风劲节，仿佛一缕春风吹向学人的心田，不得不使人耳目一振，清高归来兮！

这是最近参加“史学前沿理论研讨会”得到的感受。这次会议的本意，原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杂志社联合祝贺何兆武教授80寿辰的，只是因为何先生坚辞，才改为理论的研讨。殊不知，自当是会议上宾的何先生，会议的当天，突然“失踪”，引起与会者的惊叹。虽然我并不赞成他的“临阵脱逃”，但何先生一生埋头书案，不计功利，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要他一个谦和、淳朴，视荣华如浮云的老书生，当众接受花环，听颂歌，也是太难为了，对此我也甚为理解。他在史学界从来就有德艺双馨的美誉，改革开放之后，是他最先系统地引进国外的史学理论，翻译的史学名著其信、达、雅，在同行中有口皆碑，有的译文成为经典性的名句，被广泛引用。作为高龄的著名学者，笔耕不辍，近年来出版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理性批判》、《中外文化交流史论》等洋洋

百万言著作,其渊博的中外知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学术见解,无愧为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可他长期甘当人梯,无怨无悔,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凡是行内行外有学术问题相求的,他必尽心尽力,无私付出,对年轻人更是爱护有加。像这样一个忠厚长者面对应得的荣誉,却坚辞不受,怎

不使人动情。葛兆光教授说:“像他这样的学者,恐怕再也难找了。”的确,他惠予学术同仁的不仅是学问见地,更有当前最为宝贵的学德和学风。

诚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中,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正在发生变化,清高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以清高品评何兆武教授的治学为人,也不

尽恰当。但他在言行操守中的高风亮节,正如《孔丛子》所说:“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当今学风不正,学德败坏,甚或利欲横行泯灭良知,对此倡导一下“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的清高品格,永远不会过时。

清高归来兮!

从有人骂鲁迅想到鲁迅的绝笔

● 康 群

骂鲁迅的文章,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很多,有出于派性的,有因为误解的,也有想借骂出名的,不过,不少人在鲁迅逝世后,便真诚地写了文章忏悔。出乎意料,数十年后,骂鲁迅者又多了一个自称“还有一张敢开骂的嘴”的人。

鲁迅的文章当然不是“圣经”,不是不能批评,问题是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此公在《我看鲁迅》一文中有一段这样的话:“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常跟小人过不去。”

初读,涌上心头的是对这种调侃的厌恶;细想,感到的是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妄评。话不想多说,只举鲁迅逝世前几天的绝笔《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便可知鲁迅先生在上海时的为人、气度和胸襟了。

章太炎是鲁迅的老师,1908年鲁迅曾在日本东京听他讲段氏《说文解字注》和郝氏《尔雅义疏》。章太炎因为1903年在上海《苏报》刊登年轻革命者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作序,酿成《苏报》案被捕,关在西牢。邹容被判监禁二年,章太炎则被判三年,期满驱逐出境。1936年章太炎死,国民党政府颁布“国葬”令,实际没有实行。他们只说章太炎是“学术宿儒”,闭口不谈章太炎前半生的革命生涯。当时鲁迅患肺炎,更为骂章之风“心无宁日,天天气得要死”,扶病写文以正视听,实践鲁迅“待师之道”,即“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

鲁迅在绝笔中公开年轻人所不知的二三事,章太炎不仅写了人们看不懂的“虐书”,实际上他是一个革命者。

鲁迅说“章太炎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上还要大。”

鲁迅评章太炎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不挠者,盖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此话起到拒绝官绅文佞借着章太炎提倡读经复古的阴险,同时又写清楚章太炎后半生的弱点,“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这对章太炎的功效是非,评断公正,可谓知人论世,如此绝笔,不愧楷模。

如果这也是可以贬损鲁迅依据的话,那文学史上可能只剩下那些自称“有一张敢开骂的嘴”的人的一些胡话了。

(责任编辑 洛松)

青州思古

● 梁衡

山东青州为中国最古老的行政区之一。当年大禹治水后将中国分为九州，即有青州，禹贡图上有记。现在人们到青州来，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上山“拜寿”，二是到城里凭吊范仲淹。

出青州城南五里，有一山名云门山，自山脚下遥望山顶，崖上隐隐有一寿字，这就是人们要来看的奇迹。一条石阶小路折转而上，两边一色翠柏，枝枝蔓蔓，撒满沟沟壑壑。树并不很粗，却坚劲挺拔，都生在石上。树根缘石壁而行，如闪电裂空；树干破石而出，如大纛迎风。偶有一、二株树直挡路中，那是修路时不忍斫损，特意留下的，树皮已被游人摸得油光。环视四周，让人感到往日岁月的细密。

片刻我们爬到半山望寿阁，在这里小憩，山顶石壁上的大红寿字已历历在目。回望山下，街市远退，田园如织。再鼓余勇，直迫山顶，这时再仰观那寿字犹如一艘多桅巨船，挟云裹雾，好像就要压到头上。同行的一个小伙子贴身字上，还没有寿下“寸”字的一竖高。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寿字，是书法的精品、极品，日本的书道专家还常渡海西来顶礼膜拜呢。这是明代嘉靖三十

九年，青州衡王为自己祝寿时所刻，距今已四百多年。山上残雪未消，我在料峭春风中，细细端详这个奇迹。这字高七点五米，宽三点七米，也不知当初怎样写上去、刻出来，却又这样不失间架结构，点画笔意。这衡王创造了奇迹，但他当时的目的并不为艺术，正如古墓中出土的魏碑，今天我们看作书法精品，当年不过是死者身边一块普通的石头。衡王刻字希冀自己长寿百岁，同时也向老百姓摆摆皇族的威风。但是数代之后衡王府就被抄家，命不能永存，威风也早被风吹雨打殆尽。倒是这个有艺术价值的寿字，寿到如今。

从寿字前左行，进一洞，洞如城门，回望门外云气蒸腾，这是云门山的由来。由门折上山巅，如鲤鱼之背，稍平，上有石阶，有亭，有庙，有佛窟。扶栏远眺，海风东来，云雾茫茫，山川河流，远城近乡，都渺渺如画。遥想当年大禹治水，从这里东去导流入海，天下才得从漫漫洪水中解救出来，有此青州。从此，人们在这里男耕女织，一代一代地繁衍作息。范仲淹曾来这里为官，李清照曾在这里隐居，衡王在这里治自己的小天地。人们在这石山上摩崖刻字，凿窟造

像，噉噉喳喳，忙忙碌碌。唯有这山默默无言。我想当年云门山神看着那个花钱刻字、顶礼求寿的衡王肯定轻蔑地哼了一声便继续打坐入定了。我环山走着，看着这些从唐到明的遗迹，看着山下缭绕的云雾，真为云门山而骄傲，它蔑风雨而抗雷电，渺四野而越千年。林则徐说山：“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它无求无欲，永存于世。

从山上下来，到青州城西去谒范公祠。这是人们为纪念北宋名臣范仲淹所修，千年来香火不绝。这祠并不大，大约就是两个篮球场大的院子。院心有一井，名范公井，传为范公所修。这井水也不一般，清冽有加，传范仲淹公余用此水调成一种“青州白丸药”，治民痼疾，颇有奇效。如同情人的信物，这井成了后人怀念范公的依托。宋人有诗云：“甘清汲取无穷已，好似希文昔日心。”（范仲淹字希文）现在这井还水清如镜。正东有祠堂，有范公像及其生平壁画。祠堂左右供欧阳修和富弼，他们都是当年推行庆历新政时的主持。院南有竹林一片，千竿翠竹，蔚然秀地灵之气。竹后有碑廊，廊中刻有范公的名文《岳阳楼记》。院心有古木三株，为唐楸宋槐，可知这祠的久远。树之北有冯玉祥将军的隶书碑联：“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观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这两句话准确地概括了范公的一生。范仲淹从小丧父，家境贫

寒。他发愤读书,早起煮一小盆粥,粥凉后划为四块,这就是他一天的饭食。以后他科举得官,授龙图阁大学士,为政清廉,且力图革新。后来,西夏频频入侵,朝中无军事人才,他以文官身份统兵戍边,大败敌寇。西夏人惊呼“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边民尊称为“龙图老子”。连皇帝都按着地图说:“有仲淹在,朕就不愁了。”后又调回朝中主持庆历新政的改革,大刀阔斧地除旧图新,又频繁调各地任职,亲自推行地方政治的革新。无论在边防,在朝中,在地方,他总是“进亦忧,退亦忧”。其忧国忧民之心如炽如焰。范仲淹是一个诸葛亮、周恩来式的政治家,一生主要是实践,他按自己认定的处世治国之道,鞠躬尽瘁地去做,将全部才华都投身到处理具体政务、军务中去,并不着意为文。不是没有文才,是没有时间。皇佑三年,范仲淹到青州任知府,这是他的宦宦生涯也是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第二年即病逝了。《岳阳楼记》是他去世前七年,因病从前线调内地任职时所作。正如《出师表》一样,这是一个伟人后期的作品,也是他一生思想的结晶。我能想见,一个老人在这小院中,在井亭下、竹林中是怎样焦躁徘徊,自责自求,忧国忧民。他回忆着“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戍边生活;回忆着“居庙堂之上”,伴君勤政的艰辛;回忆赈灾放粮,所见到的平民水火之苦。他总结历代先贤和自己一生的政治阅历,终于长

叹一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声大彻大悟的慨叹如名刹大庙里的钟声浑厚沉远,震悟大千。这一声长叹悠悠千年,激励着多少志士仁人,匡正了多少仕宦官宦。《岳阳楼记》并不在岳阳楼上所作,洞庭湖之大观当时也不在先生眼前。可以说这是一篇借题发挥之作。范公将他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将他一生经历的政治波涛,将他胸中起伏的思潮,一起借洞庭湖的万千气象,倾泻而出,然后又顿然一收,总成这句名言,化为彩虹,横跨天际,光照千秋。

春风拂动唐榷宋槐的新枝,翠竹摆动着嫩绿的叶片,这古祠在岁月长河中又迈入新的一年。范公端坐祠内,默默享受这满院春光。我在院中徘徊,面对范公、欧阳公和富公的神位,默想千年古史中,如他们这样职位的官员有多少,如他们这样勤勉治事的人

又有多少,但为什么只有范仲淹才叫人千年永记,时时不忘呢?我想一个人只有辛苦的实践,诚实的牺牲还不行,这些只能随寿而终,只能被同时代的人理解。更重要的是,他要能创造一种精神,能提炼出一种符合民心,符合历史规律的思想。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是这种进步的忧乐观使范仲淹得到了永恒。

走出范公祠,上车出城。路边闪过两个高大的石碑楼,突兀兀地在寒风中寂寞。人说这是当年衡王府的旧址,多么威风的皇族,现在只剩下这路边的牌楼和山上的寿字。遥望云门,雾霭中翠柏披拂,奇峰傲立。在山上刻字的人终究留不住,留下的是这默默无言的山;把门楼修得很高的人还是存不住,长存的是那些曾用生命去推动历史车轮的人。

(责任编辑 程 度)



清乾隆时书法家张照所书《岳阳楼记》

青海的撒拉族之乡

● 杨兆麟

在我国 56 个民族的大家庭中，有一个在历史渊源、性格特征、活动能力、风俗习惯、皮肤面容、穿戴服饰等方面都独具特色的民族——撒拉族。这个民族约有 87000 人，其中 6 万多人聚居在青海省循化县，那里是全国惟一的撒拉族自治县。

从青海西宁市出发，乘汽车向东南行驶，翻越高耸的拉脊山，穿过深长的峡谷，约四个多小时，即可到达循化县所在地——积石山麓、黄河岸边的积石镇。撒拉族之乡风光很美，碧绿的草地，茂密的丛林，清澈的溪流，满山遍野的羊群。

撒拉族人原来生活在中亚的撒马尔罕一带，先民是西突厥人撒鲁尔族。在我国元朝时期，朮勒玛、阿合莽兄弟二人带领六七十人，赶上骆驼，驮着一部手抄的《古兰经》和食品、饮水、衣物等，“到东方去寻找乐土”。他们翻山越岭，艰难跋涉，历经两年多风风雨雨，最后剩下“十八条汉子”和一匹白骆驼，终于到达目前循化县街子乡的黄河岸边，定居下来，先是放牧、打猎，以后开始种植、耕作。他们渐渐和藏族、回族、东乡族通婚，绝大多数情况，是撒拉族小伙子把姑娘娶进门，撒拉族姑娘则和本族青年人结婚，繁衍生息，形成了撒拉族。撒拉族人的鼻梁稍微高一些，眼窝比较深。撒拉族姑娘皮肤细嫩，白里透红，身材修长，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儿”，尤其是撒拉族的发祥地街子乡的姑娘，长得更为俊雅、秀美，是名副其实的“一朵花”。她们蒙着深绿色的盖头，长长地垂到背后，走起路来，轻柔地飘动，风姿绰约，显得飘逸、潇洒，点缀街头，引人注目。

不仅仅姑娘俊美，整个撒拉族人都很有特点，他们聪明、勤奋、勇敢、强悍，吃苦耐劳，生存和生活能力特别强，而且观念开放，很能适应复

杂的环境。如唐古拉山这样的高海拔地带，筑路工程一般只有撒拉族人能够胜任。在达坂山上，亚洲最高的隧道就是撒拉族人打出来的。青海省海南州的一座水电站工地，两支施工队伍上去都垮了，最后还是从循化派去一支撒拉族人的队伍，才在一年半内顺利建成。从青海到西藏，循化县还有 500 多辆车从事青海至西藏高原客货运输，一年四季，来往穿梭，不分白天黑夜，刮风下雪，这支运输队伍也是由撒拉人组成的。

撒拉族人信仰伊斯兰教，不吸烟，不喝酒，但很热情好客。宴请贵客的主人，高兴时还会给客人唱一首撒拉族民歌“撒拉阿娜一朵花”，歌词大意是：

蒙着绿盖头，穿着红马甲（即马甲），
过去不出门，现在本事大，
敢在街上去经商，敢到黄河淘金沙，
苹果园里显身手，花椒树旁比高下，
撒拉人民真可爱，撒拉阿娜一朵花。

这首民歌曲调优美，歌词通俗易懂，含意深刻。已出版录音磁带。

撒拉族之乡有优美的旅游资源，当地的森林自然保护区孟达天池是一个避暑胜地，位于积石镇以东大约 20 公里处，周围是 3000 多米到 4000 多米的高山，山上长满了各种建材林、药用植物和观赏花卉，七月份平均气温只有摄氏 15 度多。山区有峡谷、瀑布、泉水、洞穴，可以钓鱼、划船、登山、赏花、探险，还可在万宝林里散步。在积石峡，黄河河道狭窄，两岸悬崖峭壁，落差大，漩涡多，水急浪高，可以和壶口瀑布比美。

在积石镇以西五公里处的街子乡，还有一处“骆驼泉”，它是横卧在松柏和花果林中的一泓碧绿的池水，池畔西侧有一只石雕骆驼，附近还

有一眼水井,反映出撒拉族人早年间从中亚来到这里定居的情景。

在“骆驼泉”东边不远处,一片民房之中有一座素雅、壮观的清真寺,属青海第二大清真寺,寺的铁栅栏门外,左右各存一座古墓,上面都长了参天大树,枝繁叶茂,那是700多年前,率领乡亲们从撒马尔罕来的尕勒玛、阿合莽兄弟二人的墓,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把他们葬在了骆驼泉旁、清真寺前。当时他们驮来的《古兰经》,是世界上仅有的三部手抄本之一,属于非常珍稀的文物。这一抄本曾经被国家有关部门收走,保存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后来,十世班禅认为,还是应该保存在循化县原地为好,经过协商,又在20世纪80年代初取了回来,收藏在这座清真寺里。

西距积石镇10公里处的文都乡玛日村,是已故十世班禅的故乡。在他的故居大门口,有一棵高大、繁茂的杨树,周围修了一道土墙,加以保护。听说这里原来生长着两棵杨树,如今只幸存下来一棵树,它在藏传佛教中具有神圣的意义。据了解,达赖和班禅圆寂以后,寻访转世灵童都有一个很长的、复杂的过程,要在绝对保密的情

况下,由德高望重的活佛进行占卜、算卦、神湖显影、明察暗访、察验真身等仪规,最后由中央政府批准。其中,活佛要前往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境内海拔5200米的高山之中,朝拜被尊为“佛母天池”的拉姆纳错湖,它的面积只有二平方公里,形状如同人的头盖骨。活佛在湖边进行祈祷、祭祀、诵经、献茶等佛事活动,并且独自静静观察清澈的湖水,据说会显现灵童所在的方向、环境和各种吉兆。他把所看到的幻影都写下来,包括在一家农户的门前长着两棵杨树,加以密封。等到确定了转世灵童以后才宣布。然后,他带领一些信徒朝着循化的方向寻访,找到了这家农民,了解夫妻二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而且品德高尚,有一个小儿子秉性灵慧,经过察验,才算初步认定。班禅家是一方形的院落,登上二层楼,正中一间佛堂,悬挂着十世班禅的大幅遗像,酥油灯闪闪烁烁。旁边一间,是他的母亲在1996年庆祝80大寿的礼堂,老人家今年已经85岁高龄,有时候住在西宁,有时候住在文都寺,人们均无缘得见。

(责任编辑 程 度)

《炎黄文化研究》第8期 现已出版

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主编的《炎黄春秋》增刊《炎黄文化研究》第8期已于近日出版。主要文章有: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张岱年
儒家文化与未来世界——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方克立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推进现代新文化建设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十年回顾与今后展望……………李宝光
实现“文化自觉”努力学习和创造新的中华文化……………费孝通
炎黄精神就是中华人文精神……………张岂之
以“科教兴国”为纲发展科学文化……………董光壁
新世纪中华文化走向……………陈连开
炎黄文化与生活同在……………刘志琴
轩辕传说与早期交通的发展……………王子今
战国秦汉时期黄帝传说的演变……………宋 超
黄帝与《五帝本纪》……………葛志毅
《山海经》中的轩辕之国
——黄帝族发祥地的考古发现……………陆思贤
山西方志中的唐尧遗存……………罗 珉
夏朝建立前后华夏族与苗蛮族的冲突与融合

……………刘玉堂 陈绍辉
新石器时代湖北地区的科学技术……………刘礼堂 李程
关于中国民俗文化中色彩的人类学思考……………王 政
《礼记·月令》与古代自然法思想……………王启发
中国人类再传神话通论……………董 璐
试论汉民族为中华民族各族共同的凝聚核心……………蔡家艺
兼容——巴蜀文化的主要特点……………袁庭栋
儒学思想与徽州文化……………方利山
试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影响……………费多益
孟子游历事迹新说(续)……………杨泽波
论唐文化的时代精神……………王永平
前七子后期思想转换与理学思潮……………黄卓越
晚清西方地学东传与中国中心观念的动摇……………郭双林
范文澜对传统文化的精彩分析……………陈其泰
马克思主义矢志不移地追求
——关于我父亲刘大年先生的晚年……………刘 潞
我的学术道路——从《资治通鉴》到人权研究……………张芝联

每本定价7.50元。欲购者,请到我社,或通过邮局函购(另加邮资1.50元)。我社地址见《炎黄春秋》版权页

历尽沧桑的雷峰塔

● 方柯

位于杭州西湖南岸夕照山上的雷峰塔,以“雷峰夕照”列入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曾作为西湖的代表景观,塔废后才由“三潭印月”取代。此塔因《白蛇传》的传说和有关的戏剧、影视以及列入语文课本的鲁迅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使其妇孺皆知。

1999年10月,有关方面成立专门机构,开始了重建雷峰塔的前期准备工作。为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历时10个月,对其遗址进行了清理,出土500多块,约3万多字的石刻佛经和大量金、银、铜、铁等质地的精美文物。之后,又对地宫进行了保护性发掘,地宫打开后,考古人员发现,不到一立方米的空間几乎是百宝箱,取出数十件制作精美的青铜器、银器、木器、玉器、丝织物、皮革、玻璃等文物,皆具有重大研究价值。如盘龙莲花座青铜佛像,造型举世罕见,象征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丝织品为唐代产于绍兴的著名越罗,可探索浙江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葫芦形小瓶是我国古代采用特殊工艺制造的铅玻璃,证明了当时科学技术所达到的程度,是国宝级文物;鍍金银质金涂塔精美绝伦代表了五代时期吴越国最高的工艺水平,也当属国宝级文物。专家们断定,金涂塔内供奉着“佛螺髻发”,即佛祖释迦牟尼的头发遗物,为避免损坏,文物暂不取出。

雷峰塔始建于公元975年,吴越王钱俶(原名钱弘俶,后避宋祖讳去弘)因黄妃生子,为感谢佛祖赐子供奉“佛螺髻发”和经卷而建。钱俶在碑记中称:“尊礼佛螺髻发,犹佛生存,不敢秘密宫禁中,恭率瑶具,创宰堵波于西湖之浒,以奉安之。”专家推算原塔高达70米,初建时七级八面,青砖塔身,外包木制廊檐。为建塔专门制作的砖中,有的镌刻佛像和捐助建塔者姓氏,有的侧

面带有圆孔,孔内藏佛经。1924年塔倒塌后经砖为人发现,砖内圆孔直径约六分,深四寸,下端封闭,装好经卷后,上端用木块封住。经书开卷处具名:“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佛家言八万四千者为偶数之极限,非实际数目),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奉。”经卷每张均以长四寸、宽二寸的白棉纸精印,纸表细腻坚滑,字体近于魏碑,是发现最早的宋初木刻印刷精品。据说解放前一张塔经标价两千大洋,按当时购买力价格可谓不低。

早期称该塔为黄妃塔,因在夕照山雷峰顶上,久之皆称为雷峰塔。北宋末塔遭雷击,顶部毁坏,南宋初予以重修。明嘉靖年间,倭寇疑塔内藏兵而放火,烧毁塔外木制廊檐,八面形制消失,塔身烧成赭红色,原秀丽俊美的山色塔影变得拙朴沧桑,至1924年倒塌前更是颓败不堪,以至鲁迅先生文中称:“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当然,这里面含有同情白蛇娘娘的成分。

除雷峰塔外,保俶塔、六和塔、虎丘塔等均为崇佛的吴越国所建造。吴越是五代时十国之一,开国者为武肃王钱鏐。钱鏐,字具美,杭州临安(今浙江省临安市)人,公元852年生。二十四岁时,被同乡人董昌招募,始为偏将,后董昌建杭州八都,任钱鏐为都指挥使。公元887年,唐廷授钱鏐杭州刺史。后加授镇海节度、浙西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

当时为镇压黄巢起义军,朝廷允许各藩王和节度使招兵买马,扩充军队,而这些人有了地盘和军权后,往往割据独立,拥兵自重,钱鏐却始终服从唐廷调遣。公元894年,越州刺史、威胜军节度使董昌叛唐称帝,钱鏐先致书劝其:“与其闭门作天子,使九族百姓受涂炭,不如开门为节度,

俾子孙富贵无忧。”继又遵从唐皇命令,讨伐董昌,扫平了越州。吴国杨氏称帝后,劝钱镠也自立,他复书斥其“凡为大唐臣子,理应各矢忠忱以扶唐室,……竟乘君难,而欲自立,乃蔑礼忘恩弃德背义小人所为。”

公元896年,昭宗又加授钱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镇东军(原威胜军)节度使。次年,赐钱镠“金书铁券”,券文称:“尔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志奖王室,绩冠侯藩,……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据传“金书铁券”唐代仅颁发四次,宋、明、清几代帝王都曾向钱氏之后索观“铁券”,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为唐代惟一传世“铁券”。)三年后,诏命取钱镠像,画于“凌烟阁”上。公元902年封越王,904年,封吴王。朱温建梁之后,封为吴越王,后又尊为尚父,加封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国王。

五代十国期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最破碎、战争最惨烈的时期,占据中原立国的所谓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皇帝像走马灯似变换,朝代更替频繁,维持时间最长的后梁不过十几年,最短的后汉仅四年;而十国(如加上契丹、南诏、渤海、于阗、东丹、大理等,远不止十个)当权者大都称王称帝,割据一方,互相攻伐,你争我夺。受害最深的是百姓,或被逼当兵,死于战火;或田桑抛荒,亡命他乡。再加上水旱虫等天灾,往往赤地千里,人烟断绝,甚至出现“人相食”,“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

钱镠在此期间主要采取保境安民之策,发展农桑、兴修水利、减赋薄税、开拓海运。钱镠统治中心在杭州,深感钱塘江大潮危害之重,因海水倒灌,盐碱浸泡,沿江大片田地无法耕种。钱镠看出如能修成江堤挡住海潮,两岸可得数万良田,增加大量赋税,便下决心征发民工修堤。为使江堤能经受住举世罕见的钱塘江大潮冲击,筑起石堤巨坝,堤外挖出土塘,放入竹笼,以石块投入,边上再以巨木并排打桩,称为“捍海石塘”,简称“海塘”,延传至今。在五代乱世之年,能完成如此浩大艰巨工程堪称水利史上的壮举。宋代文天祥赞钱镠:“筑塘射潮,非止一时之保安,实有千万年之功德。”此外,钱镠还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均修闸造堰,依气候蓄泄河水,避免洪涝灾害。这

些水利设施产生了显著作用,太湖流域农业有了很大发展,江浙遂渐成“粮仓”。农业发展促进了其它各业繁荣,苏杭亦始为“天堂”。

钱镠曾派人凿去江中妨碍航行的巨石,派大船出海开展贸易,输出当地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吴越的秘瓷誉满天下,历代奉为精品,前几年我国还举办过国际秘瓷研讨会,钱镠之母墓中出土的瓷器曾与“金缕玉衣”一起赴海外巡展,引起轰动。吴越的贸易航线不但到达山东、辽宁、广东,还远抵朝鲜、日本、印度、伊朗等国家,日本《本朝文粹》中载有与吴越王互托国书、礼物十余次,《朝鲜史略》中载有吴越王遣使致书劝高丽、百济休战和好。

钱镠一生坚持不肯称帝,不自立年号,中原朝廷几经更换,他始终称臣纳贡。临终前告诫子孙:“无图安康逸豫,勿得罪群臣百姓。”“善事中国。勿废臣礼。如圣人出,当顺之。”公元932年,子钱元瓘继位(继位前名传瓘)。公元941年,钱元瓘死后,子钱弘佐继位。公元947年,钱弘佐死,弟钱弘俶继位。年底,钱弘俶与军将不和遭幽,钱弘俶在得到可保全弘俶性命的承诺后,于公元948年初即位。几代吴越王悉遵钱镠所嘱,向中原朝廷称臣纳贡,并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自消国号,纳土归宋,促成了国家的统一。

唐末五代战乱使国土大量沦丧,大宋的统一在国家民族的历史上意义重大。历代有识之士对几代吴越王的功德赞赏有加,范仲淹、韩世忠、米芾、黄庭坚、王十朋、朱熹、陆游等人,均有诗文颂之。欧阳修称:“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不被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苏轼谓吴越:“其民老死不识兵戈,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岳飞赞钱镠:“穆如天神,恒文是匹,何以颂之,圣贤豪杰”,将他比作春秋称霸的齐桓公、晋文公。

近年来,浙江省将钱王墓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建了钱王陵园,计划投资八千四百余万重造雷峰塔,并已决定在西湖柳浪闻莺公园内钱王祠旧址上重建钱王祠,恢复吴越国三代五王塑像和相应建筑,西湖边将重现这些著名历史文化景观。

(责任编辑 吴思)

辛巳年的启示

——纪念徐霞客逝世 360 周年

● 艾 若



徐霞客逝世于辛巳年，时光滔滔汨汨流走 360 年，六个甲子轮过，又到了辛巳年。

霞客逝世，当年震撼了两部分卓尔不群的文化人。一为江阴、宜兴、靖江、吴江等地的家乡文化名人，一为当时文坛上的一批巨擘。震撼的结果是纷纷相互联系，奔走，收集，抄录，整理，编目，作序，写墓志铭，大力推崇后来定名为《徐霞客游记》的这部巨著。既然“宇宙间不可无此奇人，竹素中不可无此异书”，那么，只有把游记整理刊刻，好好保住，则徐霞客的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应有之义了。感谢上苍对徐霞客及其知音者的垂爱，一场空前未有的兵燹过后，果然有抄本逃过劫难，奇迹般保留下来。这是我中华文化宝藏之幸。

此后 135 年过去，到公元 1776 年，被冷落了两个多甲子的《徐霞客游记》正式出版了乾隆本。依旧是民间流传作用之不可抗拒，30 多年后出现了嘉庆时期更为充实的本子。此后，又是将近两个甲子的默然无闻，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多亏以丁文江为代表的文化界巨子的潜心研究，开始运用现代地学观点解读游记的科学内容。尽管游记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在又遭几十年冷落，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徐霞客及其游记这门学问，才得以脱颖而出为一鸣惊人之势。首先引起了地学界文化人的震撼——这是将近六个甲子以来的第二次震撼。以北京为龙头，“徐学”在江苏、云南、浙江、贵州等省市，兼及台湾，还有国外，如英、美、法、印、韩、日等国，四面八方，传播开去。这第二次震撼给我的感觉是，作为一门学问，对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热的兴起，是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所需，是应运而生，是时代的召唤。

六个甲子的回顾，我以为：一、60 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若是言之无文，不可能行之久

远，更不可能长眠后乍然复苏，复苏得如此理直气壮，令学术界斐然出现一道壮观的风景区。盖因游记文字之美，及揭示自然奥秘与其内外特征描述之精确。二、作为一个旅行家的徐霞客，开天辟地“游”出一部重视野外考察从而获得空前科学成果的巨著，徐霞客对于地学的开拓性功业，以及在地貌学上的领先世界的地位，是他同时代的一切游记作者所无法比拟的。三、若不是《徐霞客游记》中洋溢的令人仰望思齐的人格，其德行、其精神、其个性、其经历，有着弥漫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又怎能赢得守正不阿的东林诸贤及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语）的文学一派的青睐呢！又怎能赢得今天读者在人格精神上与之如此之热相呼应呢！

立德、立功、立言，分别为人生三大建树，有其一项耸立人间，已然不朽，设若三者皆备，实为世间少有。关于徐霞客及其《游记》的功绩，20 世纪 40 年代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早有记述。近年来又有大量专文论述其在地学上无可争辩的成就。又因《游记》所志，是其长时期广地域多视角的观察与研究，涉及到除地学、文学以外的更多学科，引起读者的兴趣。然而，就徐霞客的功德而言，这位旅行探险家的起点和基础，理应是旅游。因旅游才有游记（旅游文学），才有地学之发现。这一切，成就了徐霞客的人文大德。

徐霞客的成就及其历史性文化地位，竟然生发于旅游，这是令人深感兴味的题旨。始于游玩，始于赏心悦目，始于一种癖好。而这种癖好，凡是

吃饱了饭尚有余钱的人,尤其是文人,无不喜欢跑到大自然中去,这是人之常理,霞客也不例外。只是游来游去,时间长了,一个博学多才又多智的文人,实无法逃脱大自然对他的抚爱、熏沐、启示、陶冶,便在他的自由心性中,增添了更多自由及天人相处中所能获得的思想与文化的滋养。写日记是他的习惯,是他“游癖”愉悦独享之后的“记癖”愉悦独享,是滋味反刍,再次愉悦。人道他奇人,奇在哪里?我看出的是认真。认真到足以超越一切困难,不论自然界的,还是旧传统的。而且越游越认真,深入,求究竟,这游癖与记癖之前无古人,就这样以奇特方式展示出来。特别是西南游中所呈现出的霞客意志与奋进目标,穷实地考察之能事,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概,便成就了他那个时代那一批在各自门类中创造出尖端科学的先进学人中之一个特殊人。

试若从游记起点顺游记时序向其三大建树之终点走去,可谓一路风景,日新月异,逐时日地在丰富着霞客的知识、学问与思想。学者们运用发展的观点,顺应着游记所志时空的积累,触摸到了霞客思想的发展脉理,觉出他地学倾向的追求,是在逐步丰富与变异中形成的。有的学者将其游记分为两个阶段,即名山游的前期与西南游的后期阶段,颇为醒目。我意概括为:前主畅游,后主考察,而一贯的精神则是他不变的认真与求实态度,尤其是那热爱自然、与自然紧相爱恋的痴情。这种痴情,源于他个性中向往自在自由的追求,源于他家族、家风、家教中某种最能支配他的放达自主的影响,源于这个性与影响所导致的学养倾向。

中华大文化人所具备的文化基础,一般都是以儒、释、道三家学问相融和的一种积聚。不论自主哪一家,通其三家是其根底,此三家独擅胜场,各树一帜,又在文化的根底上相应相通。这根底,本质上都是以人为本,都是从“天道”,即宇宙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到“人道”,即如何在物质与精神之时空运转中生存与发展,都是人生的哲学。但又各有各的完整体系。虽然都尊“天人合一”,儒家强调社会人或天下人,释家强调人间人或平常人,道家则强调自然人或自由人。儒家着重仁爱,释家突出智慧,道家看重天性,也都是力求透视人与人的生存,如何在天地之间确定人

生主要准则。在处世层面上,儒家讲无为而治,释家讲无为法,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三者理论上靠得很近,实践上则气度各异。于是人们不难看出,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释家主和气。如果这三气融备一身,那就是美不胜收,过于琳琅满目了。徐霞客是一位精通三家的大学者,又本质上是诗人。这三家的学问,予他影响最大的,我以为儒家是其根底,依次为释、道。徐霞客生存准则置第一位的是以德为本,仁者爱人。为人行事,以正道、正义、正直为指导,便导出他的自强不息,洁身自好,待人至诚,尊重事实,勇于实践,事亲至孝,重义轻利等。在他那里,自然与人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关系,不只是思想上的,道理上的,而是行动上的,系于一生的。天人合一生发出对自然的爱,即一个仁者对自然之爱恋,体现着中华人对天地万物世代传承的崇敬而乐生的亲近心理。在自然与人文的审美结合上,在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友好相知相依上,在个性自由与人格精神的自我塑造与建树上,总之,在将“天道”与“人道”统一于审美体验上,《徐霞客游记》盖世无双。

《徐霞客游记》字里行间充满了佛学的智慧。佛学的自主意识很强,这与霞客的个性是合拍的。善自观、自照、照四周,认定天命无常,而为善是福。佛教以仁为一切智慧的根源,一切众生的种性,慈悲为怀为一切道德的基础。徐霞客精通佛学,常伴僧人。与僧人同吃、同住、同行。僧人是他可靠的导游,寺庙是他挂单的处所。《江右游日记》中叙述他匆匆一遇法号观心的和尚,因为两人都“通儒释之渊微,兼诗文之玄著”,便一见“即有针芥之合”,“设供篝灯,谈至丙夜,犹不肯就寝,曰:恨相见之晚也”。

恐怕霞客自己没有想到要立德立功。即使立言,也并非立圣贤之言与哲理之言,而且是辛辛苦苦写了那么多景观之描写,地貌之考察,异地之经历。如此激动过内心的文字,他怎能不视如家珍?故尔临终前不忘托好友季梦良“理而辑之”。

一切圣哲思想,都是超前的,其精神不灭。徐霞客的精神是超前的,无论他的人文精神与科学探索精神,他的人与自然的和谐,那种全身心的与大自然的情感交流,都应是21世纪人类的精

神先导。60余万字一言以蔽之：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科技伦理与作为人文学者的人文伦理的完美统一，也是科学家与文学家的伦理统一。有了这种伦理，科学不会走向对于人类与地球的危害，文学不会走向背离真、善、美的倒行逆施。自然科学伦理的根本原则是尊重、遵循、热爱自然，而不是蔑视、违反、伤害自然。人文学者与作家、艺术家的伦理根本原则是尊重人，尊重人的自由思想，热爱并体现自然与人的常绿相处，而不是对自然与人缺乏人本良知。徐霞客在这种科学精神与人本精神的内在统一上，是一位东方的圣哲。在信息时代到来的今天，纪念徐霞客的意义更为突出更为重大，作为文化伟人，他的文化指向是与今日全球之经济发展的方向一致的。徐霞客精神不

灭，纪念徐霞客以人为本的这种主旨，永远不能丢失。

去年春月，中国徐霞客研究会责成我以学会与江阴政府名义为徐霞客故居扩建游记碑廊写序。在几位朋友鼓动下，我诚惶诚恐接受下来，序中庄重地提出“游圣”这一崇高尊号之后，至今没有听到不同意见。而江阴今岁五月已如期落成了名之为“仰圣园”的徐霞客游记碑廊。眼下朋友们催我务必就“游圣”的思考写一篇文章，便涌出周公、老子、孔子几位古圣人，还想到杜甫诗圣、王羲之书圣的尊号。那么游圣呢？徐霞客能有谁人当得？这便是辛巳年对我的启示。

（写于2001年7月26日）（此文编者作了删节）

（责任编辑 洛松）

充满服务精神的《安徽老年报》

● 思 之

《安徽老年报》是为安徽六百多万老人服务的一张报纸。这张报纸的编辑成员多为退下来的“老新闻”，均有副高以上的职称。“老新闻”重操旧业，自是驾轻就熟，报纸也就办成了一张有较高档次与品位并且充满服务精神的一张报纸，在林林总总的报刊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现今，老年报要想取得社会支持是很不容易的，办报出现困难也是必然的。如何扬长避短，办法有三：一是运用专业报纸的特长。专业报纸不必像党报那样紧跟中心工作，可以适当地“杂志化”，时间性要求也不强，可以多发些可读性强的稿子。老年人经历各异，水平不同，城市与农村的差异更大，这就要设法多寻找结合点、共同点，求同存异，发些大家都爱看的稿子。二是立足于服务。老年报编辑大都是从党报社退下来的，多年来只习惯于灌输，就是“先生讲，学生听”，要求大家如何如何，至于服务，那是读者来信部和其它部门的事，编辑们只负责编稿、写言论，整个是居高临下的架势，如今来个彻底大转变，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但大家想到邹韬奋当年办生活杂志的认真服务作风，就觉得自己也完全可以做老年读者的知心朋友。这样，老年报的宗旨就定下来了。三是要有自己的特色。全国老年报不少，各有千秋，我们要有什

么样的特色呢，经过思考，确定两点，一是精新，二是有拳头产品。精就是坚持小报小办，放下架子，以质量求生存，现在许多报纸版面一扩再扩，令人望而生畏，这时也有不少读者和老同志劝他们扩版，他们经过反复琢磨，觉得还是不扩版为好。他们的口号是“惜墨如金”，绝不搞穿靴戴帽的文字，绝不用“正确的废话”，每个版面起码要十条以上的报道和文章；特别是有自己的声音，一版、三版均设言论专栏，让老年人议政、议经、议文，这就是“拳头产品”。

这样一来，办报人员思路就清晰了，确定一个版发新闻言论，一个版搞保健，一个版搞副刊，一个版搞文摘。多年来，《安徽老年报》就是这么办下来的，到现在已二十个年头了，赢得了读者的赞誉，特别是二版保健更受老人特别是农村老人的欢迎，他们都剪贴成册，一有毛病就在上面找方子，解决了不少问题。同时，报社对读者要求基本做到每信必覆，对读者求助总是想方设法。比如有病求治，他们总是找到医德医术均好的医生，给予书面诊断；老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他们总是找有关部门尽量予以解决；老年人来访，报社都一一细心听取，能帮助的尽量帮忙。现在老年人都称这张报纸是他们的知心朋友，报纸也年年获得出版部门的奖励，成为一张优秀报纸。

喻宜萱与《康定情歌》

● 方辉盛 文有仁

不久前,我们拜访了这位今年已92岁高龄的喻宜萱老师。尽管时隔50多年,老人仍记得我们,而且她风采依旧,身体健康,双目炯炯有神。当我们谈到《康定情歌》时,她激动地讲了当年她演唱这首民歌的经过。

她说,《康定情歌》是1947年国立音乐学院学生吴文季在康定采风时收集到的。它最早的名字叫《跑马溜溜的山上》。吴文季带回这首歌后,由音乐学院著名作曲家江定仙配了曲。同年,我在南京俱乐部举办独唱音乐会时,演唱了这首歌,伴奏的就是江定仙。这首地方色彩浓郁,旋律优美的民歌经喻宜萱演唱之后,引起轰动效应,第二年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又为她录制了唱片,从此这首歌也就传扬全国。1949年,喻宜萱到巴黎、伦敦考察期间,又在法国、英国各地举办的演唱会上,第一次把它传到了国外,深深吸引了外国友人。

喻宜萱,江西人,1909年出生于萍乡县清溪乡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是清朝翰林,父亲喻相平为清朝末届举人。他们虽是封建世家,但思想开明,能接受新思想。喻相平年轻时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喻宜萱的几个姑妈都相当有学问,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喻宜萱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自幼就爱读书,对社会上存在的重男轻女陋俗非常反感,立志要多读书,长志气,为女性争光,靠自己奋斗走出人生之路。她从小学到中学,成绩都名列前茅,音乐课更是优异,自幼就显露了音乐的天赋。

1926年,北伐军打败军阀孙传芳,开进南昌。此时的喻宜萱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在民众革命情绪感染和新思潮的影响下,她的眼界进一步开阔。次年秋,全家移居

上海,在面临升学选择时,她先是出于救国愿望,想学一些富国强民的本领,决定考理工科,后在父亲的坚持下,1928年春,投考由刘海粟任校长的上海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图(画)音(乐)系学钢琴。

图音系主科老师发现喻宜萱声音条件特别好,就在上钢琴课的同时给她单独开声乐课,还多次安排她在学校联欢会和小型演出会上独唱,发挥她的声乐才能,激发了她对声乐的兴趣,以至到了着迷的程度。

1929年夏,她又考入了我国当时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院,并由钢琴科转为主修声乐,从此决定了她终生事业。

音乐院的创办者是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奠基人萧友梅,教师队伍中包括著名音乐家黄自、韦瀚章、查哈罗夫等。喻宜萱在这样一个音乐群星璀璨、人才济济的艺术殿堂中受教,使她的声乐天才发挥到极致。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全校师生走出校门,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中,举办募捐演出,喻宜萱每次都满怀激情地进行独唱或参加合唱。演唱黄自创作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爱国歌曲。热血沸腾、铿锵豪迈的抗战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唤醒了民众,同时,也教育、感染了喻宜萱自己,激发了她的爱国热情。从此,不管她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在举办的无数场合合唱和独唱音乐会上,演唱爱国歌曲始终是她的主要节目。

1933年,喻宜萱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的首届毕业生。毕业后,她先是在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任助教,1935年去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除了攻读有关声乐方面的课程外,她



1948年7月在兰州举办独唱音乐会的节目单
(张治中题写封面)

涉猎的知识面广泛,选修了教育学、心理学和德、法、英、意大利等语言课。喻宜萱对学习外语很有兴趣,解放后她又学了俄语,能熟练地掌握多国语言,经常译配外国歌曲。

在留美期间,喻宜萱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在纽约、费城、旧金山、伊萨卡以及佛罗里达州等17个城市举行独唱音乐会。有一次她通过面试,获准参加纽约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主办的青年歌唱家现场广播音乐会。一个中国人向美国听众广播演唱,这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演唱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她在费城和旧金山万国博览会上举办实况广播独唱会时,当地报纸作了热情洋溢的专题报道和评论。从此,喻宜萱名扬海外乐坛,为中国人争了光。

国内抗日战争爆发后,喻宜萱正在美国进修,她到各地举办演唱会时,经常发表演说,宣传中国的抗日,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售废钢铁,以防止日本用以制造武器屠杀中国人,表现出海外学子的一片赤诚爱国之心。

1939年,喻宜萱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谢绝美国朋友的挽留,坚决返回遍地抗日烽火的祖国。这年秋,喻宜萱到成都,先是在因战乱迁至成都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任教,1941年夏到新创办的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后改为国立湖北师

范学院)任教授兼音乐系主任。

喻宜萱在湖北师院任教期间,倾注全部心力于音乐系,一心要把它办成培育全国高水平音乐人才的摇篮。她呕心沥血,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刻意经营,使这个系在她主持期间进入一个音乐群星璀璨的辉煌时期,教师队伍中汇聚了许多全国一流的音乐家。如解放后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江定仙、抗日战争时期创作著名抗战歌曲《歌八百壮士》、《思乡曲》的作者夏之秋、国乐泰斗杨大钧以及钢琴家巫一舟、作曲家郑沙梅等,他们都是喻宜萱请来的。当时有一些学生慕喻宜萱之名,甚至从重庆远道来报考湖北师院音乐系。

1945年,抗战胜利后,湖北师范学院迁往沙市,喻宜萱辞去湖北师院教职,专职从事巡回演出。此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被称为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进步学生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配合斗争,进步歌咏活动也迅速扩展开来。喻宜萱全力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先后在成都、重庆、南京、杭州、长沙、武汉、上海、兰州、广州、香港等地举行多场独唱音乐会,每到一地,还要到当地的高等学府和一些中学演唱。

喻宜萱举行独唱音乐会的目的,是通过音乐的魅力激扬人们对音乐的喜爱,以此激发人们美好的心灵和爱国之情。在每个大城市演出时,不讲盈利,一般只卖一两场门票,收入用来支付场租和其他费用。她在学校举行的独唱会都是免费的。

当时,许多高校和中学的进步学生传唱的歌曲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表达对蒋介石反动统治不满的;二是解放区传过来的歌曲,如《兄妹开荒》、《山那边哟好地方》;三是抗日歌曲和优美的民歌。喻宜萱在独唱会上也常唱这些歌曲,以支持进步学生运动。

1946年,她在南京介寿堂举办的独唱会上,唱了一首由赵元任谱曲、在明朝末年流行甚广的民谣《老天爷》。歌词是这样的: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来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不会做天/你塌了吧……当时,出席演唱会的有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张治中将军也参加了。喻宜萱唱了这首歌,触怒了在场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演唱会结束后,有人到后台要找她的碴

儿,被在场的张治中解围才作罢。

喻宜萱在她步入音乐殿堂的前期,主要是学习西方经典音乐,她掌握和擅长演唱的是西欧古典艺术歌曲和歌剧咏叹调。但她从美国回国以后,受到国内抗日战争高潮和民众爱国热情的激励,她的歌风有了变化。在演唱古典歌曲的同时,独唱会上更多的是演唱抗日爱国歌曲,对民族民间音乐也相当重视,她在自己演唱的曲目单里,把中国的声乐作品放在重要的位置,即使在她出国期间也依然如此。1948年秋,她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去法国、美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家考察音乐教育期间,在伦敦、巴黎举行的独唱会上,她演唱的中外名曲中,中国作品就占了相当部分。《康定情歌》和王洛宾记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都是通过她的演唱最早向国外音乐爱好者推荐的。

喻宜萱重视演唱中国作品,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她说:学习西洋发声法,不但要能很好表现外国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要唱好自己的作品,表达中国人的思想感情。要热爱自己国家的民族艺术,这对一个歌唱家、艺术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948年7月,她接受张治中的邀请,在兰州风景名胜五泉山东龙口举办了一次有万余人参加的独唱音乐会,充分体现了她的艺术特色。东龙口处于峡谷山林之中,树荫蔽日,高山流水,极其幽静。为了满足更多的听众能欣赏到喻宜萱的歌声,独唱会不售票,任凭听众自由参加。演唱会在盛夏傍晚举行。

八时整,张治中将军陪同喻宜萱教授来到龙口八卦亭,独唱会开始。此时,只见有一万多听众的峡谷现场,万籁无声,人们屏气敛神,静听喻宜萱放声歌唱。她先后唱了二十多首歌曲,在五泉山脚的峡谷中久久回荡,真可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那种感人至深的艺术享受,给兰州听众留下难忘的印象。这在喻宜萱举办过的多次演唱会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多少年后,张治中将军在他的一份回忆录中,还写到当时的情景。他说,像这样的音乐活动在国内是很少有的。一位著名的歌咏家为普及音乐,甘愿无条件在露天为群众演唱,这种精神是多么可贵。

1948年秋,她从国外考察音乐教育结束后,急急绕道香港,回到刚刚解放的祖国内地。

1949年10月到达北京,11月初她就应邀在怀仁堂参加回国后的首次演出。1946年在南京见过她的周恩来在演出会上认出了她,热情地询问她回国后的情况,从家庭生活的安顿到工作的安排都非常关心。周总理的关怀对刚从国外归来,对新中国还不太了解的喻宜萱是极大的安慰。不久,她就受聘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兼声乐系主任,次年又出任副院长。直至1984年辞去领导职务,专任教授。

喻宜萱在教育事业上从事教学工作,同时坚持舞台实践,带领学生下农村、到工厂、军营,为工、农、兵演出。1953年末,与周小燕等一起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演出。她还曾先后同梅兰芳、马思聪、老舍、巴金、阳翰笙、王昆、郭兰英等人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在去苏联访问时,她还担任过莫斯科第六届青年联欢节声乐比赛和柏林国际舒曼音乐比赛评委,声望很高。从1952年起,她从担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连任到第六届。1960年又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曾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文革”浩劫中,喻宜萱虽被打成“反动权威”,遭到批判斗争,被赶进“劳改队”,但她对献身中国声乐艺术的意志毫不动摇,仍是热爱她的音乐事业。“文革”后,1979年10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庆祝喻宜萱教授在新中国从事音乐教育三十年纪念音乐会”,对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84年她辞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以后,仍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的编委,并是音乐分支编写组主编,同时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顾问。几十年来,喻宜萱用她辛勤的汗水,培养出诸如刘涌芳、李桢、胡静华、黎信昌、文征平、李光伦、李双江等一大批优秀声乐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她还发表了大量声乐方面的论文,选编中国歌曲集、译配优秀的西方古典艺术歌曲,对推动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今年5月,在中国文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主办的首届国家级音乐艺术综合奖大会上,喻宜萱和吕驥、李德伦、周小燕、赵沨、孟波、时乐濛、郎毓秀等27位从艺60年的老音乐家,受到首届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的表彰。

(责任编辑 方 隽)

陈立夫晚年呼唤两岸统一

● 远 梦

刚过了新千年的中国第一个中国传统的元宵节,陈立夫走完了 103 岁的人生历程,在台中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与世长辞。随着他在台湾的最后离去,仿佛一台鼓乐铿锵的大戏悄然落幕,曾经权倾中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第一代成员,除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尚在美国之外,其他的人都撒手人寰。此时,与他同龄或年龄相近的那些国民党大老也早就先他而去了。

陈立夫曾是著名的“反共老手”,生于 1900 年,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他在北洋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采矿学硕士学位。1925 年底,陈立夫回国,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由于蒋介石的器重,陈立夫于 1928 年起,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学校代教育长、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是国民党 CC 派首脑之一。

在中国国民党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而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两兄弟执掌国民党人事大权,故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1949 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小小的孤岛上派系横生。蒋介石一心要扶植儿子蒋经国,已经容不得其他人来分权。在蒋介石身边二十多年的陈立夫自然是聪明人,他于 1950 年 8 月携家人赴美国,远离政坛,隐居于纽约长岛。

在长达 19 年的旅美期间,陈立夫不可能再像在国内那样,可以通过政治途径插手经济,在美国社会立足必须面对现实。他先与老朋友在美国东部的湖林城合办养鸡场,筹划养鸡挣钱的蓝图,不料来亨鸡不好养,养鸡场亏损严重,只能另谋出路。他又和友人创办中国食品公司,由夫人孙禄卿女士出任董事长。这次创业一炮打响,他

们推出辣椒酱、湖州粽、年糕、皮蛋、虾仁蛋炒饭等“中华美食”,保留了传统风味,在纽约都市大爆冷门,买卖非常火红。

从国民党叱咤风云的当权人物,转为在美国谋生的普通侨民,仿佛巅峰到低谷,内心深处的失落感是不言而喻的。在大起大落中,陈立夫调整心理状态,适应了角色的转换。他放下架子,亲自参加食品的制作,时常开车到一些食品店送货上门,与食品店老板们聊天。他觉得这是自食其力,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与信奉基督的友人不同,陈立夫没有忘记中国的“根”,他的最大寄托是博大精深的国学。他深入研究儒学、易学、中医学、书画与戏曲,每有心得就著书立说,日程安排得满当当的,使得自己的精神不空虚。

1968 年,陈立夫年近七十,颇有思乡之情。坐稳了台湾江山的蒋经国顺水推舟,把陈立夫请回来,担任国民党“总统府”资政。他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上,他兼任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会长、中华国医馆董事长等职。他先后著有《孔子学说对历史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唯生论》、《四书道贯》、《孟子之政治思想》、《人理学之研究》等书,还翻译了李约瑟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

1988 年 1 月,台湾“政治强人”蒋经国去世。同年 7 月,在国民党第十三届全会闭幕后召开的中央评议委员会会议上,身为国民党第十三届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陈立夫,率领 34 名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联署提出了一项关于中国和平统一的议案。议案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内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

议案还提出,中国的统一“惟必须由中国人

自力以达成之”，“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自会团结统一。”统一的进程，应是先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建立互信，继之“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开展两岸经济合作，进而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这项提案尽管仍有某些不适宜的提法，但在台湾是史无前例的，它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适应了海峡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陈立夫等34位先生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不久，陈立夫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说，假如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如何以中华文化来统一中国”，那他一定去。但同时又表示，“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1998年4月，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台北晶华大酒店宣告成立。第一届理监事会议上，聘请99岁高龄的陈立夫为名誉会长。这是一个以“和平统一”为己任、公开呼吁海峡两岸早日和谈的民间政治组织，陈立夫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赢得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尊敬。

2000年8月，在国民党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央评议团主席陈立夫与梁肃戎等人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的提案。这两位国民党“大老”是国民党的“有功之臣”，也曾与中国共产党不共戴天。他们眼看着国民党在失去大陆半个世纪后又失去台湾，台湾分裂势力的活动日益猖獗，再三反思，痛定思痛，“基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基于2300万台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抱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登高疾呼，要求进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共同打击“台独”，防止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

得逞。

历史具有极大的戏剧性。陈立夫原先可谓中国共产党人的死敌。早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受权发表的重要电讯列出中国内战首要战犯共43名，其中排在前10位的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到90年代，10人之中只有陈立夫还健在。正是这位“战犯”中唯一的在世者，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建议。

第三次国共合作是一个老话题了。最先提出进行第三次合作的不是国民党，而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1956年7月，周恩来总理三次接见奔走于两岸之间的著名人士曹聚仁。他对曹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陈立夫还记得，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之间的内战一触即发，周恩来给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俩写来一封亲笔信，表明共产党的态度，要大家共同打日本，不要打内战。周恩来的亲笔信让国民党上层看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希望。后来，陈立夫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人进行谈判，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发表了共同抗日的声明。

笔者于1996年在台北采访了陈立夫先生。



陈立夫在台北寓所接受大陆记者采访

那是夏日的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笔者一行来到阳明山下一条小街,走进陈立夫先生的住宅。

客厅里悬挂墙壁的书画佳作,蒋经国为贺“立夫兄嫂八秩双庆”书赠的“福乐寿喜”条幅,放在最醒目的位置。旁边是一副笔力遒劲的对联:“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孔夫子的彩色画像与彩凤开屏的壁雕一静一动,别有情致。

陈立夫先生在一位年轻护士的搀扶下,从里屋走出来。他用浓重的浙江口音,招呼大家先坐。陈立夫精神很好,思路清晰,话题就从中国文化开始。他回台湾后,应邀去大学讲授《中国文化之精义》,讲座十多年没断过。陈立夫说,我小时候就念四书,后来把四部书并成了一部,花十年时间写了一本《四书道贯》,梳理了四部的原理,使之融汇贯通。“因为我在这本书里没讲共产主义,也没讲三民主义,只讲中国文化。所以这部书在大陆也出版了。”

陈立夫对于中国文化推崇万分。他说:“中华文化很早啊,从尧、舜到现在,四千多年了,孔子到现在也有二千五百年了。你如果看了孔子和老子的两本书,你就晓得我们几千年之前,文化已经很高了。”他以一个长辈的身份告诉我们:“我想你们应该多看看。第一个,先要知道历史,才会爱国。第二个,要讲历史上很多了不起的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了自己的人。”

我们请陈立夫先生谈谈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他说:“依我的看法,世界上的强国,没有一个愿意我们中国统一的。而不论海内海外的中国人,没有不愿意中国统一的。”他呼吁海峡两岸早日和谈,当权的人应当为实现这一大目标努力,自己伟大一点,看得远一点,真正地为中国的前途着想。

这番话出自陈立夫之口非同寻常。他曾投身北伐,参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又是西安事变后的蒋介石代表,亲历了国共第二次合作。陈立夫看来,国共前两次合作都成功了,实现了共同的目标: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的胜利,打倒了军阀;第二次打败了日本,取得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陈立夫说:“现在面临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目标是以中国文化迎接21世纪来临。这个目标比前两个更重要。我们应该像以前两次一样,

平等地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地合作。”

因为陈立夫的观点与台湾当权者的观点相左,旁边的工作人员怕他讲话出格,提醒他:“立公,这个就不要讲了。”陈立夫不以为然,他挥了挥手,大声地说:“我这个资政是经国先生请的!”

听陈立夫先生畅言已有五年了。遗憾的是,国民党当政时坐失良机,李登辉为所欲为,大搞分裂活动,抛出“两国论”恶化两岸关系,根本不接受陈立夫等元老的意见。当然,陈立夫先生不会想到民进党坐大,国民党竟然大选失败,沦为台湾的在野党,却只能为两岸和谈提建议了。

陈立夫如此高龄仍谈吐自如,神情生动,让我们极为惊叹。请教他的长寿秘诀,陈立夫先生笑道:“我58岁患了糖尿病,也曾由于胆结石和膀胱结石动过外科手术,其他的病也有过。我居然能活到这么大年龄,跟我的饮食、起居和心境很有关系。我看到许多人同样是糖尿病,同样生活很不错,医疗服务也很好,却在五六十岁便失明、偏瘫,这主要是生活随意,没有控制疾病的缘故。”

谈到“后天的保养”,陈立夫认为:养身在动,养心在静。“过去人常讲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以其常动故也。我每天5时半即起,作全身自力按摩的运动,已经坚持半个世纪了。年岁老了,学了一套老年自身按摩之法,叫做内八段锦。我每日三餐饭后走路,由护士陪同,每次约走500至600步,也坚持20年了。”

陈立夫总结说:饮食有节,起居有时。多食果菜,少食肉类。

陈立夫的原则是明确的:能不管的事尽量不管,然而要管的事仍然得管。比如海峡两岸的关系问题,就时常萦绕在陈立夫的心头。作为台湾政坛元老,陈立夫对中国统一问题日益关心,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的统一。不顾台湾当权者的种种限制,他认为海峡两岸如果通过合作而达到统一,中国则必将在世界上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历史责任感。

纵观陈立夫的政治生涯,他辉煌过,也失意过,与共产党为敌大半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人。晚年的岁月里,他能抛开一党之见,站在祖国与民族的利益上呼唤和谈统一,实在是难能可贵。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比尔·盖茨之母的中国情缘

● 陈立

前不久,一个题为《千古遗珍——中国四川古代文物精品展》的文物展览在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开展了,观展者如潮涌,人们被其精美绝伦的文物造型、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震惊了。当地媒体评价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引人注目的文物精品”。

然而,观展者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展览能够在美国成功举办,却经历了一波三折,中美有关方面准备了整整五年时间;人们更没想到的是,为了促成此次展览,世界首富、软件大王比尔·盖茨先生的母亲咪咪·盖茨(Mimi·Gates)女士为此费尽了心血。

世界首富之母的来函

1995年冬天,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梁旭仲局长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局长阁下:

您好!冒昧给您写信,请您原谅!

我的名字叫咪咪(Mimi),是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华盛顿州位于美国西北部,是美国的新经济和高科技中心,世界著名的波音公司、微软公司都在该州。我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

同样,我对四川的人文景观也比较了解,比如乐山大佛、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等等,特别是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其精美绝伦的造型、神秘莫测的文化内涵,更是深深地吸引了我。但遗憾的是,我却一直无缘一饱眼福。

也许您很诧异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却知道这么多关于中国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当中,有很多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关联的,在我所供职的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东方部里,也珍藏着很多中国古代文物,包括石刻、陶瓷、字画、工艺品等等,有一尊石刻‘中国骆驼’还是我馆的镇馆之宝。……

我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倪密,那是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给我取的。……

我此次冒昧地给您写信,是想与贵省在文化方面加强进一步的合作与交流。因为华盛顿州与四川省是友好省州,我们双方加强文化方面的合作,毫无疑问会更进一步地增进中美之间的友谊。……”

咪咪在信的末尾还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中文大名“倪密”。

收到这封信之后,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的梁旭仲局长被倪密的热情深深感动,虽然他不曾与倪密打过交道,甚至也没听说过她这个人,但看得出来她确实非常喜欢中国文化,还是一位文物方面的行家。因而他在局办公会上研究过此事后,当即给倪密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

“……中国也同美国一样非常珍视中美关系,四川省与华盛顿州更是早在1982年就缔结了友好省州,四川与美国最著名的波音

公司和微软公司都有很好的合作。您说您对四川的文物及文化景观倾慕已久,我们随时欢迎您造访四川,我也将和我的属下给您当好向导。……”

信寄出去以后,由于平时工作太繁忙,梁旭仲局长也没太牵挂此事。谁知就在他给倪密回信没多久的1996年春天,倪密却带着她所在的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东方部的一个副主任来四川了。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梁旭仲局长特地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接待了倪密一行二人,并陪他们参观了三星堆展览、四川省博物馆古代文物精品展,游览了她久仰的都江堰、乐山大佛及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名胜古迹。

因为身临其境,近在咫尺地观赏这些珍贵文物,倪密对四川古代文物文化内涵的了解更深刻了,特别是对三星堆文物,她真是叹为观止。

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境内,早在1929年,这里就曾发现大批精美玉石器;1986年又发掘了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了1000多件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引起了世界轰动,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1987年8月,三星堆文物第一次跨出国门,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展出,顿时引起西方世界的轰动。之后,三星堆文物又转到瑞士、德国、丹麦、西班牙等国展出,受到西方文物爱好者的热烈欢迎。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三星堆文物这些“光彩事迹”,倪密都耳熟能详。或许是爱屋及乌,倪密还慷慨地提出愿为四川文物管理部门免费赠送一套文物管理软件系统。

梁旭仲局长说:“那会给您添不少麻烦的,因为我知道现在市场上没有现成中文版的文物管理软件呀!”倪密回答说“我有一套英文版的文物管理系统,只要将语种变成中文就行了。更何况我还可以请我儿子帮帮这个忙,儿子有自己的软件公司。”

“哦,对呀,西雅图是世界的软件之都嘛,我怎么忘了?世界首富、著名的软件大王比尔·盖茨先生就是西雅图人呀!”梁旭仲似有所悟地说。

“是的,他是我儿子!他的软件公司名叫微软公司!”

“您是比尔·盖茨的母亲!”听了倪密的话,梁旭仲及在场的人有些惊讶。

“是的,我为他自豪!”

听了老太太这番话之后,梁旭仲及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比尔·盖茨20岁创建微软公司,1986年31岁的他财富突破数十亿美元,并从此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世界首富。他们没想到,这样一位平易近人、衣着朴素、工作严谨且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的美国老太太竟然是比尔·盖茨之母!

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

倪密早年工作于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那里有许多中国古代文物,她在天天与这些中国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深地爱上了中国文物,也因此被灿烂、神秘、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深深地吸引住了,她还发表过好几篇有关中国古代文物研究方面的论文。

爱好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却对斗大的中国字不认识几升,那实在太遗憾了,于是她抽时间特地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了一年中文。

就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这一年,她遭遇了令她刻骨铭心的一件事:

那是在1985年秋天,她利用假期到十三陵和八达岭长城去旅游,不小心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丢了。包里有钱和这次来中国的各种证件,为此,她心里烦躁极了。现在身无分文,又没有证件,怎么回校都成了问题了。几位游客知道后,就给她捐下了2000多元钱。

当她回到北京大学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她的包早已在留学生部办公室里等着她了,里面的证件和钱一个不少,连所放位置都没有动过。

原来,她的包并没有遗失在八达岭,而是掉在从十三陵到八达岭的出租车上了。出租车司机发现了这个包,从包内一张学生证上得知包的主人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于是立即赶到了北京大学,将包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留学生部办公室,请他们转交。

得知事情的原委,倪密真是感激不已,她没想到中国人的素质这么高,她真想拿出一笔钱来感谢那位善良的出租车司机。可人家却早已离去,她只好作罢。从此以后,喜欢中国文化、中国文物的她又对创造中国文物、创造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更加充满好感了。不仅如此,这件事还成了她向家人

及同事时常提及的经典故事。

因为受她的影响和熏陶,她的儿子比尔·盖茨也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对中国人颇有好感,以至于后来他的微软公司里有着大量的华人软件工程师,他的法律顾问汤光宇也是华人。

倪密从中国四川回到美国西雅图之后,对四川文物叹为观止,她及时地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情况向她和儿子的华裔好朋友骆家辉说了,并极力鼓动刚刚当上州长的骆家辉亲自到中国去看一看四川三星堆等文物,并担保一定会不虚此行。

受倪密的鼓动,1997年春,骆家辉真的在百忙之中抽出了时间回中国省亲,当然到四川参观三星堆文物是他中国之行的重头戏。在参观三星堆文物时,他也被四川古代文物的精美深深感动了,告别之时,特地向四川省政府及文物管理部门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四川的古文物能够尽早到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展出。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受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邀请,于1997年初夏特地派出了一个由文博专家、考古专家、外事工作者组成的一行四人的考察团,前往西雅图考察。他们受到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基金会成员及全体员工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州长骆家辉也特地接见并宴请了他们,当地媒体在报道他们到来的新闻中甚至称他们是“来自神之故乡的使者”。考察结束后,双方草签了一个办展的意向性协议。

就在考察团回国不久,倪密不知从什么渠道获悉,中国第五届艺术节即将于1997年11月5日在成都召开,于是她再次给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写信,希望能够一睹具有浓郁四川特色的此届中国艺术节的风采。

收到信后,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及时地给她寄去了邀请函,并将情况向她作了说明。

得到这封珍贵的邀请函,倪密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早早地将自己的工作作了安排,准时地和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基金会的两位主要成员——波音公司代表、华裔美国将军傅履仁先生和微软公司法律顾问汤光宇先生,在艺术节开幕之前赶到了成都(美国博物馆一般实行基金会制,基金会成员单位往往是一些大财团)。

倪密观看了艺术节的多场演出,对四川的了

解也更进了一步,因而将四川的文物、四川文化介绍到美国西雅图的愿望也就更加强了。

实际上,倪密此次到成都来观赏中国第五届艺术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此行的主要目的,还在于想尽快落实四川的文物借展到西雅图一事,甚至展览的名称也在她来中国之前起好了,叫《包容天地》。所幸她与梁旭仲局长心有灵犀,她此次千里迢迢而来,也的确使办展的事有了眉目:双方不仅草签了一个非正式合同,还初步选出了一些要在西雅图展出的文物;初步决定了此次四川文物在西雅图展出3个月的借展时间、63万美元的借展费用以及近数亿美元的保险费等。

求基辛格小布什戈尔出面帮忙

自从与倪密草签了那个非正式的合同之后,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就进入了紧张筹备阶段。

在这段时间内,倪密也与梁旭仲局长及四川省文物管理局保持着密切联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花巨资相继派出了文物运输专家、文物包装专家、文物测量专家、文物安全专家、文物陈列专家、文物专业摄影家、电脑特技专家等30多人,带上相关的先进设备先后六七次来到中国考察三星堆文物,并详细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案,时间跨度长达两年。

日月如梭,转眼就到了2000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关于三星堆文物借展西雅图的筹备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然而谁知,就在此时却收到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写来的一封长信。

这是怎么回事,大名鼎鼎的基辛格先生怎会给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写信?

看过信才知道,基辛格是为三星堆文物巡展美国的事而如此热心写信的。他在信中强调了文物巡展美国对中美友谊的积极意义,并以私人的名义请求四川省文物管理局能够尽早给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一个借展的机会。

此后不久,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又相继收到了美国副总统戈尔和得克萨斯州州长小布什的来信。他们来信的内容也同基辛格的来信内容大同小异,也是关于三星堆文物借展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一事,同样希望三星堆文物能够尽早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展出。



比尔·盖茨的母亲(右二)、父亲(右一)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局长梁旭仲(左二)合影

梁旭仲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的同事对这三封来信疑惑不已:为什么小小的一件事会惊动几位美国大人物呢?其中是否有什么玄机?

原来,倪密在观赏了中国第五届艺术节的相关节目、且初步议定了三星堆文物借展的相关事宜之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西雅图,她的员工和基金会其他成员知道事情的经过,也都同她一样非常高兴,因为只要签下正式合同,夙愿就会变成现实了。她和所有员工都急切地盼望着这个好消息能尽早到来。

1998年4月,四川三星堆文物在日本东京都世田谷美术馆展出,但这次展览,倪密事先并不知道,因而她非常惊异。

由于对三星堆文物的强烈热爱,同时也想向日本同行取取经,因而她特地带上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文物专家、文博专家以及盛情邀请同行的美国最权威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洛杉矶盖迪研究所的文物专家一道前往日本观展。在观展期间,倪密和专家们还专门作了一个《三星堆神树包装保护方案》的课题研究,并将其成果无偿地奉献给了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后来,三星堆文物又在台湾展出了,虽然没再去观展,但她却密切关注着三星堆文物展览的盛况,也收集相关的报刊。

然而,更令她始料不及的是,她还从有关渠道获悉,就在她向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申请借展事

宜、且虔诚地等待批文的时候,包括法国、意大利、希腊、澳大利亚等国家也都在跟四川省文物管理局谈判这批文物在他们国家巡展的事。这件事对她震动更大,因为她一直提心吊胆的主要原因就是怕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将三星堆文物的展出机会给了别的国家。

得到这个消息后,倪密坐不住了,于是她想到了请中国人民

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帮忙。基辛格是个爽直的人,也最热衷于中美之间的友谊交往。他不仅当面向倪密承诺了帮忙这件事,还即刻行动起来,相继给中国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及四川省政府、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写了信,

为了稳妥起见,倪密又请了正处于竞选总统的激烈战火之中的得克萨斯州州长小布什和副总统戈尔帮忙。小布什和戈尔也都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相继给中国的文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写了信。梁旭仲局长及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的同事连续收到这些美国显赫人物言情恳切的来信之后,立即加快了与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合作的进程。

2000年12月10日,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梁旭仲局长及其随行人员与倪密及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基金会主要成员在西雅图经过认真细致的谈判之后,双方终于在友好的气氛中签订了正式的办展合同,办展时间定为2001年5月。

中国文物展轰动西雅图

自从签下正式合同之后,倪密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然而好事多磨。就中美双方将展览前的准备工作基本划上句号的时候,2001年2月28日上午,西雅图经历了50年来最严重的地震。

灾情发生后,梁旭仲局长和四川省文物管理

局的专家们心里也为之一震：灾情如此严重，我们的珍贵文物还敢拿到西雅图展览吗？于是他们提出：如果美国地震权威研究机构能够拿出一个包括近期地震活动预报、近一百年来地震记录等相关资料，证明三星堆文物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展出期间不会再次地震的话，三星堆文物的展览计划将会如期执行。倪密爽快地答应了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

20多天后，梁旭仲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收到了倪密寄来的由美国最权威的地震研究机构、华盛顿大学地震研究所提供的权威地震预报数据及近一百年来西雅图市所在的华盛顿地区的地震记录。资料分析表明，自5月至8月，即合同中既定的三星堆文物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展出时间内，华盛顿州内及其邻近地区是绝对不会发生地震的，三星堆文物展览可以按预定计划正常进行。

2001年5月2日，三星堆文物展览在花费了倪密女士5年心血的艰苦邀请、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且一波三折之后，终于在西雅图艺术馆开展了。这个名为《千古遗珍——中国四川古代文物精品展》共展出了各种文物175件，其中包括大青铜立人像、大青铜纵目面具在内的六件三星堆国宝级文物，是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国际文物特展。四川省副省长徐世群、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中国驻美国大使杨洁篪、文化参赞孙维学、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王云翔、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局长梁旭仲、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倪密以及波音公司总裁、微软公司总裁等参加了开幕式。

虽然熟悉造型艺术的美国观众具有欣赏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情趣，但要从展品中探索出远古四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仍然非常困难。为了帮助观众了解展品中的铜像、头像面具以及其他精品所展现的中国古代文明，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采用了一系列高科技信息技术：为这次展览专门开辟了网站，使美国乃至世界各地不能前往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观展的众多文物爱好者都可以分享中国的古代艺术与文化；网民们可以通过比尔·盖茨先生编写的互动软件查询各种资料及交流观感；邀请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在网上回答网民们提出的问题并参加网上讨论；

网站为世界各地的教师免费提供有关中国艺术的教材，供他们下载打印；……

观众同时可以通过安装在展厅四周的互动多媒体电脑加深对展品的了解。博物馆将展品分成三星堆、周和东汉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12个小部分，配以图像、文字、音乐、音响效果和动画，使观众观展时能全方位地理解、认识中国文物，认识中国文化。此外，博物馆还特地为观众准备了中英文的播放器，只要借一个带在身上，就可随时随地点播展品介绍。

观众还可以进入博物馆人机互动电脑室，无论大人小孩子都可以自己动手参与三星堆现场的模拟挖掘活动，这是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首次推出的高科技教育辅助项目。电脑室里的电脑工作站模拟的是三星堆二号坑三个层次的挖掘现场，观众可以从一堆零乱的碎片中辨认和拼凑出各种中国国家级文物。这一活动极具知识性和趣味性。

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年”活动中，《千古遗珍——中国四川古代文物精品展》是重头戏。此外，还展出了中国字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藏中国艺术珍品；举办了中国音乐会、中美棋赛和中国电影周，并在周末开办了中国书法入门、中国艺术创作、中国手工艺制作等讲座。

四川省古代文物精品展向美国人展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也加深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心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愿望。

当三星堆文物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开展以后，早已是三星堆文物痴的倪密又忙活开了，她又向得克萨斯州金布尔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及加拿大多伦多艺术博物馆竭力推荐了三星堆文物。在她的努力下，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在进行一系列的考察、谈判之后，又与这三家博物馆签下了正式的办展合同。因而2001年底和2002年初，三星堆文物还将相继在得克萨斯州、纽约州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展出。

仅从倪密向其他艺术博物馆推介三星堆文物这一件事上，更可看出她对中国文物的厚爱是高尚而无私的！

（作者依法声明：未经作者同意，本文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转发、改编、网摘。）

（责任编辑 舒元璋）

略谈汉武帝的文治

● 杨生民



汉武帝

汉武帝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对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并非独尊儒术

中国从有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后,就出现了全国以一家思想为统治的现象。秦统一后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西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为统治思想。即使如此,对其他学派也非一概排斥,而是一般在朝廷设博士官,任用各学派的学者为博士。朝廷议事,各学派的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以供咨询。朝廷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秦始皇“焚书坑儒”前是这样做的,西汉初也是这样做的。“焚书坑儒”是个特例。

西汉初期重黄老思想,但对其他学派的人材也注意任用,汉文帝设置各学派博士多达七十余人,深受汉文帝器重的晁错,就是一位“学申商刑名”的法家。西汉初期实际形成的学术思想政策是:尊黄老(以黄老思想为指导)、重法治、兼用各家。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所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德(黄老)六家都是为了把天下治理好。只是,各家各有其优点与缺点。

汉武帝实行的学术思想政策就是西汉初期学术思想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说,汉武帝即位学术思想方面“悉延(引)百端之学”,即兼用各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酷吏列传》中还分别讲了汉武帝尊儒术、重法治的具体情况。

首先讲尊儒术。汉武帝将西汉初期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变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是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实施的。其一,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罢各家传记博士官,只设置儒家《诗》、《书》、《春秋》、《礼》、《易》五经博士。其二,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任用“好儒术”的田蚡为丞相,并于次年“绌(黜)黄老,刑名百家言”的学者不用,提拔以学儒家《春秋》经起家的公孙弘当官,后逐渐升至御史大夫、丞相。其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兴太学,以学习儒家经典成绩的优劣选拔任用官吏。

其次谈重法治。汉武帝重视法家思想、重法治,表现如下:其一,汉武帝继承了先秦法家激进的改革思想,据《史记·平准书》载,汉武帝说:“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这同商鞅所说“治

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如出一辙。汉武帝要改革，就需要用法治清除改革道路上的障碍。其二，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令张汤、赵禹定律令。在此之前，刘邦入秦与民约法三章，萧何又取秦法，作律九章。后又让叔孙通作朝代《傍章律》十八篇。共计三十篇。这次武帝定律令，张汤作《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作《朝律》六篇，计三十三篇。加上高帝时所作三十篇，共计六十三篇。这就是后世所说汉律。此后法律条文严密，而且律、令、科、比四种法律形式完备。其三，任用酷吏，严厉执法，镇压诸侯王的叛乱活动，打击违法贵族、商人、豪强，推动了改革。当然，汉武帝也任用酷吏残酷镇压了农民起义。其四，汉武帝时任用的法家代表人物张汤、桑弘羊等人在政治、经济改革上曾作出过重大贡献。

再次谈关于兼用各家的问题。武帝除任用以儒学起家的董仲舒、公孙弘、儿宽、夏侯始昌，和学法学的韩安国、张敖、张汤、赵禹、桑弘平等外人外，还用了尊黄老学说的汲黯、郑当时、司马谈、司马迁等人，用了学纵横术的主父偃、严助、徐乐、严安等，还用过杂家的东方朔以及术数家、卜筮者、方士等等。

汉武帝施行的上述学术思想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汉代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一般情况下都尊儒术而兼用诸子百家，应该说，是受了汉代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汉武帝是中国封建时代学术思想政策的奠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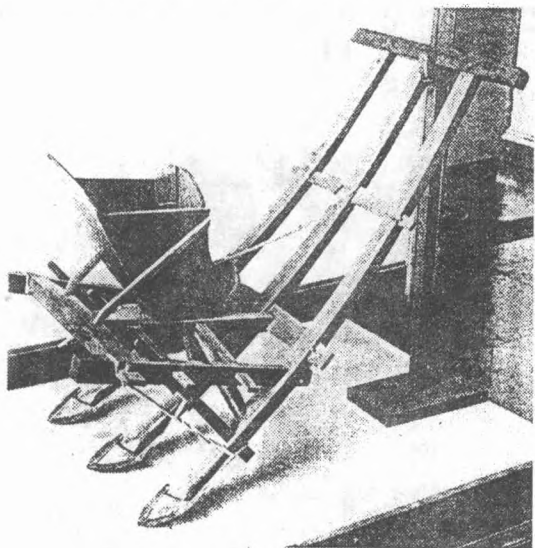
在中国历史上，西周重德治，后来儒家总结西周治国的经验，主张用仁义、德治治国，称王道。法家主张用法令、刑罚治国，称霸道。秦始皇“废先王之道”，专任刑罚、霸道治国，结果使天下大叛。汉武帝则德治、法治同施，王道、霸道兼用。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见《汉书·元帝纪》）这说明汉武帝较之秦始皇在处理历史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上前进了一大步，在治国的思想、方法方面也前进了一步。汉武帝能开拓更大的事业与此有关。对此我们不能予以忽视。

搜求、收藏遗书

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秦始皇“焚书”后还颁布了“挟（藏）书者族”的法令。古老悠久的中华文化的传承面临严重威胁。汉初开始搜求遗书，到汉武帝这一活动达到高潮，形成制度。《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并说，“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在中央政府大力搜求遗书的同时，郡国等地方政府也争相仿效。成绩最大的有两位：一位是景帝之子、武帝之兄河间献王刘德，据《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载，献王刘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于办法好，能保护献书者的利益，调动了献书者的积极性，所以“得书多，与汉朝等”。另一位也是景帝之子的鲁恭王刘余，其人“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据《汉书·艺文志》载，这次从孔府墙壁中得到的书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其中《古文尚书》比汉初所得《尚书》二十九篇多十六篇。

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搜集的遗书主要有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及曲辞诗赋，另外对各地上计的计书也妥为收藏。

搜求、收藏遗书促进了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发展。如孝经，秦焚书时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颜芝子颜贞献出，凡十八章。后在孔壁中与《古文尚书》同出的古文孝经，经文与颜贞所献之书大



汉武帝时推行的新式农具耒耜模型

致相似,但多出三章,后合并为二十一章,孔安国为之作传。后刘向校经籍时又定为十八章。再如《周官》(《周礼》),汉武时李氏得《周官》,献给河间献王,独缺冬官一篇,献王以千金求购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上。王莽时,刘歆开始为《周官》置博士,此后《周官》流行于世。

还值得提到的是,武帝置《五经》博士时所用儒家经书为当时流行文字书写,叫今文经。鲁恭王在孔壁中发现的书和民间献书是用古籀文书写,叫古文经。此后,出现了儒家经学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思想发展有深刻影响。

搜求、收藏遗书对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历史资料的保存和史学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秦朝焚书时,各国史记都被烧毁了,留下的独有秦记,而秦记又不载日月,文字过于简略,所以损失无法弥补。汉武帝设立史官,先后任司马谈父子为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能之一就是收藏各种典籍,如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天文、历法、卜筮等书和天下计书。被古今史学家称诵的历史名著《史记》,虽为司马迁个人所修,功不可没,但修《史记》的条件却是汉武帝创造的。《史记》不仅通过《本纪》、《表》、《世家》、《列传》叙述了我国从五帝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和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而且通过“八书”记载了我国礼义、音乐、历法、天文、祭祀、兴修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的演变及其功能。通读《史记》,我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兴衰荣辱、经验教训、发展变化尽收眼底。如果说孔子编订六经和先秦诸子的出现

标志着我国一项巨大文化工程出现的话,那么《史记》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纪传体正史这一巨大文化工程的开始。《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是我国所特有的,历代相沿,至今已有二十五史。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奇观。

还是汉赋名家

汉武帝对乐府演奏曲目与诗歌、汉赋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汉代乐府有三大演奏曲目,除《房中乐》十七章为高祖时唐山夫人所作外,《郊祀歌》十九章、《铙歌》二十二曲,均系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所作。张骞通西域后,胡笳和胡乐传入,李延年又更造《新声曲》二十八章,使汉代乐府演奏曲目向前大大发展了一步。汉武帝还为乐府订立收集民歌“采诗夜诵”的制度,收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民歌歌诗计260多篇。乐府的活动,后来延续到东汉、魏、晋、南北朝,一些知识分子也以乐府歌诗篇名作诗,促进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汉武帝爱好汉赋,对司马相如作的赋尤为赞赏,推动汉赋发展得更加成熟、更加富于创造性。武帝本人就是著名诗赋作者,他的诗赋,一类大气磅礴,意旨深远;另一类感情真挚,词藻华美。鲁迅先生称赞说:“武帝词华,实为独绝。……虽词人不能过也。”

总之,汉武帝时期,在思想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本文作者系首都师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汉武帝传》)

(责任编辑 文 贤)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及近年合订本

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本刊编辑部组织力量,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全套116.10元。另加书价的10%的挂号邮寄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电话:(010)64072452 邮编:100007

2001年合订本已装订完毕

1996年合订本: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7年合订本: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8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1999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0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1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免收邮费 挂号邮寄)

庆祝《炎黄春秋》 创刊十周年

以史为鉴

炎黄春秋创刊
十周年题

牙先远
李锐

澄清史实以辨是非
学术道义勇挑双肩
以史为鉴本精神资源

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李锐



秉笔直書

以史為鑑

歐遠方



炎黄春秋杂志百期纪念

求真務實可以
益心智供鏡鑒

两千五百零二



2002 /1 总第 118 期

- 一个知识分子的两个 21 年
- 克隆植物基因之父辛世文
- 廖盖隆“文革”中拒绝“批邓”
- 比尔·盖茨之母的中国情缘
- 陈立夫晚年呼唤两岸统一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 元

